

宿 白 未 刊 讲 稿 系 列



# 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

宿白 著

文物出版社

宿白未刊讲稿系列

# 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

宿 白 著

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小舟  
封面设计：李 红  
责任印制：梁秋卉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宿白著. —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2. 2

(宿白未刊讲稿系列)

ISBN 978 - 7 - 5010 - 3398 - 0

I. ①考… II. ①宿… III. ①考古发现 - 中国②文化交流 -  
文化史 - 中国、西方国家 - 古代 IV. ①K87②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1721 号

## 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

(宿白未刊讲稿系列)

宿 白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100007)

http: // www. wenwu. com

E - mail: web@wenwu. com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16 开 印张: 9.25

ISBN 978 - 7 - 5010 - 3398 - 0

定价: 36.00 元

已审阅

子居 13-12-06, 19:0

# 目 录

前言(1980年稿)	( 1 )
(一) 解题	( 1 )
(二) 西方的范围	( 2 )
(三) 本专题内容次第	( 4 )
一、商周时期(前16~前5世纪)(1980年稿)	( 5 )
1. 中亚、西亚地区发现的陶鬲	( 8 )
2. 东西方发现的青铜刀子和剑	( 8 )
3. 丝织品、软玉、绿松石和玻璃珠饰等的东西方传播	( 13 )
4. 东方发现的晚期铜剑和带钩	( 15 )
二、战国时期(前5~前3世纪,前475~前221年)(1985年稿)	( 20 )
1. 镶嵌玻璃珠饰的东传和中亚发现的战国器物	( 21 )
2. 胡服骑射	( 23 )
3. 南方发现的玻璃制品和海路的开通	( 23 )
三、西汉(前3~1世纪中期,前202~25年)(1985年稿)	( 27 )
1. 张骞出使与汉武帝经营西域	( 28 )
2. 北匈奴西迁与匈奴北部的遗迹、遗物	( 29 )

四、东汉魏晋 (3 世纪中期~4 世纪初, 252~316 年) (1985 年稿)	
.....	( 35 )
1. 匈奴第二次分裂与西迁 .....	( 35 )
2. 班超事迹 .....	( 38 )
3. 贵霜王朝的兴起 .....	( 39 )
4. 安息、大秦和东方交往的遗迹 .....	( 47 )
五、东晋南北朝时期 (4 世纪初~6 世纪) (1980 年稿) .....	( 54 )
1. 粟特人东来和中原发现的西方文物 .....	( 56 )
2. 我国石窟艺术中的西方因素 .....	( 62 )
3. 蚕丝技术的西传和外销丝织品的发现 .....	( 64 )
4. 纸开始西传的问题 .....	( 67 )
5. 南方发现的有关遗物 .....	( 68 )
六、隋唐五代时期 (7~10 世纪) (1980 年稿) .....	( 72 )
1. 粟特以东的突厥地区的发现和碎叶城遗址 .....	( 73 )
2. 昭武九姓的遗迹 .....	( 77 )
3. 大食的兴起与大批粟特人、波斯人东来的遗迹 .....	( 83 )
4. 吐鲁番—敦煌的发现 .....	( 85 )
5. 长安、洛阳等地发现的与中亚、西亚有关的遗迹 .....	( 88 )
6. 西亚传来的宗教的遗迹 .....	( 95 )
7. 从中国向东传的西方器物 .....	( 97 )
8. 大食地区发现的唐代遗物 .....	( 99 )
9. 晚唐五代海路上的遗迹 .....	( 102 )
10. 晚唐五代我国室内设备的逐渐复杂化 .....	( 104 )
七、宋元时期 (10~14 世纪) (1985 年稿) .....	( 107 )
1. 前期的遗迹 (两宋时期的遗迹) .....	( 108 )
2. 后期的遗迹 (元代中西文化交流) .....	( 111 )

---

附录 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汉文古文献（汉～唐）（1980年稿）	
.....	(117)
1. 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汉文古文献（一）（5世纪之前）	… (117)
2. 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汉文古文献（二）（5～9世纪）	…… (125)

\*《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是辑录1980年、1985年两次讲稿的不同章节拼凑到一起的。因此，在行文体例上多有差异，但为了尽量保存原稿面貌未作改动。此次公开的讲稿系据李志荣同志校勘全文后的打印本付印。印本内插图有些曾参考刘建华同志1980年听课笔记的附图摹绘。表五《东西方分区年代简表》系安家瑶同志参加讲授1986年《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学》课时所撰，以其可以与本稿参用，因附刊正文稿末。

## 表图目录

表一	原住里海北部的雅利安人迁徙后的分布简况	( 5 )
图一	早期游牧和畜牧民族活动范围示意	( 7 )
图二	中亚、西亚发现的陶鬲	( 8 )
图三	蒙古以西和向东南经内蒙古、河北、甘肃、陕西迄河南发现的青铜刀子	( 9 )
图四	贝加尔湖以南经蒙古迄内蒙古和河北发现的曲柄匕首	( 10 )
图五	陕、晋、豫发现的短剑和中亚、西亚发现的短剑	( 11 )
图六	前一千纪中期匈奴地区发现的尖裆鬲	( 16 )
图七	晚期的青铜短剑 (一)	( 16 )
图八	晚期的青铜短剑 (二)	( 17 )
图九	青铜刀子、短剑发现的范围示意	( 18 )
图一〇	西亚、西伯利亚和中国境内发现的带钩	( 19 )
图一一	镶嵌玻璃珠 (a) 和镶嵌玻璃珠的铜镜 (b) 与带钩 (c)	( 22 )
图一二	山字纹铜镜	( 22 )
图一三	巴泽雷克积石墓壁衣上织出的坐椅	( 23 )
图一四	战国时期中西海路开通过路线的推测	( 25 )
图一五	诺颜山下匈奴墓所出毛毯上的纹饰	( 31 )
图一六	诺颜山下匈奴墓所出毛锦上的纹饰	( 32 )

- 图一七 阿巴根大型遗址平面和复原简图 ..... (33)
- 图一八 阿巴根大型遗址所出瓦当 ..... (34)
- 图一九 阿巴根大型遗址所出铺首 ..... (34)
- 图二〇 匈奴第二次西迁遗物：丝织品上的菱文 (a)、玉璜 (b)、  
弓弭 (c) 和铜镜 (d) ..... (36)
- 表二 匈奴第二次西迁遗物与分布地区 ..... (36)
- 图二一 弓弭所在的位置 ..... (37)
- 图二二 印欧语系的游牧民族使用的铜镜 ..... (37)
- 表三 佉卢文字表 ..... (41)
- 图二三 民丰、楼兰发现的有希腊、罗马雕饰风格家具上的各种  
纹饰 ..... (44)
- 图二四 白沙瓦大塔 (雀离浮图) 平面 ..... (46)
- 图二五 白沙瓦大塔址发现的铜舍利盒 ..... (46)
- 图二六 冯素弗墓发现的玻璃鸭形容器 ..... (49)
- 图二七 日本玻璃勾玉 ..... (51)
- 图二八 南京象山王氏墓发现的玻璃杯 ..... (52)
- 图二九 南京象山王氏墓发现的金刚指环 ..... (52)
- 图三〇 东晋南北朝时期亚洲政治形势 ..... (55)
- 图三一 大同发现的高足鎏金铜杯 (a、b) ..... (57)
- 图三二 景县 (a) 和韩国庆州发现的玻璃碗 (b) ..... (58)
- 图三三 安阳范粹墓发现锤铍胡腾舞纹饰的扁壶 (a) 和景县  
封氏、祖氏墓发现的大尊 (b) ..... (61)
- 图三四 景县高雅墓发现的瓷壶 (a)、伊朗出土的银壶 (b) 和  
祁县韩裔墓发现的青绿釉鸡首壶 (c) ..... (62)
- 图三五 大同云冈第二期石窟雕刻有西方因素的各种柱头 ..... (63)
- 图三六 大同云冈第 10 窟门神所著冠饰 ..... (64)
- 图三七 大同云冈第二期石窟中的莲瓣装饰带 ..... (64)

- 图三八 大同云冈石窟忍冬纹由简单向繁缛发展 ..... (65)
- 图三九 三原李和墓石棺上的联珠野猪纹 (a) 和人面纹 (b) ..... (66)
- 图四〇 常州南朝画像砖上的瓶花 ..... (69)
- 图四一 日本奈良新泽千塚发现的玻璃碗 ..... (70)
- 图四二 西伯利亚突厥遗迹出的秦王镜 (附镜铭录文) ..... (73)
- 图四三 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彼兴古城址 (碎叶城址) 平面 (a) 和  
所出残石像足座 (b)、瓦当 (c) ..... (75)
- 图四四 阿克彼兴古城址内佛寺 (大云寺) 平面 (a)、洛阳龙门  
石窟双窟平面 (c) 和唐代寺院中的弥勒佛倚坐像 (b)  
..... (76)
- 图四五 昭武九姓的位置和东进中国的主要路线 ..... (77)
- 图四六 乌兹别克撒马尔干阿弗拉西阿勃遗址 (康国) 平面 ..... (78)
- 图四七 阿弗拉西阿勃第二层外城内宫殿遗址北部方形殿堂址  
平面 ..... (79)
- 图四八 阿弗拉西阿勃第二层外城内方形殿堂内壁画的布局 ..... (80)
- 图四九 片治肯特古城 (米国) 平面 ..... (80)
- 图五〇 片治肯特古城外城寺院遗址壁画中所绘织物上的四瓣小花  
与勾云纹饰 ..... (81)
- 图五一 布哈拉川华拉赫沙古城 (安国) 平面 ..... (82)
- 图五二 大食范围示意 (附著录唐镜、唐五代瓷片出土地点) ..... (83)
- 图五三 新疆阿斯塔那发现的波斯纬锦上的联珠野猪头纹饰 ..... (86)
- 图五四 西安何家村唐窖藏中的玻璃碗 ..... (89)
- 图五五 陶瓷器仿金银器举例 ..... (89)
- 图五六 陶瓷碗 (杯) 仿金银器造型的变化 (a)、仿西亚胡人驯  
狮、象的青瓷扁壶 (b) ..... (90)
- 图五七 西安、洛阳发现敷地砖 (a) 和波斯宫廷石膏装饰上的  
纹饰组合 (b) ..... (91)

---

图五八	西安附近石刻中常见的缠枝海石榴纹饰 .....	(91)
图五九	扬州发现三彩瓷片上的纹饰 .....	(93)
图六〇	敦煌发现的金银器 .....	(94)
图六一	辽阳发现带饰上刻划的胡瓶 (a) 和出土的双螭铜瓶 (b) .....	(94)
图六二	韩国庆州新罗墓出土的高足玻璃杯 .....	(97)
图六三	伊朗希拉夫港口出土的白瓷碗 .....	(102)
图六四	高元珪墓壁画中的坐椅 .....	(105)
表四	宋元时期亚洲主要政治区域的兴衰示意 .....	(108)
图六五	无为宋塔发现盛舍利的玻璃瓶 .....	(109)
图六六	龙泉碗底类似菊花纹的贴饰 .....	(111)
图六七	伊朗发现青花玉壶春瓶颈部莲瓣饰带内书有“90”数字 .....	(112)
表五	东西方分区年代简表 .....	(116)

# 前 言

(1980 年稿)

前言准备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解释一下这个题目和与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第二部分说明一下我们所指的西方的范围和这个范围内的考古工作的问题；第三部分讲讲本专题的内容和次序。

## (一) 解题

“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这个题目，顾名思义，我们是要强调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古发现，并不是讲全面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考古，大家都知道，它所涉及的绝大部分都属于物质文化，因此，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这里就不会牵涉很多。就是物质文化方面，也还要较多地局限于发现，现在还不能讲得很系统；相反，资料零散是这个专题的实况。上面说了，我们要强调考古发现，为了说明考古发现的性质、意义，必然要牵涉到遗迹、遗物的历史背景，但是这里讲的历史，既是很有限的又不会是有系统的。可是中国历史简况大家要胸中有数，不然就搞不清考古发现的意义了。因此，关于中西历史，同志们要自己在下面复习。为了方便大家接触第一手汉文文献史料，讲稿的最后专设附录一节，简单介绍一点和中西文化交流关系密切的我国古代文献。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不是孤立发展的，都是吸收了邻近国家和民族，甚至较远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作为自己文化发展的借鉴的。当然，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的根据，是他们本民族和自己的国家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成果，这是一个原则，忘掉了这个原则，就变成了

“外因论”了。过分强调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的外来因素，是帝国主义的惯用手法，他们的目的，很清楚是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的。过去曾吵嚷一时，现在也还有人鼓噪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即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任何民族和国家之所以能存在和发展，都是因为其具有优秀、进步的东西。因此，民族和国家间的文化借鉴都是相互的，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即使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存在着先进、后进的不同，也是如此。顶多是在相互影响的方面有多有少，相互影响的范围有深有浅。这种多少深浅，也还不是一成不变的，某些时间少些、浅些，某些时期也可能多些、深些。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和许多民族经过长期融合而逐步形成的。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使中国成为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这是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从某一个角度讲，这也是中华民族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但是，只有中华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是不够的，和中华民族以外各民族，特别和西方几个文明发达最早的民族和国家直接、间接的长期往还，彼此间的文化交流相互促进，影响面之广泛，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考古资料不可能很全面，但把了解到的各个遗迹辑录起来，也可以看到中西文化交流从遥远的古代到中古时期日益向纵深发展的许多事例，它将有力地告诉我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交流，必然日趋频繁。这一点，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都在许多方面提供了愈来愈清楚的事实，但近代、现代已不属考古的范围。因此，我们这个专题就终止于中古时期，具体到汉族历史，即是迄于宋元时代。但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将讲的内容尽量向后延长，希望讲到晚唐五代。

## （二）西方的范围

从考古发现看中西文化交流，我们自己的发现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西方的发现。这里所说的西方，主要是指以下的四个地区：

1. 地中海东部沿岸，包括小亚细亚、北非、希腊；

2. 两河流域—伊朗高原。这个地区和第一个地区的一部分，近年西方国家喜欢把它们联系到一块，叫新月形地带。这不仅因为连起来像新月的形象，更主要的是他们之间关系密切；

3. 印度河中下游和恒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今天前者绝大部分都在巴基斯坦境内，后者在今印度范围之内；

以上三个地区和我国一样，都是文明发达最早的地区。这三个地区和我国相互交往，在陆路上都要经过中亚，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西方也要包括中亚，即第四个地区。

4. 中亚。我们所说的中亚，大体上是从北边的额尔齐斯河北，经伊犁河、锡尔河，到阿姆河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里的锡尔河、阿姆河都流入咸海，是一组双子河，我国古文献叫锡尔河作“药杀水”，阿姆河叫“妣水”或“乌浒水”，把两河中间的地带叫河中府。河中地区是中亚的重要地带。上面所说中亚的范围，现分属于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五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阿富汗。

上述四个地区的考古学，20世纪以来发展很快。前三个地区考古学的发展，有它们的共同点。二次大战前这三个地区的考古工作，绝大部分操纵在帝国主义国家手中，帝国主义者为了对这些地区的国家和民族侵略、掠夺，虽然也有些重要发现，但这些发现的意义，大部分都被他们所歪曲，甚至成为污蔑发现所在国和民族的所谓证据。二次大战后，第三世界人民在觉醒，三个地区的国家和人民为了反抗侵略，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加强民族自信心，配合自己的经济建设，促使了考古工作的发展，因此，考古成果的积累远远超过了大战之前。时代不同了，第一、第二世界某些国家为了能够继续在这个地区进行一些考古工作，也只有老老实实和有关国家合作，才能做出些有益的成果，例如法、日、意、西德和美国等的学术团体在西亚、北非各国所参加的发掘。苏联控制下的中亚地区，情况正好相反，他们从50年代后期就在沿我国边境的广大地区，开展了所

谓的考古工作，他们工作的针对性很强，首先是要分裂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抹杀中亚地区和东方在历史上形成的密切关系，并妄图利用早已破产了的“文化西来说”，来否认我们这个在东方的文明发达最早的中心。事情总不会像侵略者想象的那样，他们的工作虽然不少，但可以供他们找借口歪曲事实的材料并不多，尽管他们对发表的材料任意剪裁，但事实的真相，不可能永远被埋葬，他们的报告文章，有时也对我们有些用处。

上面说的这些国外的考古工作，我们从各方面知道了不少项目，可是我们能进一步了解其具体内容的却不多。前些年人为的限制和多年图书期刊的欠完备是使我们闭塞的重要原因；各种文字的限制和我们学术情报工作不及时，也是原因之一；当然，像对中西文化交流这样内容复杂的考古工作的综合研究，更需要集体力量去进行。现在只就个人初步了解的情况粗粗地整理了一遍，不少想法有的参考了某些外国人的意见，不管是人家的看法，还是我们自己的，都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更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 （三）本专题内容次第

这个专题准备按我国汉族历史的朝代顺序讲，商周（一）、战国（二），各占一题，两汉魏晋原连在一题（三，分上下），现分为（三）、（四），东晋南北朝（五）占一题，隋唐五代（六）和宋元（七）各占一题。每个题目，先讲一点该时期的有关历史背景，然后据已知的情况列若干子目再讲具体的内容和问题。另外，前面说了要讲一点和中西文化交流关系密切的汉文古文献，作为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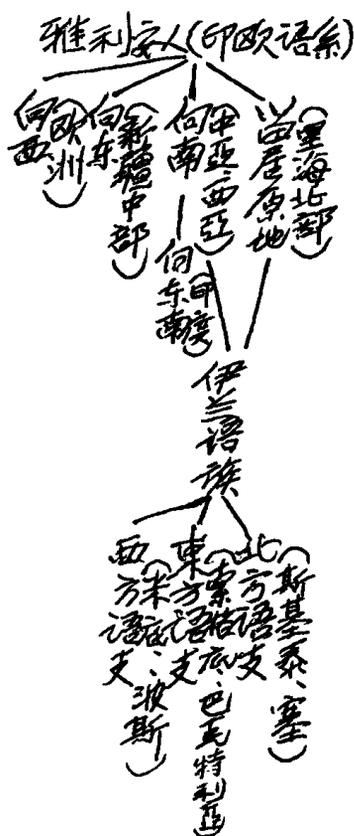
# 一、商周时期（前 16～前 5 世纪）

（1980 年稿）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较为可靠的中西文化交流，大约始于公元前二千年，即公元前 20 世纪到前 11 世纪这个阶段的中期。这个时期，地中海东部沿岸，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和中国都处在青铜时代的盛期，大体上也都处于奴隶制时代。奴隶主的贪欲，虽然刺激了东西交通的发展，但东西方交通的打开，最根本的还是始于人民之间的交往。在早期东西文化交往中，介于东西之间的畜牧和游牧民族起了很大的中介作用。

当前二千纪之初，居于里海北部的雅利安人，由于青铜器的使用和内部的分化以及气候的变化等原因，开始向四方迁徙：向南到了中亚、西亚；东南进入印度；向西进入欧洲；向东还有一支越过葱岭到了我国新疆的中部地区（表一）。向南这一支和留住原地的雅利安人，在语言系统上都属印欧语系的伊兰语族。伊兰语族的雅利安人一般分三语支：

北方语支 游牧在从里海北以迄西伯利亚一带，在南西伯利亚考古文化上，大约相当于安德罗诺沃文化（前 2000～前 1000 年初）与卡拉索克文化（前 1200～



表一 原住里海北部的雅利安人迁徙后的分布简况

700年)时期。这北方语支的人,大约在前1000纪初开始了骑马游牧。从前1000纪的中期起,希腊、罗马人叫他们作斯基泰—萨尔玛提亚,我国汉朝叫他们作塞,再早的时期,商北方的鬼方和周的狄,可能和这一支有关系。

**东方语支** 主要也是游牧经济,他们分布在咸海以东,葱岭东西,即西亚历史上的索格底、巴克特里亚,也即我国历史上的康居—粟特和大夏,深入我国河套地区的月氏以及南北朝时的稽胡、唐代的九州胡大约和这一支有关系。这东方语支的雅利安人,至晚在前1000纪前期,也有相当一部分开始了骑马游牧。

**西方语支** 比较早的时期就注意了农耕,也经营畜牧,但远不像上述的那两支那样流动游牧,他们主要分布在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即西亚历史上的米底人和波斯人(合起来也叫伊兰人)。大约在前二千纪中期,这部分人中的一部分又向东越过苏莱曼山脉进入印度河中下游,即是印度雅利安人的祖先,这一支与这里的西方语支的伊兰语族的也还有区别。

前两语支东西游牧和我国早就发生了关系。他们迁徙无常,居无定所。他们向东游牧的一大批和我国北方民族在前一千纪前后就开始相互融合了。因此,这部分伊兰语族的雅利安人,有的也应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以上这些游牧民族,我们以后就暂叫它作伊兰语族的游牧民族。这支游牧民族,看来并不比下面讲的另外一支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民族——即后来匈奴系统的游牧民族,接触黄河流域文化为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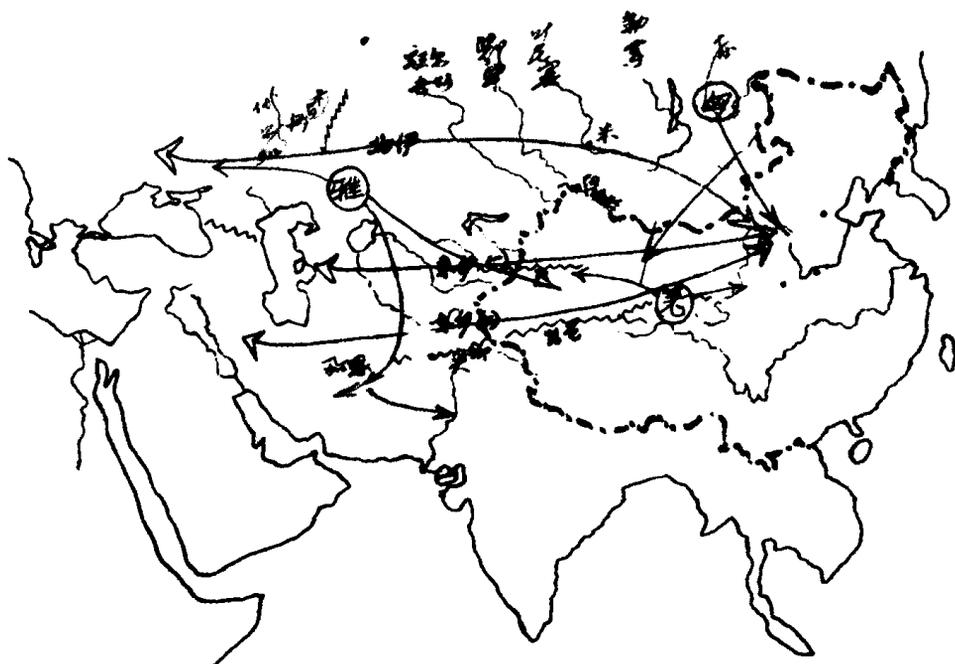
属于东方人种的游牧民族猥狁、獯鬻即匈奴的前身,大约在前二千纪的晚期,在上述伊兰语族民族的东北方逐渐强大起来。他们从蒙古高原南下游牧,前一千纪中期到达了河套地区。由于和伊兰语族的游牧民族在经济生活上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当它们强大之后,不仅把伊兰语族游牧民族的势力从中切断,甚至阻挡了他们向东发展,而且还把伊兰语族游牧民族向最东发展的部落吞并了不少,这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某些伊兰语族游牧民族和我们北方民族相互融合的部分。

另外还有两支定居和半定居的民族：

一是上面提到的在前二千纪从里海北部向四方迁徙时，向东越过葱岭到达新疆中部的雅利安人，他们逐渐在这里发展了农业和畜牧业，因而定居下来。这一支雅利安人的语言系统目前还未弄清楚，但知道它不是伊兰语族。

另一支是分布在今陕西、甘肃、青海西到新疆的羌。羌，牧羊人也。羌是定居的或是半定居的畜牧民族，在前二千纪末期，就和商周，特别和西周发生了较密切的关系，因此他和商周民族的融合，比以上所讲的各民族要早，也要深入。这个民族所属不清楚，从他的地理位置可以估计，他虽属东方人种的系统，但受到雅利安系统的影响，而且愈处在西边的，所受的影响也愈多。

以上这几支流动的游牧民族与定居和半定居的畜牧民族，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上，都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把他们的情况事先简单介绍一下，下面再具体讲重要的考古发现（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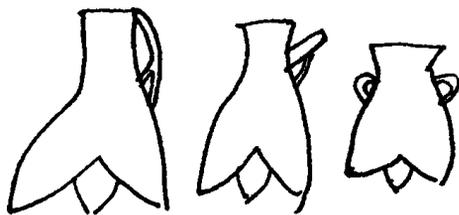


图一 早期游牧和畜牧民族活动范围示意

## 1. 中亚、西亚地区发现的陶鬲

近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在中亚和西亚发现一种类乎于黄河流域常见的三足陶鬲。根据调查知道，这种陶器是前二千纪末期突然出现在东迄巴基

斯坦北部，西经伊朗北部的里海南岸，迄伊拉克北部的广大的游牧地带；在伊朗北部，大约一直存在到前一千纪的晚期。这里的陶鬲，并不完全和黄河流域的相同，我们见到的有三种形式（图二）：三种鬲的样式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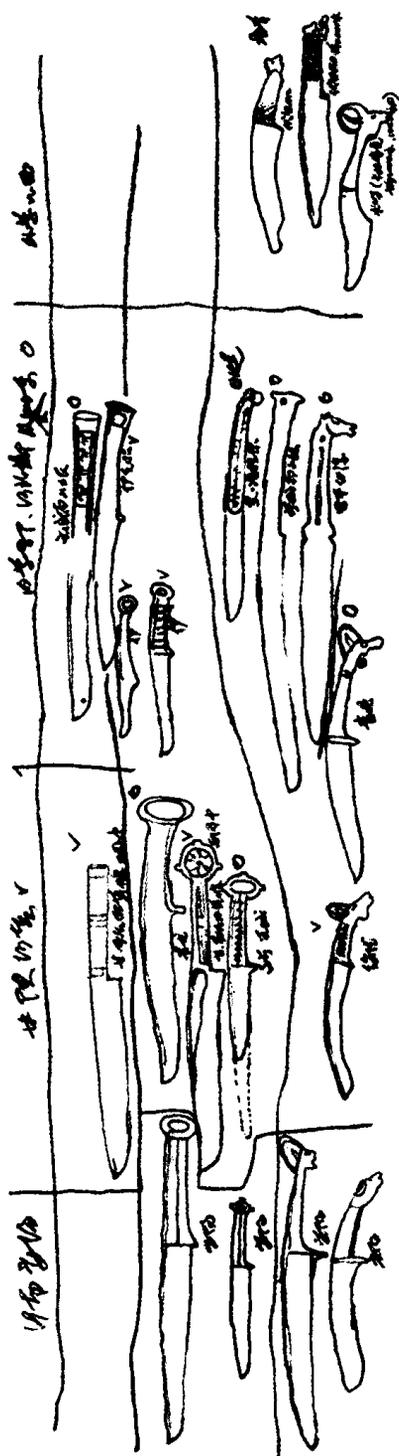
图二 中亚、西亚发现的陶鬲

不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尖裆。尖裆鬲在前二千纪末前一千纪之初，还存在于甘肃和内蒙一带，这个地带正是中原和伊兰语族的游牧民族，还有畜牧民族的羌等生活的草原区域相接触的地方。大耳下部出分歧、环形耳、流下有支撑，这些在黄河流域不见或少见的做法，应当都和畜牧、游牧民族生活流动、喜欢便于携带、吊起来使用的器物有联系。我们当然不能设想像易碎的陶器，能够直接从黄河上游地区传到中亚，乃至西亚。但作为黄河流域文化特征的陶鬲，如这种触火面积大、有迅速煮沸而又易于制造等优点的陶鬲，是有可能经畜牧、游牧民族的介绍，经过间接的传播而影响到中亚乃至西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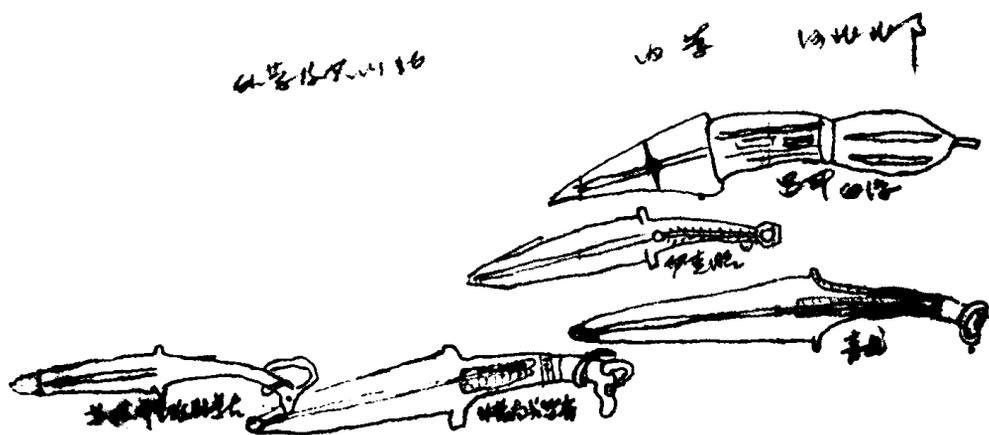
## 2. 东西方发现的青铜刀子和剑

和这种陶鬲大约同时，西从里海北的卡马河流域（安德罗诺沃文化），东经贝加尔湖南（克拉索克文化）一直南到长城沿线、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部和河南北部，都发现了一种柄端饰以兽首或环首的青铜刀子（图三）。从时间上看，大约都在前二千纪的后期或稍迟到前一千纪之初。柄端多饰以大角羊首；环首青铜刀有的环周附有三个向外的凸起，还有的做出铃饰。大角羊首者南北都有，环首的似流行于自河套以南的地区。这

种刀子刀身略有弧度，刃在内侧。另有一种内外侧都有刃的曲柄匕首，柄端饰以大角羊头或铃饰，分布地点从贝加尔湖以南一直到长城沿线，时间也在前二千纪的后期或稍迟（图四）。以上这两种青铜利器，目前还不好推定哪里出现的最早，哪里是它们的发源地。但从形制相似，特别是柄饰的相似，可以估计它们应该是有关系的。这两种青铜利器——刀子和匕首，从用途上考虑，应是畜牧、游牧民族的食具和用具，因此最初和惯用它们的应是畜牧、游牧的民族。前面讲过伊兰语族的雅利安人的北方语支、东方语支，还有羌族，他们都是放牧的民族，而处在黄河流域的商和周，他们当时的畜牧经济也占有重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过直接、间接的各种交往，相互影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来黄河流域中下游畜牧因素微弱了，因而这两种利器也就少见了；但在河套辽河一线，在前二千纪后期以后东方的畜牧、游牧民族——匈奴、东胡系统的民族强大起来，刀子在这个区域也就得到突出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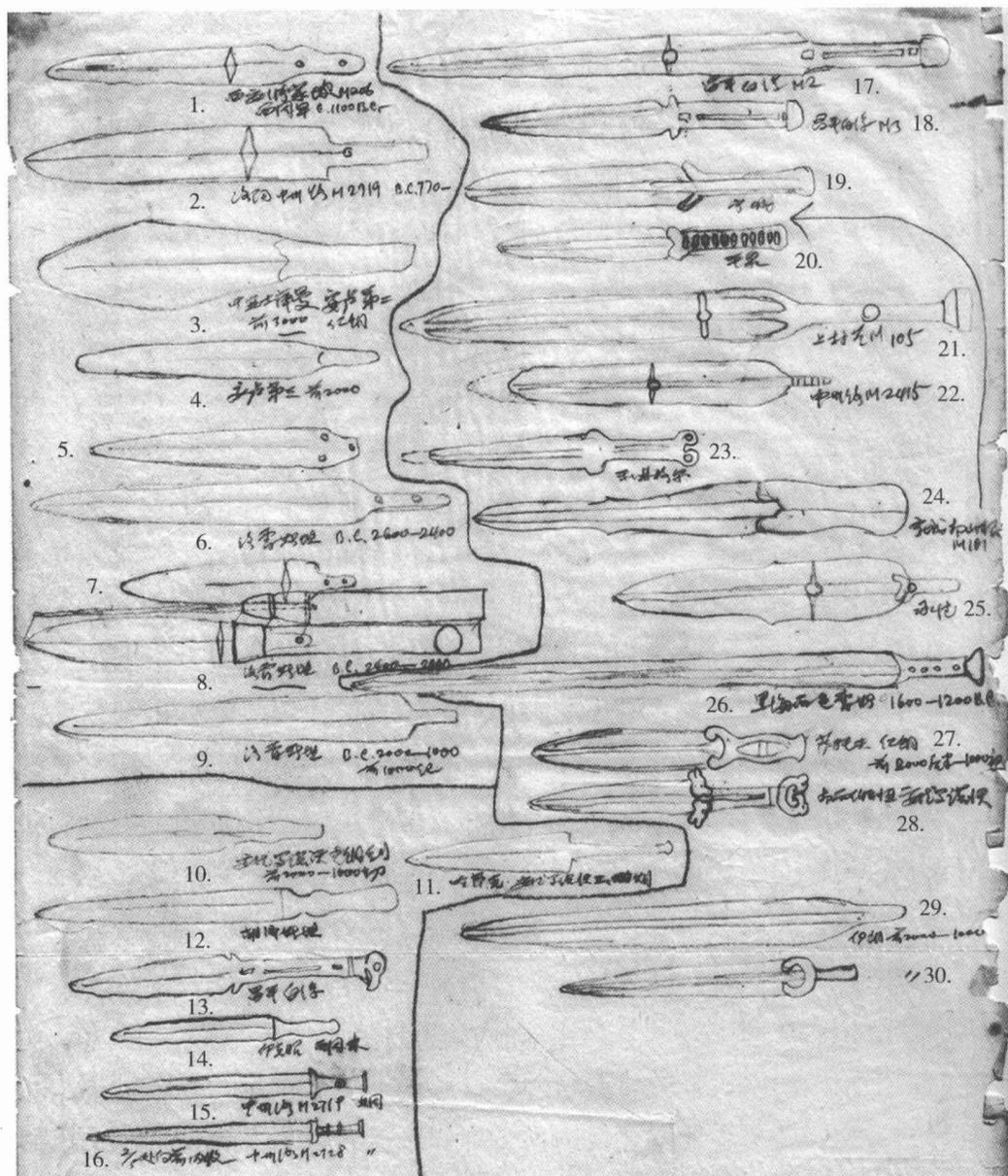


图三 蒙古以西和向东南经内蒙古、甘肃、陕西迄河南发现的青铜刀子



图四 贝加尔湖以南经蒙古迄内蒙古和河北发现的曲柄匕首

1955年在陕西长安县张家坡的一座西周早期（成、康时期，前一千纪初）墓葬中，发现了一柄柳叶形断面作菱形、全长27厘米的短剑（图五：1）。剑柄形制不整齐，又很短，只长5厘米，上面还有两个小孔。1980年在山西翼城西周墓葬也发现类似的短剑。比上述两件发现的时间稍晚一点，在洛阳中州路的东周墓葬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短剑（图五：2），柄上的小孔有的只有一个，有的一个也没有。这几处发现，是我国青铜短剑中最早的形制，张家坡那柄在年代上，迄今还是我国出土的青铜短剑中最早的。但这种剑在中亚、西亚的编年都早得多。中亚南部土库曼共和国安卢的发现是：安卢第二的红铜短剑时代是前3000年（图五：3），安卢第三的青铜短剑是前2000年（图五：4）。西亚伊朗洛雷斯坦青铜短剑的编年是前2600~2400、2400~2000、2000~1000年，柄上的小孔从3~2、2~1到一个也没有（图五：5~9）。这种小孔的用途，也由于这里的发现了解了：它是套较长的剑把，连以铜钉使用的。中亚、西亚的发现是否可以帮助我们探索我国青铜短剑的渊源呢？值得注意。另外，大约在前一千纪之初，中亚和西亚又都出现了带柄的短剑（图五：10~12），我国出现这两种短剑的时间和中亚、西亚相近但略晚，昌平白浮带柄短剑的时间不



图五 陕、晋、豫发现的短剑和中亚、西亚发现的短剑

会早于前一千纪初（图五：13），而（鄂尔多斯）伊克昭盟这类剑肯定要比前一千纪之初为晚（图五：14），中州路的发现更要迟到前一千纪的中期（图五：15、16）。看来，至少西方短剑的发展有可能一直是我国短剑

发展的借鉴。情况还不仅如此，我国大约在前一千纪初期较晚一点还出现了一种断面作“ $\nabla$ ”形的所谓“脊柱式”剑，有长型，有短型，它多分布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较早的昌平白浮出有长型、短型两种（图五：17、18），宁城平泉都出短型的（图五：19、20）。这种脊柱式的剑到了河南，如上村岭所出长型（图五：21），中州路所出接柄的短型（图五：22），在时间上就晚到西周末到春秋即前一千纪的中期了。也就在东西周之际，滦河辽河上游以西流行柄端作出对峙双环装饰的“脊柱式”短剑（图五：23），而在滦河、辽河上游以东，则流行带柄或接柄的曲刃“脊柱式”短剑（图五：24、25）。这种带柄或后接柄的“脊柱式”剑，也是西方出现的时间为早。黑海沿岸长型有柄的脊柱剑出现在前二千纪的中期（图五：26），短型有柄的脊柱剑出现在伏尔加河中下游和南西伯利亚的时间是前二千纪末到前一千纪之初（图五：27）。南西伯利亚的柄端做出对峙的装饰（图五：28）。后接柄的脊柱剑出现在伊朗西南部的时间也是前二千纪末到前一千纪初（图五：29、30）。以上罗列的各种剑，西方出现的时间都比我国早，有的间距较长如断面菱形的接柄的柳叶剑，相差在千年以上，也有的间距较短，如带柄的柳叶剑和脊柱式剑。间距较短的时间，也许不到一百年。间距长也好，短也好，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前一千纪之初开始，我国和西方才在青铜剑上发生了联系。从我国来看，在前一千纪初之前还没有发现剑这种武器，之后这种新的武器迅速发展，类型也迅速复杂化。在西方，剑从前三千纪的红铜时期就开始了，源远流长；到了前二千纪中期以后，类型逐渐复杂；到了前一千纪之初，我国以后不久所有的类型，差不多他们都包括了。这些迹象可以启示我们：我们的青铜剑，起码是北方和黄河流域的青铜剑的出现和发展，是与西方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至于这个密切关系的开始，为什么出现在前一千纪之初？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探讨的。我们知道，剑这种兵器便于防身，在骑马技术出现以后，它又成为马上使用的重要武器；我们还知道骑马技术是在前一千纪之初在中亚、西亚一带开始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伊兰语族的雅利安人的

北方语支和一部分东方语支，开始了马上的游牧生活。骑马游牧，东西奔驰，这就必然加速了东西方的相互影响，青铜剑在东方突然发展和类型急剧复杂，大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其实在游牧民族迅速扩大放牧地区的情况下，东西方相互影响的内容远不只青铜剑。大约在商周时期较晚一点的阶段所出现的的东西影响，多少都应和骑上了马的、迅速发展的游牧民族有关系。

### 3. 丝织品、软玉、绿松石和玻璃珠饰等的东西方传播

黄河流域是发明蚕丝的地点。甲骨文中已有有关蚕丝的文字，商代遗物上也有保存了丝织品的遗痕。看来，前二千纪后期出现了蚕丝，已是毫无问题的了。最近有人研究半坡陶器底上印出的织物痕迹，认为其中有丝织品的遗迹，如果可信，那就把蚕丝的发明提早到前四千纪。所以肯定丝织品是黄河流域文化最早向外传播的重要项目之一，这是由于其实用、美观、轻细的缘故。但由于有机物易朽，到现在为止在国外还没有发现商周时期的丝织品。可是前一千纪的前、中期，西亚人和居住在西亚的希腊人的记录里，都记录东方的特产丝和生产丝的人民。他们对丝的了解，是从他们北方的游牧民族那里得来的。我国丝织品的西传，最初还要归功于游牧东西的伊兰语族的游牧民族和在中国西部的畜牧民族。

我们从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就发现软玉制品了，商周遗址中发现的更多。我国产玉的地方虽然不少，但最好的软玉生产在新疆南部的和田一带。有人鉴定商周的玉制品的原料有的就出自和田。和田，远离黄河流域，在公元之前一千纪后期以前，很长一段，在伊兰语族的游牧民族或是定居在新疆中部的雅利安人的势力范围之内。《管子·揆度篇》记“禹氏之玉”，《史记·赵世家》记载：前 283 年，苏厉为齐遗赵惠文王书：“秦……攻王之上党平阳之西，勾注之南，非王有已……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管子》和《史记》赵世家的时间虽晚，但可以根据它向前推测。《管子》所记的禹氏即是月氏，前面说过月氏是属

于东伊兰语支的；《史记》所记勾注山，即今山西北部代县西北的雁门山，战国时那里是匈奴的范围，但在战国以前，那里正是月氏、北狄等伊兰语族游牧民族的范围，可见早期和田玉之东来，也是要经过这个游牧民族转手的，所以叫它禺氏之玉。这条向东来的路有可能走居延、河套；不走河西走廊，如走河西走廊必要经过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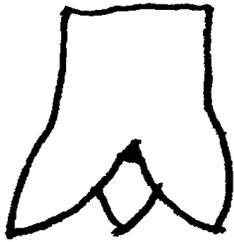
同软玉东来的大约还有高级的绿松石。我们在新石器晚期的遗址中也不断发现绿松石制的各种饰品。一般的绿松石，湖北郧县一带也出产（文献记录是从元代开始的），但漂亮的纯碧绿的高级绿松石，产地以葱岭西中亚的乌兹别克（撒马尔干附近）、阿富汗和伊朗东北部，特别是伊朗北部的最有名。前三千纪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人，就是从这里获得绿松石的。我国新石器晚期遗迹发现绿松石饰品值得注意的一个情况，是甘肃、青海发现的数量和单位都最多。以现在的省为单位，有人据已发表的材料统计，河北、山西、四川、广东各一处；辽宁、陕西、江苏二处；河南、山东三处，青海四处，甘肃十四处。青海、甘肃，特别是甘肃情况突出，看来不一定是偶然现象。商周时期出现了不少镶嵌绿松石的铜器，有的绿松石的质量是很高级的，我们估计甘肃新石器晚期和黄河流域商周时代遗迹中出土的这些高级绿松石制品，其原料有可能是从葱岭西边辗转传过来的。绿松石的东传，当然也要经过伊兰语族的游牧民族和定居在新疆中部的雅利安人以及羌等民族的转手。绿松石具有青绿的色泽，并且仅有 $5^{\circ}\sim 6^{\circ}$ 的硬度，和软玉差不多，有可以随意穿细孔的优点，它强烈地吸引着东西奴隶主们的贪欲，但出产地距离远，产量又不多，所以以出产天然纯碱著名的地中海东岸，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人工仿造它了——即玻璃制品的出现。

玻璃制品，在古代，是地中海东部沿岸的特产。玻璃的主要原料是硅酸盐岩石中的石英，石英含有少量的铁，铁在一般情况下，使玻璃带有绿色，很像绿松石。石英哪里都有，但单纯的石英熔点很高，需要 $1700^{\circ}$ 以上的高温，如加助熔剂可降到 $1400^{\circ}$ 以下。最好的助熔剂是纯碱（碳酸

钠），地中海东岸分布有大量的天然纯碱，所以很早这里就烧制玻璃制品了。从考古发展看，开始制造的大约是居住在那里的腓尼基人。前二千纪的前期，埃及也生产了，前 1584~1343 年的埃及十八王朝的玻璃作坊已被发掘出来，最能代表十八王朝玻璃高水平的是一座王陵里出土的多种颜色的玻璃珠、管和在一些金属器上镶嵌的玻璃饰件。到前 11 世纪埃及又制造出了透明玻璃制品。埃及的玻璃制品在前二千纪末的地中海东岸和西亚一带的遗迹中，广泛地被发现。前一千纪初，地中海东岸也生产玻璃珠、管之类的饰具。玻璃珠管饰，物美价廉，而且彩色多样，所以它很快地不仅代替绿松石制品，而且还可以代替其他矿物质、动物质的装饰如翡翠、水晶和珊瑚等制品。近年在陕西宝鸡、扶风西周晚期墓中发现的玻璃珠、管，它的形状大小和地中海发现的很相似，有人怀疑它是西方传来的，这是有可能的。西方玻璃制品除了以天然纯碱作助熔剂之外，他们涂玻璃质釉的器物也有用铅丹作助熔剂的，因此，即使我们化验西周晚期墓所出土玻璃珠、管有铅的成分，也不排除西来之可能。一类东西的出现，要注意它在这个地区是否有传统，还要注意它是否以后有所继续发展。空前绝后的器物就值得怀疑了。这种人造的具有漂亮颜色和光泽的玻璃珠饰传入我国以后，不久，我们就像使用绿松石一样把它镶嵌到铜器上，洛阳曾发现一件西周晚期的铜鼎，其上就镶嵌了玻璃珠。玻璃珠管装饰品的传来，当然又和上述的情况相同，是经过伊兰语族的游牧民族和居住在新疆中部的雅利安人以及羌人为中介的。

#### 4. 东方发现的晚期铜剑和带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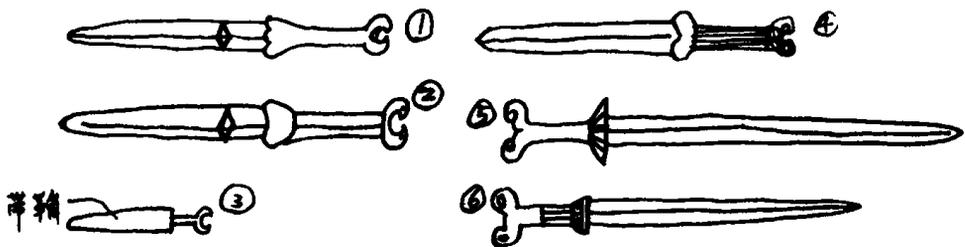
在上述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介的民族中，伊兰语族的游牧民族的作用可能更大些，因为他们可以东西奔驰，直接传播。这种多年来的传统情况，到了前一千纪的中期，出现了变化。北边的匈奴系统的游牧民族势力逐渐强大了。尽管匈奴与伊兰语族的游牧民族，在人种上、语言上都不相同，但在经济生活中都是骑马的游牧民族，因此，在他们强大的过程中，



图六 前一千纪中期  
匈奴地区发现  
的尖裆鬲

必然首先是汲取了比他文化高的伊兰语族游牧民族的青铜文化。又因为匈奴基地在东方，他们和黄河流域的居民，尽管中间有伊兰语族游牧势力的间隔，但游牧民族是迁徙无常的，事实上不可能完全隔断，因此，匈奴系的游牧民族也很早就和黄河流域的文化有了接触。所以，在前一千纪中期以后不久的匈奴遗物中，就兼有东西方文化的因素，同时还表现出东方因素的器物，比传到西亚的更接近东方，如尖裆鬲（图六），西方因素的器物比传到华北黄河流域的更接近中亚和西亚，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前一千纪中期东西出土的柄端作出对峙装饰的短剑看到。河套地区的前5~6世纪的匈奴人墓所出短剑（图七：1）与中亚所出的短剑极为相似（图七：2），西亚伊朗前6世纪的浮雕中表现的带鞘短剑也是作出同样的对峙柄饰（图七：3）。这种对峙柄饰在河套东部有的也作出双环形（图七：4）。怀来这种柄饰的剑在前一千纪的晚期出现在东北（图七：5），后来经过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的九州北部（图七：6）。

前面讲过在滦河、辽河上游以东流行接柄的曲刃“脊柱式”剑，在前一千纪的中期以后也向东向南分布，沈阳和承德的发现，颇有相似之处，沈阳还发现了剑柄的遗迹或铜制的剑柄。这种剑后来也经由朝鲜半岛（平壤附近），传到了日本本州岛的东部，但如日本山口剑的时期恐怕要迟到



① 桃儿洼 ② 哈纳克 ③ 伊朗 ④ 怀来 ⑤ 东北西平 ⑥ 日本佐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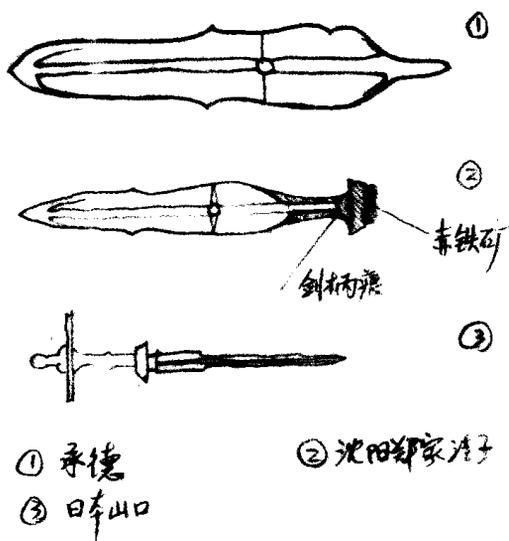
图七 晚期的青铜短剑（一）

公元前后了（图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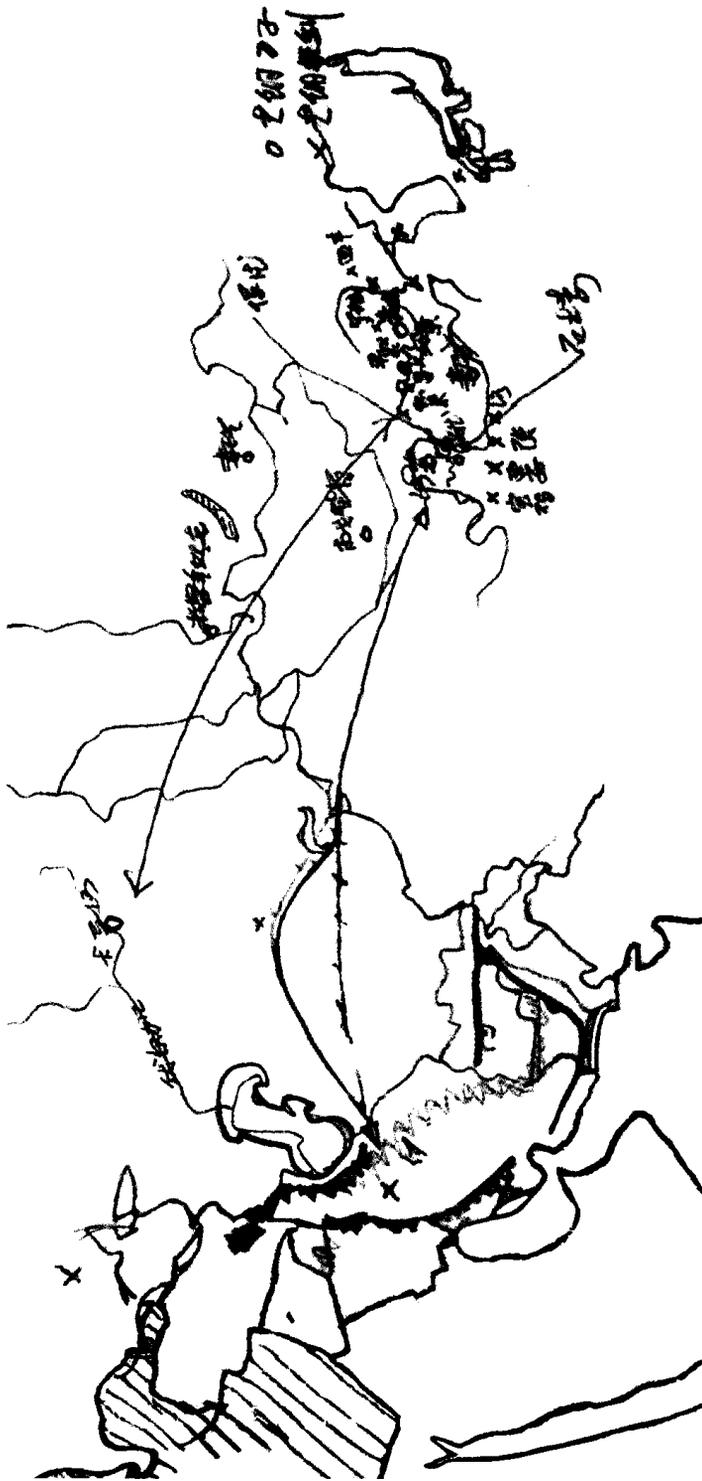
和上述河套地区所出晚期的短剑同时，匈奴遗物中还有一种兽形小带钩。河套地区所出多卧羊、牛形和羊头的小带钩（图一〇：c），这与西亚、西伯利亚所出卧鹿（图一〇：b）、卧羊（图一〇：a）、狗头等形象者类似，其形象的内容是游牧地区经常接触的动物，钩端内曲。到了黄河流域就改为外曲，其形象多虎形、蛇身怪兽（图一〇：d）和立鸟等

中原常见的动物形象，不久钩身就出现了琵琶形（图一〇：e）。这种（中原常见的）小带钩和上述铜剑情况相同，也经由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这里牵扯到东北、朝、日的发现，特别是朝、日的发现其时间已超出本题的商周时间范围，但为了这部分前后联系的紧密，就上下连讲下来了。这点，请同志们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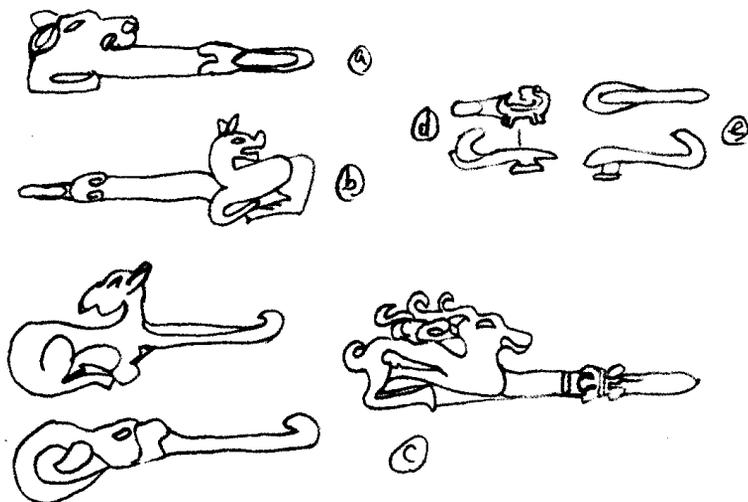
商周时期，我们讲到春秋战国之际，即从前二千纪中期到前一千纪中期，我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是通过我们当时边境地区畜牧游牧民族为中介而进行的。先是雅利安人伊兰语族的北支、东支的人民，还有不明语系定居于新疆中部的雅利安人和定居在黄河上游、河西走廊西到新疆的羌人，后来匈奴也加入了中介的行列。陶鬲、丝织品是从东向西传播的有代表性的遗物，青铜短剑、优质高级的绿松石和玻璃制品是从西向东传播的有代表性的遗物。柄端作出对峙装饰的短剑和小带钩，大约是经过匈奴系的游牧民族传到东方的西亚、中亚游牧民族的器物。当然，无论西去的还是东来的，都不可能一成不变，相反都有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某些外来的文



图八 晚期的青铜短剑（二）



图九 青铜刀子、短剑发现的范围示意



图一〇 西亚、西伯利亚和中国境内发现的带钩

化器物到了新的地方，必然要根据新的地方的传统和用途而有所改革，这种改革又是和它的祖形差别很大，西去的陶鬲的变化和东来的短剑后来在河北北部、东北地区出现了曲刃的形式，都是很好的实例。

中西文化交流不应包括朝鲜和日本的发现，但这里和以后的讲述中，凡提及朝鲜、日本的发现是只限于和西方有关的并经由大陆而东传的器物。纯属中国影响朝日的，就不是这个专题所能涉及的了。

在中亚、西亚的新石器初期遗址里发现大批牛骨、马骨，但是否是畜牧，还是野生牛马的遗迹，尚有争论。但在安卢第一（前 4000 年）已驯养牛、猪和羊，安卢第二已驯养马和驼（前 3000 年）。中亚和苏联欧洲部分墓葬殉马，出现在前 3000 年末，前二千纪中期，马已普遍被使用于驾车。

## 二、战国时期（前 5～前 3 世纪， 前 475～前 221 年）

（1985 年稿）

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北部和西部，总的形势和春秋晚期差不多。河套以东是匈奴的势力，河套以西是伊兰语族的月氏的势力，再向西向南就是伊兰语族塞人的范围。这几个系统的游牧民族在这个阶段仍然起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中介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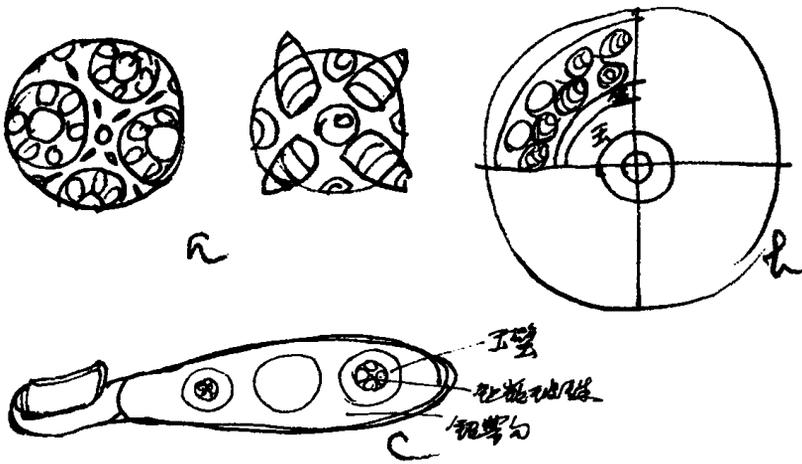
在西亚是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后期，前 334 年马其顿—希腊王亚历山大东侵，前 332 年攻下埃及，前 331 年攻占两河流域，前 331～330 年侵据了古波斯帝国的两个都城——苏萨和波塞波利斯，然后又引兵向东北，前 327 年攻占了巴克特里亚（大夏），前 326 年又向北进入索格底（粟特）区域，越过了阿姆河（妫水，乌浒河），攻下索格底的中心撒马尔罕，前 326 年一直向北侵略到锡尔河（药杀水），这样就侵据了古波斯帝国的全部领域，北边就和塞人的游牧区相毗邻。之后转向南抵印度河流域。前 325 年被迫回师，前 323 年死去。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希腊分裂。西亚地区由亚历山大的将领塞琉古统治，前 312 年建立由希腊人统治的塞琉古王朝，即我国历史上所记的条支。在亚历山大东侵以后和塞琉古王朝的前期，大量希腊人移居东方，在许多地点建立了希腊式的城市。考古发现距我国最近的一座是在今阿富汗西北、阿姆河畔的埃伊哈努姆。这个希腊式的城址是 1965～1968 年发现和发掘的（阿、法合作），城址东西 6～7 公里，南北 8 公里，以官衙、神殿为中心，围绕半圆形剧场、体育场和住宅，出有希腊文石刻、希腊石雕等，是一座典型的希腊小城

市，它的时代应在前 300 年前后。1973 年出版了发掘报告。这份报告是我们了解战国时期和我国最近的中亚地区的希腊文化遗址的主要资料。前 128 年张骞到大夏时，这个希腊城市还存在，由他经行的路线看，他有可能到达了这里，因为这个城市距大夏都城蓝氏城不远。蓝氏城即马扎里沙里夫，在这个城市西北不过 200 多公里。前 3 世纪中期，塞琉古王朝的东部独立了两个国家：巴克特里亚（大夏）独立了，它的西边还独立了一个帕提亚（安息）。巴克特里亚（大夏）虽然独立了，但他的统治集团还是希腊的势力，当然也要包括东支伊兰语族的巴克特里亚人的上层。帕提亚是北支伊兰语族的游牧民族南下建立的国家。帕提亚在西，巴克特里亚在东。巴克特里亚的北邻是塞人，塞人东面就和河套以西的月氏接近了。巴克特里亚的东边到了葱岭西麓，和居住在当时新疆的各民族相毗邻。从这样的地理位置可以估计，当时中西文化交流，在中间的雅利安系统的游牧民族和畜牧民族所起的作用要比匈奴重要，以前葱岭东边的玉和葱岭西边的绿松石、玻璃大约仍然靠他们向东运输。

### 1. 镶嵌玻璃珠饰的东传和中亚发现的战国器物

前一千纪中期，在西方是希腊奴隶制繁荣时代，地中海沿岸遍布了希腊各城邦的移民城市。手工业、商业发展很快。地中海东部沿岸的玻璃饰品，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式样，其中的镶嵌玻璃珠最为希腊人所喜爱。这种被希腊人所喜爱的镶嵌玻璃珠随亚历山大以来的向东移民而东播，再经上述的中介民族传到了黄河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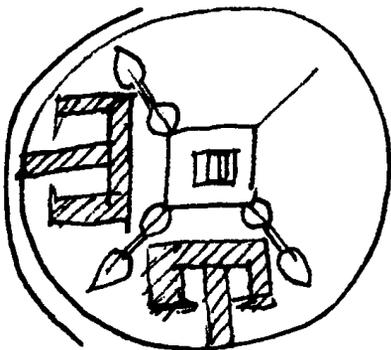
镶嵌玻璃珠是在像绿松石那种颜色——青绿色的玻璃珠上再镶嵌各种颜色、大小不同的小玻璃珠，并使之组成非常美观的各种花纹。这种玻璃珠在河南洛阳（韩）、辉县（魏）和湖南长沙（楚）、湖北随县（曾）的战国墓中都有发现（图一一：a）。湖北云梦秦墓中，还发现了它的仿制品。更值得注意的是洛阳金村战国墓中曾发现一件背面镶嵌玉环和上述那种美观的玻璃珠的铜镜（图一一：b）。解放后，在河南辉县固围村的战国墓中



图一一 镶嵌玻璃珠(a)和镶嵌玻璃珠的铜镜(b)与带钩(c)

发现镶嵌玉璧和这种玻璃珠的银带钩（图一一：c）。这几件器物，表明这种新式的玻璃珠传入不久，我们的工匠就把它像过去使用绿松石一样装饰到金属器物上去了。

上述那些游牧和畜牧民族，从东向西，除了带去传统的丝织品，还带去了当时中原新兴的一种工艺品——纹饰精致的铜镜。苏联中亚哈萨克共和国和阿尔泰山麓，都发现了战国山字纹铜镜（图一二）。这个地区是在北方支系的伊兰语族游牧民族塞人的势力范围之内。1947~1949年阿尔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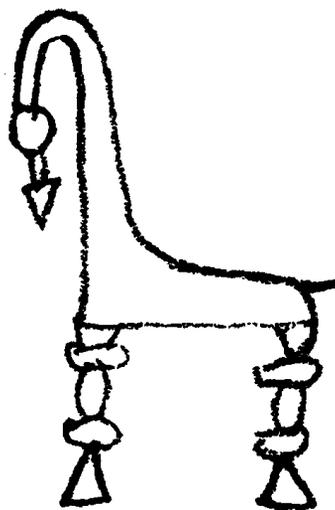
图一二 山字纹铜镜

山北麓巴泽雷克河谷发现了不少积石墓，这批墓经碳十四测定其年代在前一千纪的后半。积石塚下挖土圻，圻中施木椁两重。椁室殉马，多的可达10多匹，有的还有四轮木制马车，出了不少马具。椁中多出毛织品，纹饰的风格是他们自己的。其中M5出土的毛毡壁衣上织出骑士和坐在椅子上的女神的形象，女神所坐的椅子是当时地中海东部和西亚一带

流行的家具式样（图一三）。这座墓还出了我国的凤鸟纹样的刺绣。M6 出土了一面山字纹镜。这批墓的发现，说明墓主人是北方支系的伊兰语族的游牧民族，通过东西的游牧，把西亚、中亚和中国的器物汇集在一起了。

## 2. 胡服骑射

前 307 年赵武灵王下胡服令，决定普及胡服。这件事，在中西文化交流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胡服即是指游牧民族的服装。赵武灵王当时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三胡，不仅指匈奴系统的胡，也包括伊兰语族的胡。其实匈奴也好，伊兰语族的胡也好，在服装上，由于都是骑马奔驰，这时大约已没有大的差异了。赵武灵王提倡的骑射，目的是为了备战。而传统的东方服装是宽大的外衣和裹绕的牛鼻褌式的下衣，就很不适用了。宽大的外衣，特别是裹绕的下衣，怎么能便于骑马射箭呢？于是游牧民族的窄袖短上身和双腿裤子在部队里流行起来。马上使用的武器短剑也流行起来。胡服紧装，需要扎腰带，皮带带钩也随胡服而普及了。这里主要还是以剑和带钩为例作一些叙述。剑和带钩，从战国到两汉发展很快，各地都有发现，样式也越来越和游牧民族不同，突出的一点是剑身向长发展，带钩的形体向大发展，用玉作装饰的做法也出现了。剑身用铁以后，变化很大，我们下面还要提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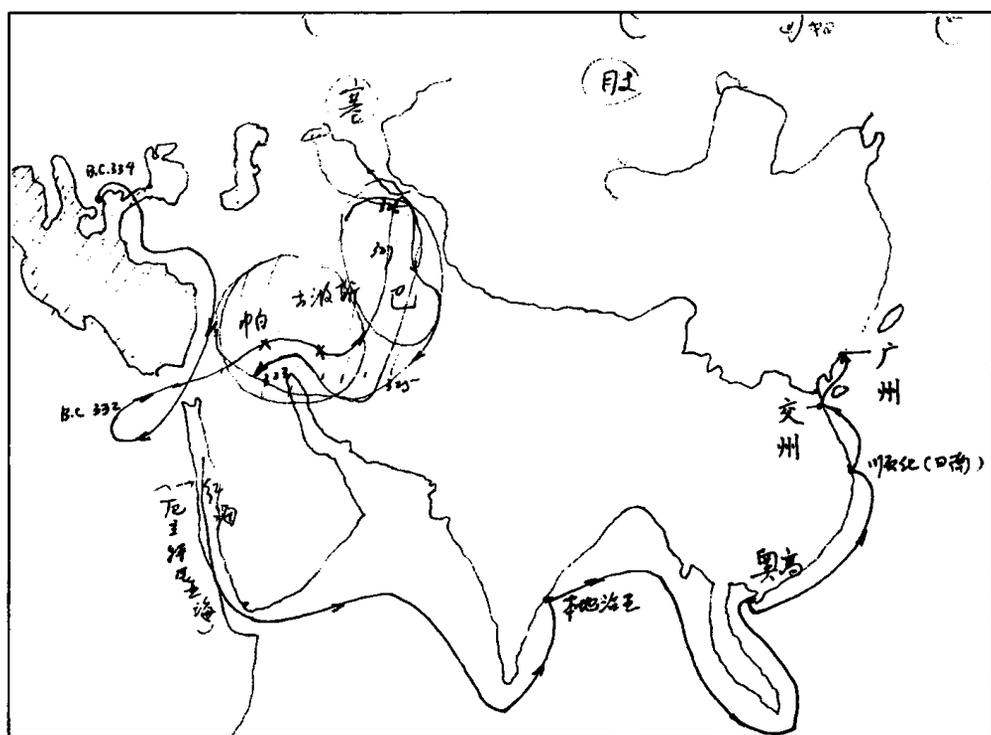


图一三 巴泽雷克积石墓壁衣上织出的坐椅

## 3. 南方发现的玻璃制品和海路的开通

前面讲到的新式玻璃珠由于游牧民族作中介，在黄河流域发现不足为怪，但长沙楚墓出了不少。楚墓不仅出了玻璃珠，还出了玻璃制的谷纹

璧。这种璧，洛阳也有发现。《战国策·楚策》记秦派张仪去楚游说，张仪说服了楚怀王，怀王“乃遣使车百乘，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经过过去许多人研究，知道鸡骇是印度古代梵语 Kharga（犀）的译音（对音）。印度是多犀牛的。夜光璧，从后来扬雄《羽猎赋》中有“夜光之琉璃”句，知道琉璃即玻璃，楚赠秦王的夜光璧就是玻璃璧。楚怀王把玻璃璧和印度犀同列，并且认为都是楚国的珍宝。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看来它们都是从楚国南方运来楚国内地的。《汉书·地理志》记南海诸国中：“有黄支国……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离（即玻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繒而往……蛮夷贾船转运致之……王莽辅政……黄支王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日南，是汉设在今越南中部的郡，郡治在今顺化附近，象林是日南郡的一个县，大约在日南郡的最南边，从那里船行八个月加二个月计十个月，根据记载的方向和其他情况，中外的研究者一般都认为黄支在今印度东南海岸的康契普腊姆（Canjevoram），黄支是不完全的音译。黄支既有玻璃，又有犀牛。看来，海上这条通道，战国时期就已经开通了，所以我国南方的楚，能拿黄支的东西作为自己的珍宝赠送给秦。谷纹璧是我国所特有，据说较晚的个别长沙楚墓还出有玻璃印章，印章上的文字是汉字，这些怎么能从海外运来呢？公元 80~89 年间居住在北非的希腊人，写了一本《厄立特利亚海周航记》，厄立特利亚海即红海，但该书的内容并不仅限于红海，其上记：地中海东岸的玻璃原料，很早就向东输出，到了印度西南岸，又由那里转运到印度支那半岛。后一段航线正经过黄支，在康契普腊姆南不远的本地治里近年正好发现了从地中海东岸运来的玻璃器及其原料。因此，玻璃原料的东运得到证实。既然一世纪中期，玻璃原料（应是助熔剂天然纯碱）可运到印度支那半岛，那么再早一点，再运远一点，就有可能在我国战国晚期到了我国的交广地区了（图一四）。玻璃璧、印章的发现，应当证实这个推测，即战国晚期玻璃原料天然纯碱已船运到我国南方，我国南方开始烧制玻璃制品了。



图一四 战国时期中西海路开通过路线的推测

考古发现海路开通的遗物除一些玻璃制品外，近年南方和东南近海的遗迹还一再发现地中海—西亚生产的遍体锤鏤出凸起“O”形纹饰的圆形银盒。这种纹饰特殊的银盒，首先发现于云南石寨山的滇国墓，接着广州南越王墓也发现了，不久又在山东临淄汉初墓内发现。同类西方器物发现地点的分布，既多毗邻沿海，又相距广远，而所出墓葬的年代又极为接近，这些现象，很难想象短时期可以突然出现（还未包括器物东运途中曾有中介地点耽搁的可能）。汉初上距战国末才不过二三十年，因此，我们认为中西海运开始发生于战国阶段似乎更接近事实。

战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场面扩大了。陆路的通道之外，海上的往还也逐步开始。文化交流的深度也超过了以前，胡服骑射是当时影响东方最

重要的一个课题，近年秦俑坑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形象资料，这批俑的形象还可以告诉我们胡服不仅是骑射的衣着，起码在秦时，车战的战士也穿起了胡服。这时期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另一个重要情况是西方烧制玻璃的助熔剂天然纯碱原料和用天然纯碱烧制玻璃制品的技术，有可能已从海道传到了我国南方。南方和近海城址的汉初墓葬一再发现具有西亚制造特点的银盒，也可作为战国末期海运开始的旁证。

### 三、西汉（前3～1世纪中期， 前201～25年）

（1985年稿）

前3世纪末，我国北方匈奴族强大起来。前202年刘邦建立汉王朝，第三年（前200年）刘邦就被匈奴围困在平城（今山西大同）。此后，匈奴一直威胁汉王朝。汉大量输给匈奴各种物资，丝织品是其中主要一项。匈奴骑马游牧，丝织品对他们用处不大，他们索要主要是为了和西方交换。匈奴强大，一方面威胁汉，另一方面也不断攻击分布在河套以西——偏南的大月氏和偏北的乌孙，这两个语族虽有不同，但同是印欧语系的雅利安种的游牧民族。前174～前161年间，匈奴迫使他们的绝大部分，从今天河西、新疆向西退却，一直把他们驱逐到中亚的伊犁河流域。这样，汉王朝的北部、西北部，即从今天的长城沿线一直到中亚都成了匈奴的势力范围。匈奴驱逐了月氏、乌孙，他对新控制的河西、新疆地区进行掠夺和压榨，这时的中西往还，就为匈奴所垄断。当时，在西方，前146年罗马征服了希腊，称雄于地中海。前141年西亚的帕提亚（安息）吞并了两河流域，向东扩张，蚕食巴克特里亚（大夏）。前140年汉武帝即位。罗马、帕提亚和汉王朝在前2世纪的中期，都在巩固发展，也都在谋求商业往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东西文化交流历史上出现了新的局面。

从汉武帝即位之始，一直到西汉王朝之末，从开通西方通路到护卫、经营这条道路继续了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有两件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的大事，现简述如下。

## 1. 张骞出使与汉武帝经营西域

汉武帝即位的第3年，前138年派出了使节张骞，原想联合西迁的大月氏夹击匈奴，这时大月氏又从伊犁河流域南迁到妫水（阿姆河），侵据了大夏（巴克特里亚）的中部以东。张骞前128年到了大宛贵山城（锡尔河上游的费尔干纳附近），又由大宛到月氏王庭蓝氏城（在妫水南岸，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附近）。这里土地肥沃，月氏迁到这个农业区安定下来不愿东返。张骞虽未完成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的使命，但对中亚、西亚的形势进行了了解。前126年张骞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了西方的繁荣。西方的繁荣，使汉武帝下了打击匈奴以开通西方路线的决心。前123~前121年连续讨伐了匈奴两次。前119年又派张骞迎乌孙东还，共击匈奴。这时乌孙游牧在伊塞克湖一带，也不愿东返了，第二次出使仍无结果。张骞在乌孙时派遣副使去安息、奄蔡、犁靬、条支、身毒等国。他们陆续回到长安之后，更具体地报告了这些国家的情况，就更扩大了汉武帝对西方的欲望，同时也清楚了，要打开通路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前115~前111年，先在河西走廊排除了匈奴的势力，陆续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移民屯田，北建长城，切断匈奴与南山的塞人的联系，这样在前2世纪末从长安到今天甘肃西端这一段基本可以确保了。前113年张骞卒。骞卒后，武帝大约根据他的建议，继续做了两件事：

### A) 结婚乌孙

前115~前111年建立河西四郡之后，接着在前110~前105年之间，武帝以江都王建女（建，武帝弟之子，前121年谋反自杀）妻乌孙王，目的很清楚即“欲与乌孙共灭胡”。共灭胡，这时主要是希望乌孙阻挡匈奴南下，保卫通路。后来到了宣帝时，前53~前51年，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又在乌孙王庭赤谷屯戍。

### B) 李广利伐大宛

大宛在乌孙之南，正当葱岭西去的要冲，其地又以产天马闻名。汉

武帝为了加强骑兵击匈奴、为了开通向西的路线，都需要优良马种。张骞带回来的大宛天马消息，当然也会引起汉武帝的重视。汉武帝派人持金往购，大宛不仅不卖，把使者也杀了。汉武帝借此事件，先后调动十余万大军，于前 104 年派李广利西伐大宛，前 102 年大宛降。由于这次大规模的用兵，从新疆越葱岭到大宛这条路，基本平静了，所以前 1 世纪之初，中亚特产东传很多，《史记》、《汉书》除记有大宛马外，皇家苑囿里种上了葡萄和苜蓿等中亚植物。

## 2. 北匈奴西迁与匈奴北部的遗迹、遗物

宣帝晚期，匈奴五单于争立，前 49 年匈奴分裂为南北。前 48 年南匈奴单于呼韩邪入朝（昭君出塞故事中王昭君即嫁此单于）；北匈奴郅支单于西迁，称霸于中亚，建城于都赖水（恒逻斯水），前 36 年，西域副都护陈汤将兵出温宿，抵郅支单于城，破之，斩郅支单于，北匈奴四散。

### A) 北匈奴西迁的遗迹

叶塞尼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其西北的托木斯克，再向西到托博尔河与伊路西德河汇合处都发现了山字纹战国铜镜和西汉精白镜、日光镜，这些，大约都是北匈奴四散后的遗物。其中托博尔河与伊路西德河汇合处的发现很重要，那是 18 世纪初的事，当时出土的文物很多，战国两汉铜镜，即多达几百面出在这里的古墓群中。这个迹象很突出，我们推测这个地点大约是郅支单于被杀后，北匈奴一支主力逃到这里，只有这样，才能遗留那么多的墓葬。陈汤西击郅支单于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即是我国和大秦（罗马帝国）接触的问题。《汉书·陈汤传》记：“（汤）前至郅支城都赖水上……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阵）。”鱼鳞阵即是士兵持盾牌错开排列起来，列成方阵。这种布阵法是罗马军队常用的龟甲阵。游牧的郅支单于如何学到罗马阵法？法人伯希和认为前 54~前 53 年罗马侵略帕提亚（安息），帕提亚诱敌深入，罗马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大批罗马军官、士兵被俘，安息居之于东境守边。为安息守边的罗马官兵有不少逃窜到中亚，因

而和郅支单于发生了联系。陈汤战败郅支，罗马将兵自然又和陈汤发生了关系。这个说法虽是推测，但对以前的解释不清的鱼鳞阵却说明白了。从郅支单于使用鱼鳞阵，考虑它的来源，看来也是有些道理的。《汉书》记了这个阵法，当然也可以表明这个新的西方罗马（大秦）的作战方式，已使西汉人所了解。西汉接触罗马人，这件事大约是最早的。

西方通道开通了，从考古发现看有两种器物似乎可以反映出这暂时的频繁往还。一是和田所出软玉大量东来，汉武以后墓葬中出土了大量优质玉器；汉代的高级葬服玉衣也是汉武以后发展起来的。有人统计玉衣出了34件，其中西汉18件，18件中只有4件是汉武以前的。看来，和田玉大量东来是自汉武以后的事。二是洛阳和呼和浩特发现的汉武以来的铁甲中出现了比铁札甲更为适用的鱼鳞甲。这种甲，现知也以伊朗出现为最早，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历史》记古波斯帝国的战士有的上衣有像鱼鳞那样的铁鳞，即是鱼鳞甲。到帕提亚时期，从存世的线雕上看，不仅战士服甲，马铠也使用了鱼鳞形式。由此可知我国战国到西汉铁札甲——鱼鳞甲，都是出于西亚的影响，其实还不仅如此，随后的时期出现的锁子甲也是渊源于西方——中亚。

#### B) 匈奴北部的遗迹、遗物

从本世纪30年代起，一直到50年代，苏联考古工作者从蒙古包楞格河，经贝加尔湖、叶尼塞河上游一线，发现了不少处匈奴遗迹，其中较重要的有诺颜山下和恰克图一带的墓群、贝加尔湖南岸的城址和叶尼塞河上游的居住遗址。

诺颜山下和恰克图一带的墓群，大体可以肯定是匈奴的墓地，其中大型墓都在塚下掘6~7米深的土圪，有的还在土圪里围砌一匝石椁，石椁内置木椁和木棺。以诺颜山下墓群为例，墓群分布在苏珠克图地方，M6木椁顶满铺毛毯，棺室和棺中出了不少毛丝织品、铜容器、马具、木车、漆器等。漆器中有针刻铭文的耳杯，铭文中有“建平五年（公元前2年）九月”字样。M5也出土了有铭的漆耳杯，铭文是“建平五年蜀郡西工造

乘輿髹沔画木黄耳椀……”，蜀郡郡治在今成都，西工是当时设在成都的工官，乘輿指皇帝，髹即漆，沔大约是雕的意思，画是绘画，木指木胎，黄耳指鎏金铜耳，椀即杯。这段铭文即是说：“建平五年，成都的工官为皇帝造的木胎饰以雕绘并装有鎏金铜耳的漆杯。”从此铭文可知：①诺颜山下墓群的年代约在公元后不久；②墓中所出的中原器物有的是皇帝作坊的产品，因此可以推测这批墓中大型墓应是匈奴上层贵族的墓葬。这批墓还值得注意的是出了不少丝毛织品和毛毡，其中应该提出予以说明的有以下五项：a. M6 一件毛毡上绣出有翼兽、植物纹（图一五）。毛毡是压撵羊、驼毛制成的，它是游牧民族的特产，现知最早的考古发现是出在北欧日德兰半岛初期青铜时代（3500年前）墓中的毡帽。公元前500年，里海北边的塞人墓葬中毡制品发现很多，制造水平较高，一般认为当时塞人是长于制毡的，这里匈奴墓中出了大批毡制品而且上面绣出的有翼兽、植物纹也都是西亚、中亚流行的纹饰，因此这类东西大约是西方的输入品，或是在西方影响下的匈奴地区生产的。b. M6 一件毛织物上绣出禽兽争斗纹，缘边却镶着菱纹、云纹锦。毛织品，我国在东汉初才有对应名词记录它叫“氍毹”（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讲）。禽兽争斗纹，是从西亚经中亚一



图一五 诺颜山下匈奴墓所出毛毯上的纹饰



图一六 诺颜山下匈奴墓  
所出毛锦上的纹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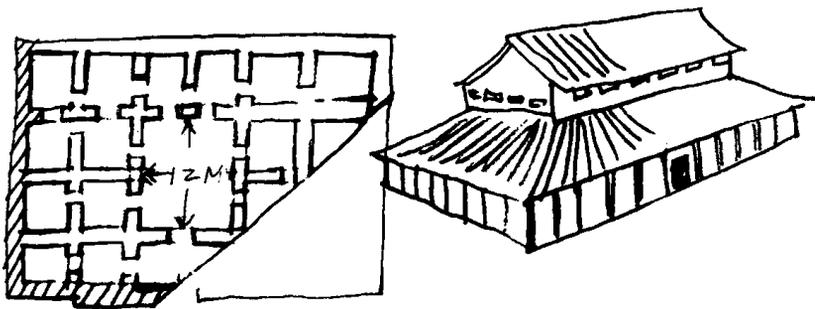
直到河套地区游牧民族流行的纹饰，可以推测这类东西起码也是在西方工艺影响之下出现的。但是缘边却镶从中原输入的织锦，菱纹、云纹是中原的纹饰，织锦这种高级丝织品也是中原的特产。可见这是把东西风格的织品缝缀在一起了。c. M23 出土一件在纬线上起花的毛织锦，花纹中是生动的缠枝植物纹（图一六），这是高级的毛织物，中原出现这种高级毛织物的名称“毳毼”也是在东汉初（关于毳毼以后我们再讲），这些毛织物墓中出土很少，可知当时在匈奴也是很稀罕珍贵的。还值得注意的是花纹，这种生动的缠枝花纹是西亚一带的纹饰，因此这类毛织锦大约也是西方输入的。d. 织出汉文字的

锦这批墓出了不少，如 M6 出有“群鹤颂昌万岁宜子孙”的云山禽兽纹锦，又如 M11 出有“新神灵广成寿万年”的云山羽人锦，这些都是中原的输入品。e. M6 一件素绢上绣出云纹，另一件 M11 所出素绢绣出龙纹、菱纹、云纹。素绢是中原输入的，龙纹、菱纹、云纹也是中原流行的纹样，此外还杂有西方的植物纹。看来，这类东西，有的是中原输入品，但也可能有当时在匈奴的汉族绣工所绣出的。由于这类绣品的启示，我们还可怀疑上述 a、b 两项所述的毛毡上、毛织品上绣出的西方纹饰，如果是在匈奴地区绣出的恐怕也是出自汉族绣工之手，因为当时“绣”这种加工的工艺，是汉族最擅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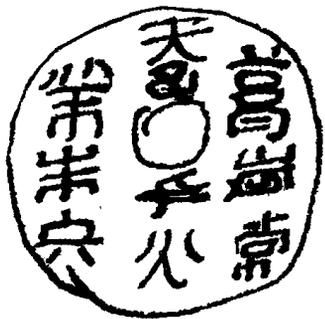
以上匈奴遗迹反映：1) 匈奴是善于摄取东西文化的民族；2) 匈奴北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中西文化汇合点，这个汇合点不仅是器物的汇合，中西在装饰纹样、加工工艺方面也进行了初期的合作。由于上面分析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公元 1 世纪时，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上，匈奴北部

地区也存在着一条重要的渠道。

贝加尔湖南岸的城址和阿巴根南的居住址 贝加尔湖南岸的城址苏联名之曰“伊沃勒加城”，在乌兰乌德西南，夯土建，方形，边长约350米，城内的大型建筑遗址建在土丘上，其房基挖在地平面下，大小房间都有火炕设备。城内发现了铜渣、铁渣和锻铸的锅炉，还出有不少骨料，表明城内分布有铜铁作坊和骨器作坊。还出土了犁铧和储藏器物的窖穴、大型陶器和石磨，还有家畜骨骼，说明当时这里有农耕。以上情况，都可以表明这座位在匈奴北部地区的城址里的居民主要是定居的务农者和手工业者，因此，有人认为是被匈奴俘来的汉人的遗址。这个推测如果不误，那么在公元之初已有汉人集居在南西伯利亚了。更值得注意的是1940~1946年苏联科学家在叶尼塞河上游米努辛斯克对岸阿巴根南所发现的大型、内部分割成多房间的建筑遗址（图一七）。这个建筑遗址东西45米，南北35米，约为1595平方米，共二十多个单室，中间一间最大，约12平方米，有两个门址，出了4件铜铺首。中间这间的四周出了不少筒瓦、甃瓦，还有“天子千秋（秋）万岁常乐未央”铭的瓦当（图一八）。“常乐未央”的“常”不写作“长”是王莽时期的规定，因此可以推测这处建筑物的时间大约距公元1世纪初期不久。苏联学者根据残存的遗迹，作了立面复原。建筑内也有火地炕，还出有环首刀和玉器片等。建筑式样、构件、瓦当以



图一七 阿巴根大型遗址平面和复原简图



图一八 阿巴根大型

遗址所出瓦当



图一九 阿巴根大型

遗址所出铺首

及出土遗物等都表明这处建筑和中原关系密切，苏联有人曾推测是汉武帝时投降匈奴的李陵的居室，这当然是错误的，起码时间不对，但它是在中原工匠指导下修建的一座建筑物可以无疑。从建筑物四周封闭的情况看，是为了适用于寒冷多风的南西伯利亚的；铺首是中原的建筑构件，但从作出的相貌高鼻多髯这一点（图一九），可知是根据当地人的形象的。关于这座建筑物的问题，我们不想多牵扯，从中西文化交流这一点看，在公元之初，汉文化影响到这里的深度，是出人意料的。这和上述伊沃勒加城的情况共同说明，在匈奴第一次西迁之后，汉文明从北方已直接传播到了南西伯利亚的西部，也是靠近了中亚的北部。苏联南西伯利亚的发现，一再提醒了我们，中西文化交流的路线，除了经由今新疆地区之外，通过蒙古地区向北再向西这条路，由于和匈奴关系的发展，在公元前后也曾盛行一时。

## 四、东汉魏晋

(3 世纪中期~4 世纪初,252~31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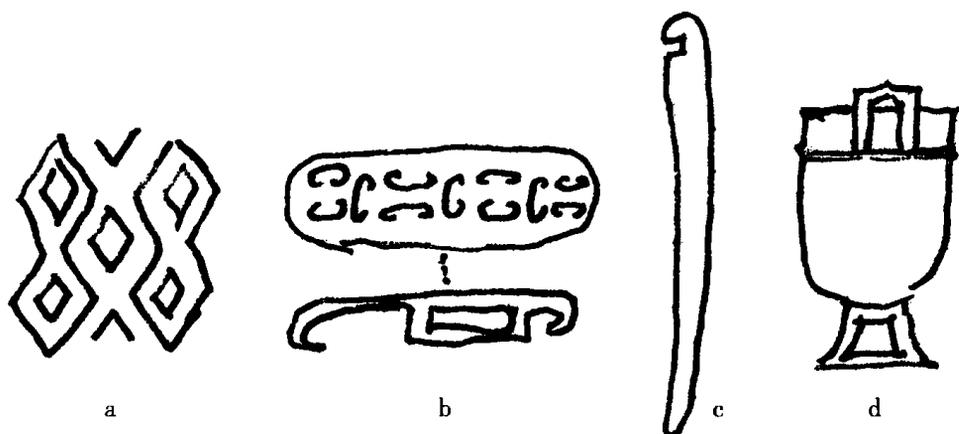
(1985 年稿)

这个阶段预备讲四个子目：一是匈奴第二次分裂和西迁，二是班超事迹，三是大月氏在中亚建立了较为强大的贵霜王朝，四是安息、大秦和东方的交往。

### 1. 匈奴第二次分裂与西迁

公元 1 世纪中、后期，匈奴统治集团又发生了一次大分裂，是发生在以前留在东方的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后裔这一支内。分裂时间是公元 48 年。当时南匈奴南部接近东汉，北部在 1 世纪后来就侵扰东汉的北方和西北方，新疆地区从北到南一再受他们侵扰。89 年、91 年窦宪的两次北伐，迫使他们向西北迁移。西迁路线从考古发现看有两条：一条是最初止于今哈密西北的巴里坤湖（蒲类海）附近，然后从天山以北向西，不久即在中亚打开了局面之后，游牧于这个区域。《后汉书·西域传》记，123 年此部分匈奴“展转蒲类、秦海之间”（李贤注：“大秦在西海西，故曰秦海”，可知秦海即黑海），即指此而言；另一条大约走的是第一次西迁的旧路，从米努辛斯克，向西直到伏尔加河下游的这个草原地带的许多地点，都经常发现有两汉之际至东汉初的小日光镜、规矩镜、菱纹丝织品（图二〇：a）和玉具剑鞘上的玉璫（图二〇：b），这些，大约都是为匈奴第二次西迁的遗物。从伏尔加河下游为中心，东到阿尔泰山，北到伏尔加河支流卡马河畔的彼尔姆，甚至到了西乌尔，西边到克里米半岛的刻赤，南边到北

高加索，这片广大地区，从发现的东方系统的遗物的埋藏时间看，向西迁的匈奴，在这个区域停留的时间，可以延续到4世纪以后。这也正和《北史·西域传》所记匈奴杀了奄蔡王，夺据其国的时间相符（4世纪中叶）。奄蔡王，居于黑海以北以东。在上述这片广大地区的主要发现列如下表（表二）：



图二〇 匈奴第二次西迁遗物：丝织品上的菱纹（a）、玉璜（b）、弓弭（c）和铜鍱（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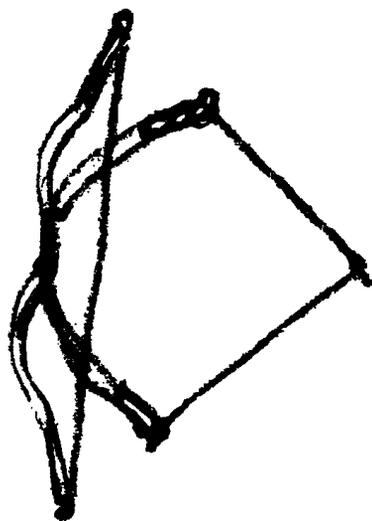
表二 匈奴第二次西迁遗物与分布地区

	内蒙古	蒙古	米努辛斯克	伏尔加河下游	刻赤	北高加索	卡马河流域	匈牙利	奥地利	西德
铜镜	✓	✓	✓	✓		✓				
仿镜				✓		✓	✓	✓		
丝织品		✓	✓		✓					
玉璜				✓	✓					
仿玉璜				✓	✓					
骨弓弭	✓	✓		✓			✓	✓	✓	✓
铜鍱	✓	✓		✓				✓		
	← 1~2C →									
				← 3、4C →			← 4~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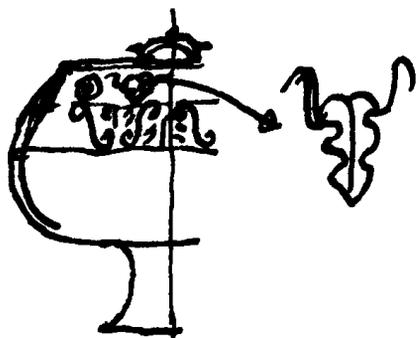
铜镜和玉璫在一些地点出现了仿制品，反映了匈奴人在这个地区停留的时间长。在这个地区发现的东方器物中，有几种需要细分析一下：第一，玉璫——铁剑的问题。玉璫是汉代玉具剑鞘上的附件，玉具剑主要是铁剑，铁质易锈朽，剑鞘也朽掉了，这样就剩下了玉制的璫，因此发现玉璫，就意味着这里原来是一把铁剑。玉璫和它的仿制品在伏尔加河下游和克里米半岛上发现的不少，说明汉代的铁剑曾是匈奴重视的武器。玉璫还不仅在这个区域发现，也发现在以后我们要讲的中亚南部

的贵霜王朝的领域内。由此可知汉代铁剑受到西方广大地区民族所重视。春秋后期至战国以来，我国锻铁工艺发展很快，最初的铁剑出现在湖南楚墓中，不久中原北方也都出现了，它比铜剑要长得多，西汉时这种剑即普及到各地，刘胜墓所出的长达1米有余，长剑既可刺又可砍，罗马人曾记载中国的铁比西亚伊朗的铁好，看来，渊源于游牧民族的利器——剑，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有了新的发展。这种在黄河流域发展出来的新形制

的铁剑，到公元2世纪左右为北方游牧民族和西方民族所称赞并成为爱用的利器。第二，骨制弓弭（图二○：c）和铜镬（图二○：d）。弓弭是加强弓的弦力的，印欧语系游牧民族的弓短，不用这种附件（图二一）。镬是游牧民族煮食的炊器，印欧语系游牧民族的镬，体作半圆形，环形耳（图二二），与表上所列体深方耳的镬不同。这两种器物从



图二一 弓弭所在的位置



图二二 印欧语系的游牧民族使用的铜镬

它自东到西发现的地点，可以估计后者应是游牧民族的器物，是随匈奴的第二次西迁从河套地区向北再向西带过去的。

匈奴民族两次西迁，特别是后一次，是世界史上的大事，它不仅把一些东方器物带到了西方，更重要的是，在欧洲历史上引起一场民族大迁徙。匈奴西来，把原住在黑海、莱茵河间的凯尔特—高卢人驱向西方，一部分迁到今天法国北部，后来渡海到了英伦三岛，一部分迁向西南进入罗马领域。进入罗马领域的高卢—日耳曼人不久击溃了罗马军队，395年使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又在475年灭亡了西罗马。而匈奴人本身在5世纪中到达了欧洲中部，在今天匈牙利、奥地利、西德发现的7世纪前后的东方遗物，就是当时匈奴到达这里的物证。东方器物，现知发现的最西地点是西德莱茵河西岸美因茨，那里出土了匈奴民族的骨制弓弭。此地点，比上面所讲莱茵河东斯图加特发现的春秋战国之际的绢还要远些。考古资料证实了匈奴西迁，同时也显示了匈奴西迁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件应予重视的大事。

## 2. 班超事迹

公元48年匈奴第二次分裂后，匈奴仍不断骚扰汉代领域的北边和西北边，73年班超随窦宪讨伐，到蒲类海，后出使西域，目的是为了截断阻挠匈奴与新疆各小国的联系。超驻新疆三十年（73~102年），先驻塔里木盆地西端的疏勒（今巴楚附近）十八年。这阶段超联系葱岭东西的力量，包括月氏、乌孙、康居，主要在对付匈奴和匈奴的与国龟兹。89~91年匈奴西迁、龟兹平定之后，任超为西域都护，移驻龟兹又近十年，这时期大约主要为了防御葱岭西新兴起的贵霜。总之，班超在新疆三十年，先是平定了新疆内部的分裂势力，打通了塔里木盆地的南路，然后又打通北路；后来又结好贵霜，发展贸易。文献记载他曾代表东汉王朝西运大量的丝织品去贵霜，也从贵霜换回马匹和毛织品——氍毹（地毯）（有人认为此二字是波斯语 Taftan〔纺捻〕的音译，纺捻是制造织物的特殊工序，这种解

释可能接近事实，由此可知这种织品应是西亚的特产)。出名马的大宛，当时正在贵霜控制之下。大宛名马的东来，西汉时数量还不多。东汉，可能由于班超的努力大批东运。东汉考古资料出现了大批腿长、喙瘦的中亚马的形象，墓中所出陶马、铜马和画像石、砖以及壁画上的马，都是这种形象。而它们的时代，又大都在班超及其以后的年代，这显然不是偶然的。3世纪中期鱼豢撰《魏略》记世界三多：中国人多，大秦宝多，月氏马多。月氏多马，就是长期由月氏大批运马东来的反映。102年班超东返后，后继的都护得不到诸国的拥护，游牧于北部的匈奴又进行扰乱，107年，东汉又罢西域都护府。后来超子班勇于123~127年间虽又在新疆经营了四五年，但他安定的范围也仅限于葱岭以东，此后永寿四年（158年）刘平国于拜城黑英山乡北部博孜克日克沟口西摩岩上刻石记有负责边境安全、兴建关亭事，可以证明东汉实力日益下降，大约从桓帝后期到桓灵之际东汉逐渐放弃了敦煌以西。

### 3. 贵霜王朝的兴起

东汉逐渐放弃新疆以后，西部贵霜的影响日益加强。1世纪前半葱岭西建立了五个小国，其中贵霜最强。1世纪中期（45年），贵霜王丘就却完成统一事业，《后汉书·西域传》说他“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他西击帕提亚（安息），夺取高附地（今阿富汗）、罽宾（今克什米尔）等地。其子阎膏珍1世纪末又南击天竺。他的后继者迦腻色迦王时，贵霜达到极盛期，当时贵霜的领域，西邻安息，东抵葱岭，北及锡尔河畔，南括印度河流域直达阿刺伯海，并向东南扩展到恒河中游，所以印度史把贵霜也包括了进去。迦腻色迦王的绝对年代，现在还不能具体，大体在2世纪中期。这个时期正是东汉从新疆逐渐向东撤退的时期。贵霜影响向东发展的考古资料有货币、文字语言、商人遗迹和宗教遗迹。

自19世纪末，新疆西南部即不断发现贵霜铜钱。和田、巴楚一带出有1世纪丘就却时代的和1世纪末阎膏珍时代的，2世纪中期迦腻色迦时

代的最多，如果都是在铸造后不久传到新疆的话，那么前两种即在班超驻西域时期（72~102年）就出现了。和田、库车还发现一种圆形的汉、佉卢文合璧铜钱，特别是和田发现得最多，这种铜钱一面铸出汉文，中间铸个贝（𠄎）字，外绕“重廿四铢”4字，另一面中间铸出一马形，外绕一匝用佉卢字母写出的是印欧语系的一种方言健驮逻语（过去称印度俗语，但印度俗语种类甚多，此种方言主要流行于北印度健驮逻区，所以50年代以来一般改称健驮逻语），内容是“大王王中之王伟大的□□□□”，后面的□□□□是王的名字，这种对王的赞语，是贵霜的习惯用语。这种铜钱在和田大批发现，应是本地所铸，其时间约在2~3世纪中，大概是班勇驻西域（123~127年）之后，这种合璧文字铜钱的出现，至少可以反映和田地区（新疆西南部）当时中原影响在这里还保有一定的声势。

佉卢文字是贵霜通行的一种字母，是前4世纪由波斯传来的，大约也在班勇东返之后，随着较多的贵霜人东来，传入新疆，内地最早提到这种文字的是6世纪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著录的“佉楼”，7世纪唐初人叫“佉卢”。这种文字大约在6世纪后成为死文字，18世纪末才重新在中亚和印度河流域的石刻铭上发现。这种文字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译读，英人拉普逊确定了元音、辅音、复合辅音和数目字，共266个字母和符号，参见下表（表三）。这个表上每个字母的下方是拟出的音值，最下行为数目字。从上世纪末起，这种文字在塔里木盆地南缘从和田向东到民丰，再东传到楼兰地区都发现了使用这种字母书写健驮逻语的公私文书，看来这种文字与语言不仅为东来的贵霜人所使用，而且也成为当地人公用的文字语言。塔里木盆地北缘也出现了一些使用这种字母的龟兹变体的文书和铭刻。在2世纪的新疆几种印欧语系的民族都没有文字，所以都使用从贵霜传来的字母，甚至有的地区也通行贵霜的语言。东来的贵霜人使用佉卢字母不仅在新疆，再向东去，他们也同样使用这种文字，所以新疆以东的敦煌、洛阳都有发现。以上是就发现佉卢文字的地方而言。从文献记载上看，3世纪初，确实有为数不少的贵霜人进入长城之内定居在河西走廊东部当时羌人聚居的凉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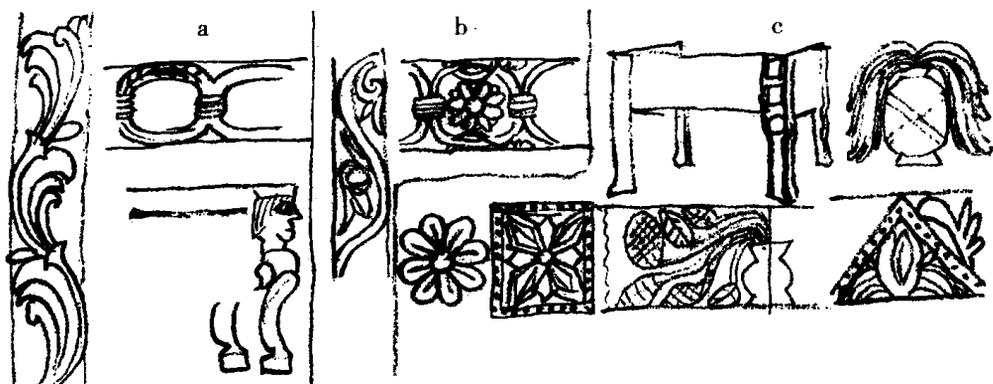
地区，227年诸葛亮替后主写的诏书中说：“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氏、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去，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诸葛亮集》）康居是索格底人集居地点，其中心即在今撒马尔干，其地东来的人都冠姓康。上引文献说明诸葛亮所联合的羌人军队中有月氏和索格底人的武装。此处记载反映了东汉自新疆东退之后，月氏——贵霜和他属下的索格底人向东发展，3世纪初，居然能有代表人物二十余人参加羌人援蜀军队，看来在甘肃中部他们有了数目较多的居民，不然不会出现可以称为他们代表人物“胡侯”的。

贵霜人东来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经商，一是宣扬佛教。

中亚人直接到东方经商，东汉之初就已不是罕见事了。《后汉书·马援传》记马援晚年（48年）他的部下耿舒评论他说“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可知西域贾胡习惯于坐商。《后汉书·西域传》记班超时“商胡贩客时见于塞下”。塞下指敦煌西边的玉门、阳关，即是说1、2世纪之际有很多商胡进入敦煌以东的内地。可能由于前面所讲蜀曾联合羌人的缘故，魏注意了西部地区，3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仓兹任敦煌太守，胡商称其德惠。3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皇甫隆任敦煌太守改进农具兴修水利。敦煌经济繁荣，加强了魏对新疆的影响。所以楼兰发现了从嘉平四年（252年）到建兴十八年（330年）的汉文纪年、有关屯戍内容的木简和楼兰西南的尼雅发现晋泰始五年（269年）木简内容有从敦煌太守发下的公文。这两处在出汉文文书的同时，也发现了大批用佉卢字母书写的健驮逻语的木牍公私文书。尼雅汉文木简中有一根书：“月氏国的支柱，年卅九，中人，黑色。”这应是一个过境登记的文件；佉卢文木牍中有不少提及丝绸、以丝计价和丝债的内容。看来，这批文书有些可能是向贵霜运输丝织品的记录。楼兰附近发现3世纪的汉文木简中记有“……今为住人买綵四千三百廿六匹”，有这样大数量丝织品做交易，可见当时包括贵霜商人还有粟特人在内的丝绸贸易规模之庞大了。这件木简中说：“今

为[住]国人买綵……”似乎尚可说明向西输出丝织品，已不完全靠中间其他民族的转贩，至少由内地到新疆这一段已有汉人直接参与了。

贵霜人相信佛教开始的时间还不甚清楚，但他们逾过阿姆河到蓝氏城逐渐定居后，大约即接触到佛教了。丘就却时期的铸币上出现释迦形象，应该说佛教在贵霜人中间已开始流行了，这个时期大约是在1世纪中期。传说汉明帝遣使者去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即是接近这个时期。127年班勇由新疆东返，《后汉书·西域传》记：“班勇列其（身毒）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班勇母是胡人（超在疏勒时有人攻击他说“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他生长在新疆，他只说身毒佛教，未提大月氏。勇大约与阎膏珍同时，阎膏珍货币不铸佛像，而铸婆罗门教的湿婆像，说明他不信佛教，可见班勇这个大月氏佛教并无显著发展。班勇东返之后，2世纪中期的贵霜王迦腻色迦在位（迦是一个大事弘法佛教、佛教第四次结集的召集者，佛教史把他和阿育王相比的人），而这个时期也是贵霜极盛时期，贵霜影响向东方，也以这个时期为最盛，新疆发现最早的佉卢文遗迹，即是在和田发现的一部佉卢文的佛经——《法句经》，它的年代应在2世纪中期。最早到洛阳译经的月氏人支谶、安息人安志高也在2世纪中期的“桓灵之世”（146~189年）。前面提到在洛阳曾发现的佉卢文字的时代属于这个时期的晚期（洛阳的发现是19世纪20年代的事）。北大派马衡去洛阳购置古物时收集到的是一件石井圈的残块，其上刻有佉卢字母写的健驮逻语，据破译其内容是说此井是在洛阳的一个寺院的僧团所建。这个寺院僧团用健驮逻语说明他们应是贵霜人所建的寺院与僧团。结合上述大月氏人来洛阳译经，可知贵霜向东影响，传播佛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贵霜东播佛教是与贵霜人的东来联系在一起。内地变动多，人口密度大，所以和他们联系的遗迹保存较少，新疆则保存较多。特别是从和田到楼兰这一路线，保存了不少和他们有关的各种遗址，有居住址，有寺院址，这类遗址中出土了不少贵霜风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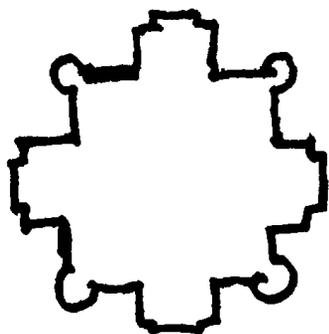
图二三 民丰、楼兰发现的有希腊、罗马雕饰风格家具上的各种纹饰

器物 and 图像。地图上的楼兰之南，一个叫米兰的地点保存不少土坯建筑的寺院遗址，其中有一座方座圆身的佛塔，塔内礼拜道壁画绘出的人物和连接的波状带都是一派贵霜风格，一幅画中有佉卢文的榜题，另一幅画中有用佉卢字母书写的画家的题记，遗址中还出有佉卢文题记的彩幡，这些佉卢文的字体不晚于3世纪前期。这应是一处贵霜人或是接受贵霜影响较深的寺院。民丰和楼兰南若羌的居住址中出土了不少雕木家具的残件（图二三：a、b、c）。a是若羌的一所居住址发现的；b是若羌佛寺出土的；c是民丰的，与3世纪佉卢文书同出的。a的时代较早些，还具有浓厚的希腊罗马作风，b、c两处时代较晚些，其中的瓶花仍渊源于希腊、罗马，但果实的形式却是西亚所常见的果实。总之，它们都是直接、间接来自贵霜。贵霜艺术即是世界艺术史上有名的健驮逻艺术。过去因为它的主要艺术是佛教雕刻，表现技法是希腊的，而内容是印度的，所以又叫希腊印度艺术。

贵霜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事项，应是健驮逻艺术问题。健驮逻这个写法是《大唐西域记》的译法，《北史》写作“乾陀”，《洛阳伽蓝记》写作“乾陀罗”。《北史》根据魏收《魏书》。后两写法都出自北朝晚期（6世纪中叶），因为玄奘著作影响大，所以一般用《大唐西域记》的译法。盛唐和尚慧苑《新译华严经音义》卷三：“乾陀是香；罗谓陀罗，此云遍也。言遍此国内多生香气之花，故名香积国。”慧苑是华严藏（名法

藏，字贤首，因是华严的祖师之一，故曰华严藏）的弟子，法藏是康居人即撒马尔干一带的人（712年卒，年七十一）。慧苑的说法，大约是他老师故乡中亚一带的解释。健驮逻地区位于印度河中游，北抵阿姆河上游，中间东西横亘兴都库什山脉，即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中部以东。贞元六年（790年）东归的悟空的《行记》中还提到这里叫健驮罗，可知这个地区叫健驮逻，至少是8世纪末还如此。从19世纪前期起，在这个地区的南部白沙瓦和拉瓦尔品第一带发现了不少有希腊特征的石雕。这个发现，使人们，特别是研究美术史的人，都很关心这个特定的地区，当他们在《大唐西域记》中查到这个古地名后，就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叫起了它的古代的名称了。这个地区，前3世纪时，是古波斯帝国的一个省，经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归塞琉古王朝（条支）统治，前2世纪在巴克特利亚（大夏）范围内，贵霜盛时（公元1世纪中期~2世纪中期）是贵霜的中心地带，布路沙布逻和拉瓦尔品第是贵霜的两个政治中心，前者在今白沙瓦，后者在今拉瓦尔品第新城西北的塔克西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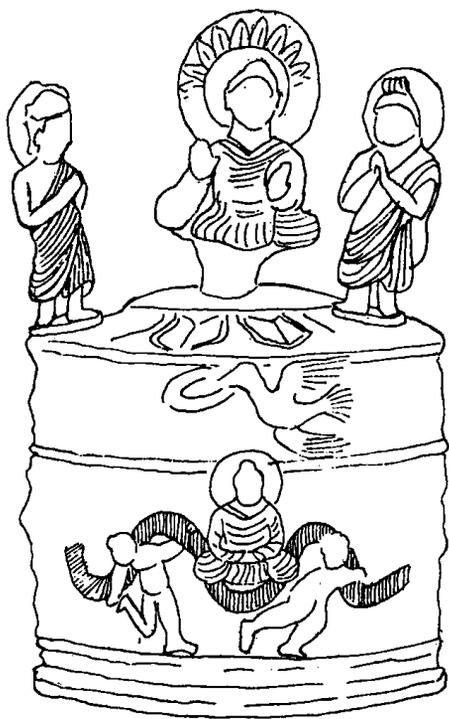
佛教于前6~前5世纪在北印度兴起时，一直到公元1世纪，都严格遵照佛教的规定不能刻绘释迦本人的形象。前3世纪中期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佛教传到印度河中游即健驮逻地区的南部时，也不制作佛像，但这个地区由于有悠久的希腊雕造人像的传统，前面讲过亚历山大东征后，从西方带来了不少希腊人，近年在阿富汗埃伊哈努姆发现的那个希腊式的城址，就在健驮逻地区的北部。那座希腊式的城市大约延续到前2世纪以后，从城址发掘出不少希腊文铭刻和石雕，知道希腊艺术确实在这里流行起来，所以，最迟到1世纪中期，这里就违背了教规，制造出最早的一批释迦的形象（前面讲过的丘就却钱币上的释迦像也发现是在这时期）。从白沙瓦和拉瓦尔品第的发现看，这里在2世纪初，即发展了佛传和佛本生的石雕，到2世纪中期迦腻色迦王大兴佛教时，这里又进一步创造出专门为礼拜、供奉的单独的释迦石像。二次大战前在白沙瓦东南郊发掘一座大塔址，经考证此址即迦王所建历史上有名的“百丈浮图”。《洛阳迦蓝



图二四 白沙瓦大塔  
(雀离浮图) 平面

记》、《北史》叫雀离浮图的遗址（这个塔影响很大，许多地点修塔都起名叫雀离），该塔基方形，每面长 87 米（图二四），每面正中凸出“抱厦”状的建筑，在塔基中心部位发现了铜舍利盒（图二五），这个盒因为有迦王铭刻，所以它的时间可以肯定在 2 世纪中期，盒上的纹饰很值得注意：盒身外壁一匝锤鏤出的人们捧抬着宽厚的花绳作供养的形象。这种形象也见于白沙瓦所出的石雕，看来这个题材是

健驮逻艺术所常见，有些健驮逻艺术的研究者认为健驮逻艺术不仅沿袭以前的希腊的技艺，甚至还有罗马因素，即举此为例。同样的花绳供养还见于上一次我们所讲的建于 3 世纪的新疆米兰佛塔壁画中。壁画画在佛塔内围绕中心柱的圆形礼拜道外壁面上，它的位置和舍利盒外壁一匝上花绳的位置很接近，塔也是藏舍利的，内容和位置的相同和接近，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米兰的壁画，应该是贵霜——健驮逻艺术影响所及的结果。还值得注意的是盒身花绳上面做禅定相的坐佛形象和盒顶上的作说法相的坐佛形象。佛像位置、趺坐姿态、通肩服饰和简单的头光，都和内地 3、4 世纪附着在器物上的佛像极为相似，特别和发现在南方的接近。长江下游南京、绍兴一带，吴、西晋墓（3~4 世纪初）中常出有一种特殊的陶罐，这种陶罐有



图二五 白沙瓦大塔址  
发现的铜舍利盒

的是上塑楼阁的“魂瓶”，有的是盘口宽肩扁体的罐，里面都装有粮食，所以又叫它作“谷仓罐”，这种罐的外壁贴塑出与上述舍利盒外壁那种禅定坐佛很相似的佛像。四川彭山所出3世纪的“摇钱树座”上所塑说法坐佛与盒顶的佛像很相似。“魂瓶”、“谷仓罐”、“摇钱树”这类器物，都与当时的神仙信仰分不开，在那类器物上出现的佛像，显然也是把佛作为神仙的一种来看待的。对佛像的看法是东方的，但其形象是从西方新输入的。输入的路线应该是经由新疆、中原而到南方的。因为当时从贵霜来洛阳的僧人，在汉末战乱时就有移居江南的，所以它的渊源应该是贵霜——健驮逻。

3世纪贵霜开始衰落，30年代萨珊波斯沙布尔一世侵入贵霜，贵霜分裂成一些小国。这时中印度笈多王朝兴起，也向原来贵霜范围发展。4世纪末后贵霜在健驮逻地区复兴，又名寄多罗贵霜（即《洛阳伽蓝记》所记的乾陀罗国）。大约即在后贵霜复兴前后，健驮逻艺术在较长时期受到笈多的影响，而发展了轻纱透体式的雕塑，特别是泥塑的发展对东方有很大影响。关于后贵霜和后期的健驮逻艺术已属下阶段的内容了。

#### 4. 安息、大秦和东方交往的遗迹

班超在新疆的时期，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97年派甘英使大秦（罗马）。甘英穿过贵霜领域到了帕提亚（安息），再穿过安息领域到达安息西部。《后汉书·西域传》记：“和帝永元九年（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齋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条支即塞琉古王朝，王朝最后的领土只剩下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省，前64年为罗马所并。甘英所到的条支，是该地的旧地名，其位置应是地中海东岸，安息船人所说渡海需要的时间，应是指从地中海东岸到达罗马帝国首都罗马的路程所需要的时间。由于甘英的行程，东汉人对安息和罗马的了解比西汉时期深入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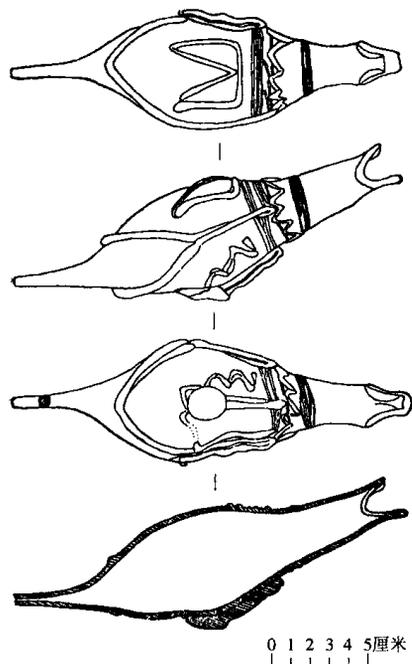
过去相传在甘肃临夏（古河州，兰州西南）、河南洛阳、安徽寿县、湖南长沙都曾发现铜或铅质、径约 6.5 厘米的一面凸起的饼状物，上面好像是龙纹的浮雕，下面周匝一圈希腊字母的铭记。近年在西安汉长安城和扶风、甘泉灵台都发现了这种遗物。长安城发现的是铜质的，扶风发现的是铅质的，这两次是出在汉文化层中，扶风发现的还和汉瓦片、五铢钱同出，这样，它们的时代，可以据此确定在汉代。有人推测这种饼状物是安息的遗物（安息当时多游牧民族，不居城市），安息的城市仍然是塞琉古王朝留下的希腊系统的人聚居的地方，商业也都操纵在这批人手中，所以遗物上著有希腊字母的铭记。这个考证如果不误，它不仅证明当时已有安息器物传入我国，而且分布的地点还相当广泛。这一点也许和东汉魏晋人非常欣赏安息的杂伎有关联。

四川成都东汉墓所出画像砖、沂南画像石墓和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都有一种叠案倒立的游戏，这种游戏，十六国南北朝的文献中叫它作“安息五案”（见 4 世纪陆翊《邺中记》和 6 世纪梁元帝的《纂要》），可知是由安息传来的。沂南画像石墓中刻画的游戏种类很多，还有一种东汉人叫做“都卢寻橦”的游戏。橦是长竿，寻橦就是一个人举竿，几个童子在竿子上作动作。都卢两字有人认为是安息西界一个商业城市（特拉，Doura-Europos）的译音，但也可理解作动作迅速的意思。沂南画像石上的都卢寻橦掌握竿子的人多髯长毛。这种多髯长毛之人，在沂南画像石的游戏部分出现很多，他显然不是东方的民族，而是雅利安系统的人民，很有可能就是安息地区的人民的形象。

1936~1945 年，法国人在阿富汗喀布尔东北的伯格拉姆（Begram）发掘了一处 1~3 世纪的城址，城址位帕尔万盆地，北依兴都库什山脉南麓，东北行即抵我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县境。据考证伯格拉姆应是《大唐西域记》所记的贵霜都城之一的迦毕试遗址，城址出土了许多外地的器物，其中最重要的是大量罗马的大小各种玻璃容器，也发现了中国的漆盘、耳杯，这就和文献记录如潘尼《琉璃碗赋》“览方贡之彼珍，玮兹

碗之独奇，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其由来也阻远”等记录3世纪迄4世纪初西晋上层人物珍喜的玻璃器并成为他们斗富器物的记载联系起来。前几年辽宁北票发现十六国北燕（412~436年）贵族冯素弗墓出土了5件质薄透明闪绿色的玻璃器，其中就有和伯格拉姆发现的海豚形水注极为相似的一件长21、腹径5.2厘米的玻璃“鸭形容器”（图二六），冯墓的时间虽然较晚了一点（冯卒于415年），但这件很薄的鸭形容器，应是典型的罗马吹制的玻璃器可以无疑。辽宁北票的位置远在东北，罗马玻璃器的传来，可能是从中亚经中原转手过来的，也有可能是从当时与北燕有亲戚关系的北方游牧民族柔然运入，总之两地路途遥远，可能是罗马的玻璃器在东北发现较晚的原因。

西与大秦（罗马）交往，海路开通较早，前面讲的前2世纪汉武帝时已西通黄支，1世纪中期希腊人写的《厄立特利亚海周航记》又记录了从西到印度支那半岛的航线，这东西两条航线合起来，实际就东西通航了。不过正式通航的明确记录，却出现在1世纪中期。《后汉书·西域传》：“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日南即越南顺化附近。这个大秦王安敦即是罗马史上的安敦尼皇帝（138~161年），或是马可奥里略·安敦尼皇帝（161~180年），后者就是曾想继续亚历山大事业并在165年派遣军队东抵波斯湾的那个罗马皇帝。所以来汉的使节，有可能出自马可奥略·安敦尼本人，也有可能出自这个安敦尼派出东征的将领。另外从这条海路沿线的考古发现



图二六 冯素弗墓发现的玻璃鸭形容器

看，也可以证实当时东西通航的这个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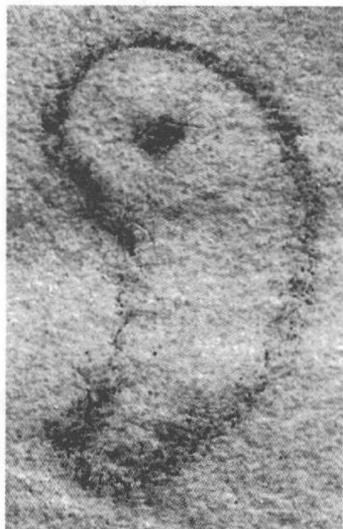
印度半岛南部沿岸和斯里兰卡许多地点，都发现了 1~2 世纪的罗马货币和同时期的罗马釉陶器。泰国湄南河口吞武里发现了罗马货币、罗马青铜灯，同出的还有印度的佛像。罗马青铜灯当时很有名，流布很广。吞武里还发现了我国的玉带钩和一件玻璃带钩。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越南南部金瓯角北迪石湾中部岸上的奥高（Oc-ao）地方（参看图一四），19 世纪 40 年代，法国人曾发掘了一处 3~6 世纪扶南时期的海港遗址，遗址所在现已离海岸 25 公里，发现有砖石建筑和木构的二层的干栏式建筑遗迹。遗址中出土了不少金制和锡制的装饰品，有指环、臂钏，耳环和多种佩饰，还有多种矿物质和玻璃的珠饰。还有金和锡的小型雕像，像的容貌，有印度人和西亚人。锡制品数量很多，除上述各种装饰品外，还有男女铸像，同出有锡铸的耳环所使用的砂岩模。这说明锡制品是当地铸造的。这里距盛产锡的缅甸、云南都很近，当地发现了铸锡工艺并不奇怪。锡制品中有不少印章和带有文字的长方形带耳的小札片，小札片记有文字，文字使用的是印度流行的婆罗迷字母，字母所记录的语言也是印度的一种方言。经过译读，札片上的文字有“珍贵品”、“注意”之类的词句，看来，有些类似今天系在货物包裹上的“飞子”性质的标记牌。这些文字资料，说明这处遗址可能与印度商人关系密切。还出了一些铜佛像，南印度式的较多，也有中亚健驮逻式的，还有类似我国南北朝的鎏金佛、菩萨铜像。其中南印度式立佛像与我国武昌一座 262 年吴墓中发现的一件带饰，其上镂空雕出一个袒上身的立佛像很相似。还出了三件我国铜镜的残片：一是东汉流行的规矩四神镜，一是东汉三国流行的八凤镜，另一件花纹已不清晰。也出了不少罗马器物，有玻璃器、青铜油灯和罗马货币。货币有安敦尼十五年即 152 年铸造的金币和马可·奥里略·安敦尼时（161~180 年）铸的金币。奥高的出土物，说明了这个地点它在当时东西航线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也很清楚这里是一处中国、罗马间的中继站。安敦尼金币的发现，恰好可和上引《后汉书》的记载联系起来。两个安敦尼的时期正是罗马帝国的盛世，当时出现了中国大秦间的直接交往，从这个遗址的

发现可以得到有力的旁证。

大约由于海道交通的发展，我国丝和丝织品运到大秦的数量更多了。近年在靠近地中海东岸巴尔米拉和它东北幼发拉底河上游一带，公元 1~3 世纪的古墓中，都曾发现丝织品。巴尔米拉和它东北幼发拉底河上游一带，原都位于当时罗马和安息交界地区，2~3 世纪并入了罗马帝国版图。巴尔米拉当时是丝绸之路西端的商业城市，所以那里发现的丝织品数量多、质量高，据发表的资料，有菱纹对兽绮、织出汉文字的锦，还有绣品，可以代表当时中原丝织高水平的三类品种，都在这里出现了。这，确实可以证明这个时期丝绸之路的繁荣。三国魏鱼豢在 3 世纪中期所撰的《魏略》中记：“大秦……常利得中国丝，释以为胡绌。”这是说，罗马这时已经用中国运去的丝，自己织造丝织品了。所以 4 世纪罗马人记载，丝织品在以前贵族才能制衣，现在一般人也可以穿用了。这话可能确实夸大，但说明了大秦输入中国丝和丝织品的数量，必然比以前大大增多了。

海路贸易的繁荣，还可从西方和印度洋一带运来的琥珀、玳瑁、玻璃得到说明。琥珀制的饰品和玳瑁制的用具，在东汉墓中发现得很多。南方的东汉墓发现得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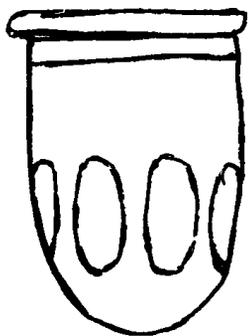
我们这时南方的铅玻璃工艺发展得也很快，不仅发现的数量多了，品种也大大增加，新的品种有耳珥和作为葬具用的蝉和豚等等。这种铅玻璃工艺的来源已作过推测，但这时烧制技术上如透明度的加强，颜色复杂化等等，这些大约还是不断受到西方——主要是大秦的影响的结果。我们的烧制铅玻璃的工艺，有迹象表明这时已东传到朝鲜和日本，日本弥生中期墓中出现了玻璃勾玉（图二七），勾玉是朝鲜南部和日本特有的一种装饰品。北九州福冈须玖遗址还发现了勾玉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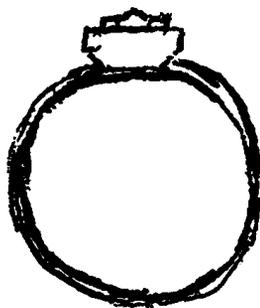
图二七 日本玻璃勾玉

福冈八幡市的古坟中还发现一件厚 12 厘米绿色半透明的小片玻璃，有人主张它不是器物，是从我国运去的铅玻璃原料。

和以前一样，我国已经制作出铅玻璃，并不等于不进口更高级的玻璃器。南京石门坎一座砖室墓曾出有残碗片，从它的形制上看有可能是从海道传入的西方制品。更清楚的是南京象山东晋大族王氏墓群中的 M7 发现的玻璃器。两件圜底直筒形玻璃杯，高 10.4 厘米，黄白色，下部外壁磨出一圈长圆形的装饰（图二八）。从阿富汗伯格拉姆和二次大战以后在伊朗吉兰地区的发现，可以推测这两件玻璃杯不是罗马的产品，就是伊朗的仿制品。另外这个墓还同出有金刚指环（图二九）。金刚石是斯里兰卡、印度、伊朗的特产。M7 虽然没有绝对年代，但这个墓群发现的墓志的时间在 341~348 年之间，这座墓的发现，不仅表明了东晋上层士族的奢侈，也说明了 4 世纪中西海路的发展。



图二八 南京象山王氏墓  
发现的玻璃杯



图二九 南京象山王氏墓  
发现的金刚指环

1962 年日本奈良新泽千塚的 M126 出土了一批玻璃器。1977 年出版了报告。从报告中知道这批玻璃器和过去日本出土的玻璃器不同。一件淡绿色的外壁磨出圆形装饰的圜底玻璃碗、一件深蓝色饰以金彩的小盘，还出了嵌金箔的玻璃珠和黄黑两色的玻璃珠。这批玻璃器经过化验也证明了是西方的钠玻璃。当时日本王室和我国的南朝联系很多，这批罗马系统的玻

璃器应是从我们南方转运过去的。最后一例的时间已到了东晋南朝，为了上下联系方便，就在这里提前介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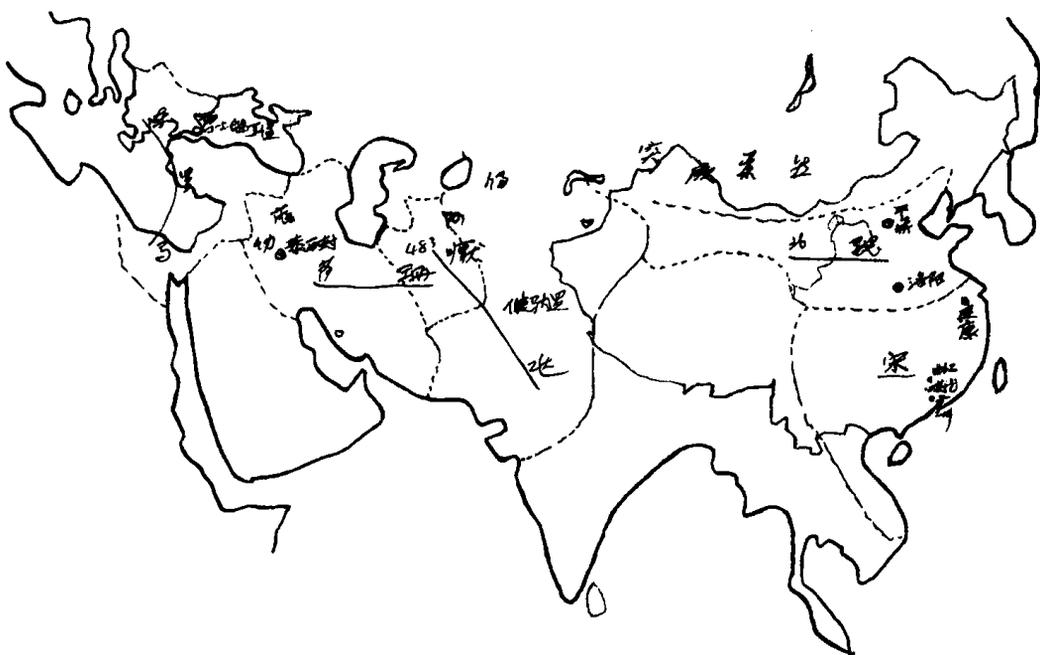
东汉时期由于中亚地区贵霜的兴起，东方和西方安息、罗马在陆路上的往来，较多的通过在贵霜控制下的月氏人和索格底人（粟特人）的东西活动。东汉和贵霜的关系，长期驻节在新疆的班超起了重要作用。佛教、佛教艺术开始向东传，安息人、月氏人都作出了贡献。这个时期东西通过海路的交往增多了，所以再迟一点，罗马的物品才能通过我国南方，传到更遥远的日本。在工艺技术交流问题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东方玻璃制品的进步和西方对丝织技术的初步掌握，是比较显著的两个事例。

## 五、东晋南北朝时期（4 世纪初～6 世纪）

（1980 年稿）

从公元前 2 世纪中期起，即从汉武帝时张骞凿空以后，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东西的直接接触和中亚出现的康居—粟特（索格底）商人的作用日益加强；此外，海运业逐渐繁荣起来。以上情况逐步发展了约 500 年，一个更新的隋唐时代出现了，这个更新的时代在东方比汉还盛。东晋南北朝这一段也可以说是从汉魏向隋唐过渡的时期。

东晋偏处南方，北方和中原是十六国的领域。东晋十六国之后是南北朝。南北朝一段从东晋亡、南朝刘宋建国的 420 年算起，这时北朝的北魏已灭了南燕，又灭了夏，统一了黄河流域。北魏主要统治集团是北方少数民族拓跋鲜卑，当时（5 世纪中期）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已被北方、西方的少数民族入驻了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年间，有三种情况值得注意：第一，北方的鲜卑、西方的羯、氐、羌和分散在西北的匈奴、小月氏诸民族，大都和中亚一带雅利安系统的民族有往还；第二，在这一百年里，许多在今甘肃、宁夏一带建立的地方政权，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更有意识地保持着向西方的通道，文献记载凉州（武威）敦煌一带在 4～5 世纪时，都集居了不少中亚的商人；第三，佛教趁内地混乱大肆传播，佛教主要是从西方输入的宗教。宗教也是文化的一个重要项目。另外任何宗教都不是简单地凭借口头宣传，都要有一套表现宣传的形式，并且还要力图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因此随佛教的东传，一些西方艺术，也愈来愈给东方以更大的影响。北魏在 5 世纪中期承继了上述三种情况，而他的统治集



图三〇 东晋南北朝时期亚洲政治形势

团中的主要部分——拓跋鲜卑，既没有汉族那样的“汉魏传统”，又因为和中亚游牧民族同属游牧经济，生活习俗有着较多的接近之处，所以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不仅没有阻力，而且还起了促进推动的作用。这种情况不仅贯穿在整个北魏，并且贯穿整个北朝。以后隋唐时期，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之所以又出现了新的高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这时的中亚、西亚的政治形势是：从东到西纵列着哒哒、萨珊波斯和东罗马（图三〇）。

公元300年左右，在中亚曾煊赫一时的贵霜开始衰弱了，贵霜西北新兴的哒哒人4、5世纪向南发展，5世纪初灭了贵霜，在贵霜王朝的范围内建立了哒哒国，并把势力伸向葱岭以东，到达今天的新疆中部。哒哒是北朝的叫法，南朝叫它作滑国。滑应是哒哒的合读。西方史料叫它白匈奴。大约是匈奴和雅利安系统的混种。哒哒的出现我们可以联系到以前讲的匈

奴的西迁，他应和匈奴西迁过程中留居在中亚北部的后裔有关系。吠哒人以游牧为生，但他统治了广大的中亚和新疆中部以西的各个农耕和畜牧的国家和民族，其中包括了以前所说的阿姆河流域的索格底人即康居—粟特（东伊兰语支），这时我国史书多用粟特这个名词。吠哒盛时向南一直到印度河口。567年吠哒为萨珊波斯和突厥的联军所覆灭。

吠哒以西是萨珊波斯。萨珊是226年灭了安息而建立的。它的范围西边包括了两河流域今伊拉克地区，北边在西部超过了高加索，东边到达了阿姆河，东边包括今阿富汗的大半部，是西亚的大国。萨珊波斯立国时间很长，从226年一直到642年，为阿剌伯（大食）所灭。

萨珊西邻罗马。395年罗马分裂为东西以后，地中海东岸和巴尔干半岛是东罗马的领域，首都在君士坦丁堡，即今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这个地方是古希腊移民都市拜占庭的旧址，所以西方历史又把东罗马叫做拜占庭帝国，我国历史还沿用旧名，叫它作大秦。东罗马延续的时间更长，一直苟延残喘到15世纪中期，1453年为土耳其人所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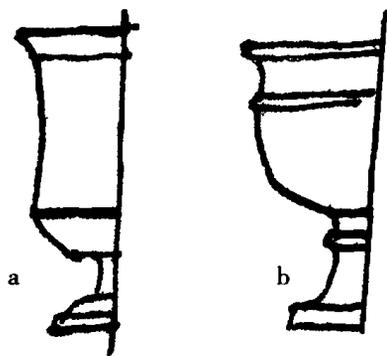
东晋、南北朝时期东西文化交流，具体的对象就是上述这三大政治区域。

### 1. 粟特人东来和中原发现的西方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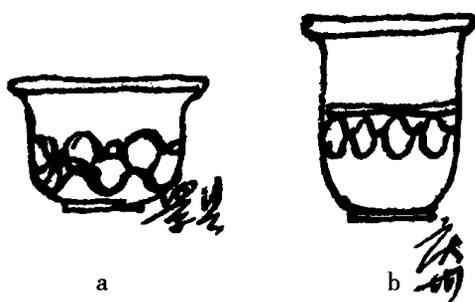
从汉通西域以来，粟特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大。上面讲过，公元初长安、洛阳一带的汉族上层人物，对被称作贾胡者就已经很熟悉了。三国时期月氏康居人已有的杂居于凉州地区。本世纪初，斯坦因在敦煌西边的一处遗址中曾盗掘去8件在淡黄色薄麻纸上书写的粟特文书，这8件文书，过去一直估计它的时间是1世纪的，经过近年研究知道它的时间要晚一些，有人认为是西晋末永嘉之乱后不久所书写，也有人认为北魏末年河阴之变（528年）后，分裂为东西魏时的遗物。看来前一说法可能更正确些。前一说法的时间应是311~312年。这8件文书是居住在敦煌的一位粟特妇女写给她撒马尔干（康国）娘家的一封信，这封信

中记载着，在大的战乱中，京城洛阳宫殿被焚毁，从长安到洛阳以东都遭到匈奴的掠夺，在长安及其周围的人都被赶走了，在洛阳的印度人、粟特人都饿死了。在敦煌居住的一百名上层撒马尔干人都还平安。这封信，看来是这个妇女托西归的同乡带回家乡的。遗憾的是，未离敦煌多远，就发生了意外，把她这封万金家信遗留下来了。也正因为当时出了意外，才能有近代的发现。这封信是现知粟特文资料中最早的一件。撒马尔干（康）是粟特人的中心，从信中可知，4世纪初东来的粟特人更多了，他们从河西一带一直分布到洛阳甚至洛阳以东，居住在敦煌的上层粟特人居然有一百名之多，上层粟特人当然都还带来一些奴婢和佣人，有人估计敦煌当时可能集居了好几百粟特人。信中还记姑臧（凉州）的粟特人也不少。凉州是河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永嘉之乱大批中原人士跑到了这里，西方商人集居到这里，是毫不足怪的。十六国初期（4世纪初）割据凉州的张轨的孙子张骏（史称前凉）346年死在凉州，文献记载他的墓中就曾发现“琉璃榼”，这应该是西方运来的器物。《北史·西域传》记粟特国商人“多诣凉土贩货，及魏克姑臧（凉州）悉见虏。文成初（452年），粟特王遣使请贖人。诏听焉”。魏克姑臧在439年，当时有较多的粟特商人被北魏俘虏，掳到北魏的都城平城（今大同）。平城在5世纪时多中亚商人，所以1970年在大同南部发现了具有浓厚西亚甚至东罗马风格的以葡萄纹为主的高足鎏金铜杯（图三一：a、b）。

当时平城一带的中亚人中，据文献记载有来自撒马尔干的富商，也有能制玻璃的传为大月氏的商人，《北史》记“太武时（424~452年）其国（大月氏）人商贩京师，自云铸石为五色玻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这段记录很重要，是西方玻璃技术



图三一 大同发现的高足鎏金铜杯（a、b）



图三二 景县 (a) 和韩国庆州发现的玻璃碗 (b)

发现不少萨珊烧制的玻璃器。北魏烧制的玻璃器什么样？河北定县发现 481 年埋葬在舍利石函中的大小玻璃器和 521 年景县封魔奴墓，还有 6 世纪中期景县祖氏墓所出的玻璃碗（图三二：a），制作比较粗糙、原始，大约即是当时北魏的制品。另外，南朝鲜庆州 5~6 世纪的新罗王族墓（瑞凤塚）所出的玻璃碗和景县所出极为相似，看来，应是通过高句丽由北魏传去的（图三二：b）。

3~4 世纪之际，中亚贵霜王朝瓦解了，位处它西北的哒哒兴起。哒哒人游牧为生，文化水平低，它占据中亚广大地区之后，重用粟特人，《梁书·诸夷·西北诸戎传》记“（滑国）无文字……与旁国通，则使旁国胡为胡书，羊皮为纸”，《通典》也记了这段文字，但“旁国”两字作“国中”。此国中胡和胡书，即是粟特人和粟特文字。由此可知粟特人在哒哒统治时期，成了游牧的哒哒人的知识分子，并且还参与了哒哒的对外事务。粟特人在哒哒东北的高车（丁零）地区（从阿尔泰山与伊犁河流域）也得到高车统治者的信任，《北史》记 488 年高车王向北魏平城派出的使者就是一个“商胡”，这个商胡从当时的情况推测，应当也是粟特人。6 世纪突厥兴起在阿尔泰山地区，不久西并高车，东亡柔然。突厥强盛初期粟特又取得了突厥上层的信任，568 年西突厥就曾派粟特人作为使者和东罗马联系。545 年西魏宇文泰（北周文帝）遣酒泉胡安诺槃陀使突厥，这件事同时也反映了居住于酒泉的粟特人也得到了西魏北周统治者的信任。从

传入我国的最早的明确的记录。《北史》记的大月氏商人，应是指大月氏地区的商人，大约也是粟特人。粟特人的玻璃技术是从萨珊学来的。4 世纪中叶，萨珊战胜东罗马时，曾从东罗马俘虏不少工匠，其中应包括玻璃匠师，近年在伊朗吉兰一带的 4 世纪以后的遗迹中

中亚到东方，在4~6世纪这个阶段，粟特商人或者是所谓“商胡”，他们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具有了较特殊的地位，因此，他们的活动就更加频繁了。他们频繁活动在葱岭以东所存下来的遗迹，除了上面已经说过的内容以外，我们归纳出以下三项：西方货币和它在东方的流通；西方乐舞的流行；西方器物和新出现的纹饰。

**西方货币和它在东方的流通** 西方货币在东方发现主要是萨珊银币和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出现较早，数量也多。1950、1955年新疆吐鲁番高昌城址发现两批银币，其时间都是309~388年所铸。看来在4、5世纪之际萨珊银币就到了新疆地区。1964年定县481年所建塔基里出土了萨珊银币41枚，中有一枚438~457年所铸的边缘刻有吠哒文字，说明这时萨珊银币有的是经由吠哒地区传来的。459~484年所铸的萨珊银币在新疆以东发现最多，西宁城内窖藏所出76枚都是这个时期的，定县塔基41枚中有37枚是这时期的。这应和北魏从435年起不断向西方遣使和455~522年间波斯遣使来北魏多达11次有关系。遣使的背后就是商业交换，商业交换甚至一部分使节在内都离不开东西往还的粟特商人。但也有晚一点如呼和浩特西北可能是白道城遗址发现了531~579年所铸的萨珊银币，白道城是六镇的后方基地，6世纪时，那里居住了不少较高级的拓跋军官，他们生活腐化，他们集居的地点可以作为5、6世纪从河套地区西经居延北转通往中亚路线上的要邑这个事实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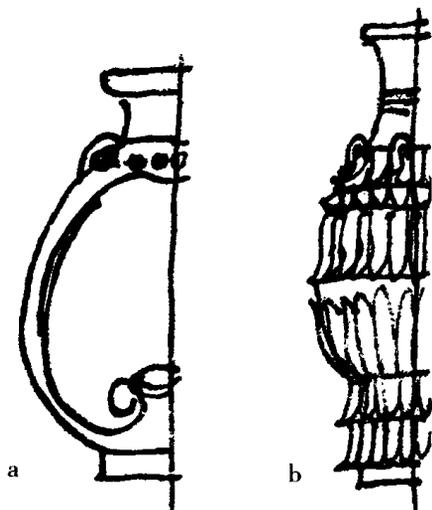
和萨珊银币相比，东罗马金币发现的数量就很少了，唯一可以推测是5世纪传来的是呼和浩特西郊发现的一座砖墓出土的457~474年所铸的金币，该墓随葬了一件银杯，与大同南郊出土的银杯（图三一b型）颇为相似。新疆的发现都是6~7世纪所铸的，501~540年河北赞皇李希宗夫妇墓虽然出了408~450年所铸的金币两枚，但也出了一枚527年所铸的，而墓的时代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它们是在6世纪中期遗迹中出土的。银币和金币在内地发现，最初并不是作流通的货币而是作为贵金属来收藏的，定县舍利盒里的藏品是作为供养的，李希宗夫妇墓的金币还有的在上面上下

对称地钻了一对小孔，更说明它是钉缀在衣物上的饰品。大约到了6世纪中期，西北地区敦煌所出的一卷531年写的经卷后记记：“以银钱三千文为赎钱，一千文赎身及妻子，一千文赎奴婢，一千文赎六畜，入法之钱，即用写经。”可见敦煌流通银币最迟6世纪的30年代就开始了。《周书·高昌传》记“（高昌）赋税则计输银钱”，北周的年代是557~580年，可证6世纪中期新疆高昌地区银币已成了法币。《隋书·食货志》还说：“北周之初……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这样，从6世纪中期今甘肃西部也流通了金银币。文献所记的银币即是萨珊银币，金币就是东罗马金币。从当时这两种货币在国外的发现看，萨珊波斯以西、以北和海路沿线，东罗马金币发现数量多于萨珊银币，而从萨珊波斯以东，银币占绝对优势。我们可举一例：19世纪英国人在阿富汗贾拉勒阿巴德发掘了一座6世纪的塔址，出土的舍利盒中东罗马金币出了5枚（408~474年），而银币则出了202枚（488~531年）。东方和西方东罗马的往还必须通过萨珊的转手，从这两种当时流通在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货币的情况就可以清楚了。而这两种货币在丝绸之路上主要却又不是他们两地（东罗马和萨珊的）人民直接使用，因为他们的经商本领都远远比不上中亚的粟特人，所以估计都是或者大部分是经粟特人转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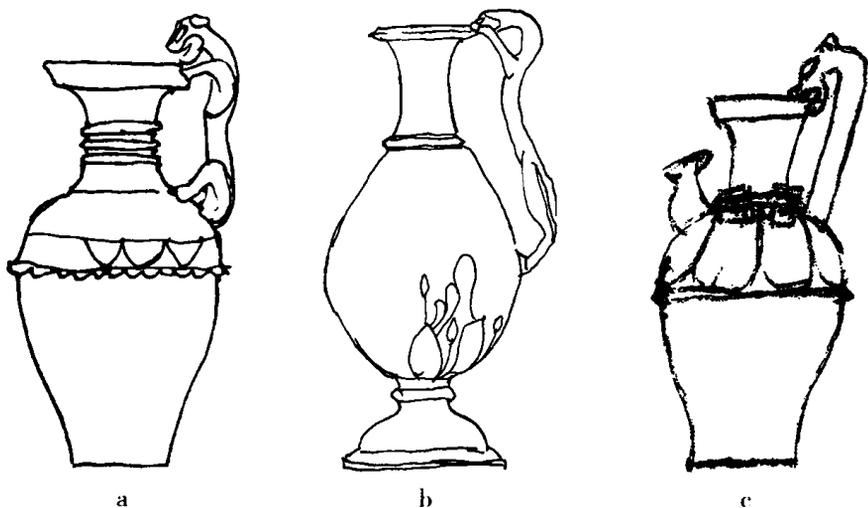
**西方乐舞的流行** 6世纪粟特人到黄河流域的不仅是经商的商人，还有许多擅长乐舞的艺术家。文献记载北齐（550~577年）末年有何、史等姓的粟特人能歌善舞，在北齐当了大官，甚至开府封王。胡人歌舞在当时上层极为流行。不仅北齐，北周也是如此。粟特人的歌舞中，以弹琵琶、吹横笛伴奏的胡腾舞最盛行，所以北齐墓葬中常发现印有这种歌舞图像的扁壶（如河南安阳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图三三：a）。抗战前，北齐都城邺城附近（今河北临漳县）曾出土浮雕画像石椁一具，其主要内容是一个出行行列和一个宴舞的场面。出行和宴舞的人物都是高鼻深目的中亚人，乐舞的内容正和上述扁壶图像相同，是琵琶、横笛伴奏的胡腾舞。这具石椁的主人，应当即是在北齐显赫一时的粟特人大官，不过因为是盗

掘出来的，已无法考查他的姓名了。

**西方器物和新出现的纹饰** 大批以粟特人为主的中亚、西亚人长期居住在黄河流域，他们有钱有势，因此他们从中亚带来的和黄河流域迥然不同的生活习俗，就不能不在黄河流域留下踪迹。上述歌舞是一例。他们喜爱的联珠纹、植物纹图案装饰也在中原地区出现，特别是植物纹从5世纪末几乎代替了汉魏以来的云纹，这反映在北魏和北齐、北周的石窟艺术上最为清楚。中亚西亚上层流行使用的金银器皿和装饰品，也在黄河流域有所发现，540~576年赞皇李希宗夫妇墓出土了锤鏤出水波莲花纹样的银碗和镶嵌青金石的金戒指都是西方的输入品。戒指上镶嵌的青金石上雕刻出驯鹿的纹样，驯鹿是中亚中部以北游牧民族惯用的装饰题材。青金石是青蓝色石头上带有金点，是少见的一种宝石，这时的金银铜器中多嵌有青金石。青金石使用量急剧增多，反映了葱岭东西交换的频繁。西亚、中亚金银器的纹饰喜欢用锤鏤的技法，使纹饰凸凹清晰，有立体感。这种新技法当时给中原很大影响，当时不少烧制瓷器的工匠，把它移植到瓷器上去，前面说过的胡腾扁壶上的图像就是仿造金属器上的锤鏤技法制作出来的（图三三：a）。景县封氏、祖氏墓出土的青瓷莲花大尊纹饰繁缛（图三三：b）更是仿金属器上的锤鏤效果的巨制。540年景县高雅墓出土的螭把瓷壶（图三四：a）和过去伊朗北部出土的螭把银壶极为相似（图三四：b），这更给中原瓷器上这种新型装饰的来源提供了直接证物。山西祁县北齐天统二年（566年）韩裔墓所出青绿釉螭柄鸡首壶（图三四：c），更是把上述的螭把壶和我国自西晋以来的天鸡壶



图三三 安阳范粹墓发现锤鏤胡腾舞纹饰的扁壶(a)和景县封氏、祖氏墓发现的大尊(b)



图三四 景县高雅墓发现的瓷壶 (a)、伊朗出土的银壶 (b)  
和祁县韩裔墓发现的青绿釉鸡首壶 (c)

结合起来。由上我们可以得出，我国陶瓷工艺在 6 世纪发展的源于金属器的锤鏤技法与造型，是这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之一，它将在以后的隋唐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 2. 我国石窟艺术中的西方因素

这个题可能专门一点，我尽量多作些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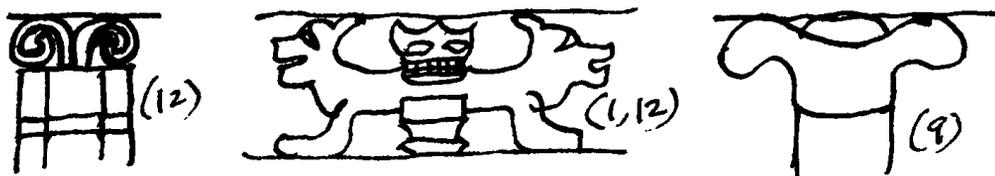
前面讲过和石窟艺术关系密切的健驮逻艺术，我国前期石窟遗迹大都是属于这一时期的，所以我们在这简单概述一下石窟艺术的西方因素问题。

健驮逻艺术主要是石雕，塑像是 4 世纪中叶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如果以这个作为分期界限也是可以的。前期希腊因素重，晚期已受到中印度笈多（笈多王朝 320~520 年）艺术和萨珊艺术（226~642 年）的影响。

新疆和甘肃一带没有适合于雕刻的岩石，所以那里的石窟都是塑像、壁画。从塑像为主这一点看来，它的开始不会早至 4 世纪中叶以前。还值

得注意的是这个地区石窟塑像的发展，从单身到成组合到连背景形象都使用堆塑（影塑）的做法，可见塑像技术发展很快。而这种塑出复杂的组合和背景形象，更是健驮逻地区已经到了5世纪中期左右的情况了。也就在这个时期，中印度的笈多王朝（395～490年盛世，前秦～迁洛前）兴盛起来，笈多艺术的影响更深入到葱岭东西，新疆石窟出现的附着在肉体上的弧形平行线的衣纹，所谓薄纱透体的衣纹，那正是笈多艺术的特征。甘肃石窟可以敦煌为例。在敦煌早期石窟中，除了上述新疆的西方因素之外，那里看到模仿健驮逻石雕的凸起衣纹和阶梯式衣纹。较早地出现了流行抹角叠砌的套斗式的萨珊藻井。还出现了印度多头多臂的护法神像。敦煌多方面吸收西方因素，看来不一定都从新疆转手而来，从3世纪以来凉州（敦煌属凉州）一带和西方关系密切这点来考虑，很有可能有一部分是逐渐直接从葱岭以西传来的。凉州附近石窟残存太少了，但山西云冈石窟和凉州关系密切，云冈石窟混合西方因素的情况，不仅可说明云冈情况，大约也可以作为凉州石窟情况的补充。

云冈石窟一般分三期，一期大约是在460～465年之间，第二期是465～494年，三期是493～524年。第一期的绝对年代虽然可考虑开始于460年，但它代表的时代，起码应包括十六国后期即5世纪初期。这一期云冈的代表作，大型佛像窟渊源于巴米扬大佛窟，巴米扬大佛窟是晚期健驮逻艺术的作品，所以既有凸起衣纹、阶梯衣纹，还有贴体密密的平行线衣纹。第二期是云冈西方因素最复杂的时期，有各种柱头，希腊、波斯、印度的柱头（图三五），有罗马流行的三叉矛，和罗马、萨珊流行的双翼



图三五 大同云冈第二期石窟雕刻有西方因素的各种柱头



图三六 大同云冈第10窟  
门神所著冠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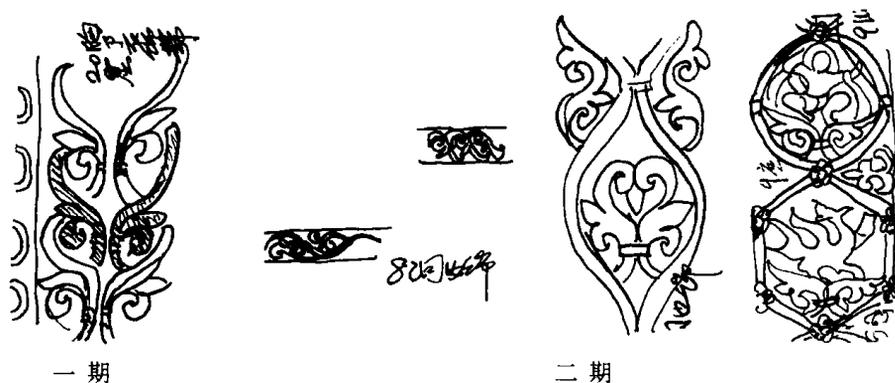
图三七 大同云冈第二期  
石窟中的莲瓣装饰带

冠饰（出现在银币上以俾路支〔459~484年〕为最早，图三六），还有印度的护法神像（多头臂，骑牛、雀）。更值得注意的是图案纹饰。云冈第一期的图案纹饰不多，只是在佛的上衣的上沿出现了联珠和侧视的葡萄叶所组成的花纹带。这种侧视的葡萄叶日本人叫它忍冬，我们接受过来了，一直这么叫，其实它的正视是葡萄的叶子。葡萄，中原地区不生产，新疆地区也是从葱岭以西移植过来的。地中海沿岸和西亚是它的原产地，所以地中海东部沿岸使用忍冬最早，希腊公元前就使用了。忍冬作为纹样，云冈第一期曾有出现，但作为建筑物上的装饰花边出现在第二期。第二期纹样的题材有两种，一种是莲瓣（图三七），另一种即是上述的忍冬；后一种发展很快，从第一期衣饰上的排比式到连续式

的忍冬，又发展到缠枝式的忍冬，更进而发展到杂有人物禽兽的缠枝忍冬（图三八）。此后，整个北朝一直到隋和唐初，忍冬亦即侧视的葡萄叶，始终都是最流行的边饰花纹。

### 3. 蚕丝技术的西传和外销丝织品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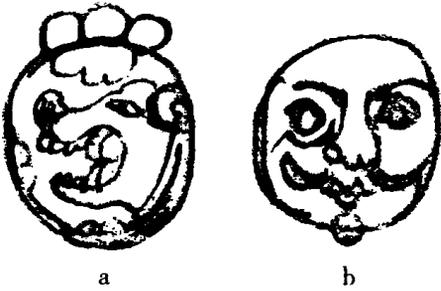
养蚕缫丝技术比较复杂，要包括养育蚕、植桑和缫治，因此，尽管西方羡慕东方的丝织品，但蚕丝技术却不易传播。不易传播是因为工艺复杂，并不是有些西方人所夸大的中国人保守秘密禁止外传。工艺尽管复杂，大约很早就传到了新疆，斯坦因在民丰盗掘的3世纪遗址中就出现了大批枯死的桑树，看来3世纪蚕桑技术已传到于田是可靠的。蚕桑技术西



图三八 大同云冈石窟忍冬纹由简单向繁缛发展

传，于田是一个中继站。4、5世纪时新疆已有好多地点生产织锦了。吐鲁番出土的十六国和稍后的文书中有“丘慈锦”、“高昌所作丘慈锦”、“疏勒锦”的记录。520年前后，从西亚回到洛阳的慧生说，康国出锦，520年滑国遣使南朝的梁，贡献波斯锦，可见6世纪初期粟特人和波斯人都能织锦。织锦不一定会养蚕植桑，也可以用东方运来的原料（丝）。但6世纪东罗马人记查士丁在任时（527~565年）有波斯人把蚕桑技术传到君士坦丁堡。这个记录，至少可以证实当时波斯人是掌握了东方的蚕丝技术的。看来，最迟6世纪以前东方的蚕丝技术已越过了葱岭，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中亚、西亚掌握了蚕丝技术之后，在他们传统的毛织技术的基础上，很快就发展了起来，一种使用织毛锦的技法——毛织技术的技法即在纬线上起花的丝织品——纬锦出现了。这种中亚或西亚织造的纬锦，虽然质量不高，但纹饰特殊，最初大约是随粟特人的东来传到新疆及其以东，不久也引起了葱岭以东各族人民的重视。吐鲁番6世纪中期的墓葬M303中出土的联珠对禽对兽锦，和陕西三原开皇二年（582年）李和墓石棺上线雕的联珠野猪纹和人面纹，即是西方的输入品或是摹自西方输入的织锦纹样（图三九）。

和玻璃工艺传入我国后的情况相同，蚕桑技术西传后，并不等于排斥



图三九 三原李和墓石棺上的  
联珠野猪纹(a)和人面纹(b)

了东方丝织品的向西输出。波斯、罗马人虽然掌握了蚕丝技术，仍然喜欢中国的产品，因为和他们的产品比，中国丝织品精细，不仅可以织出复杂的花纹，而且有薄有厚，有斜纹、皱纹，品种繁多，所以中国的丝织品仍然是重要的输出品。考古发现还表明，6世纪的输出的丝织品中，还出

现了大批专门向西方销售的外销品。这种外销品，目前虽然还未在葱岭以西发现，但在新疆吐鲁番古墓中出土了不少。从6世纪中期的吐鲁番墓中，开始出现一种和魏晋时期花纹不同的织锦。魏晋还延续着汉锦二方连续的山云鸟兽的纹样，6世纪中期出现了没有山云背景也没有鸟兽等动物的树纹锦。大约在6世纪末之际又出现了四方连续的围绕一圈圆点、内置对禽对兽的新纹样。这种一圈圆点的纹样，《北齐书》中有记载叫“联珠”。用联珠圈作装饰，过去简单地认为是萨珊的特征，其实自6世纪起东自新疆的库车，向西到粟特人居住区阿姆、锡尔两河之间、阿富汗、伊朗迄北高加索一带都流行。近年苏联在撒马尔干的遗址中，发现一批7~8世纪的联珠圈纹的丝织品，上有用粟特文写的生产这种织品的地点是“旃达那西”（Zandana村）或译赞丹纳村生产的“赞丹尼奇”（Zandaniji）。这个地点在阿姆河中游的布哈拉（即安国）附近。布哈拉也是一个很大的仅次于撒马尔干的粟特人集中的地点，那里生产丝织品到现在还很盛。因此，有人推测这种联珠圈纹恐怕是粟特人的传统纹样，如果此说可靠，我们这时开始织造的联珠纹锦，就很可能出自在我国经商的粟特人的影响了。粟特人外运我国的丝织品，他们为了在中亚、西亚一带，特别是他们故乡一带畅销，要求织造他们喜欢的纹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联珠圈纹锦，圈中还有织出“胡王”铭记的胡人牵驼纹样、胡人对饮纹样，很显然就是为了外销而生产的。值得注意的还有织出萨珊贵族服装的猎狮纹

样。狮子是当时萨珊贵族非常喜欢的打猎对象，因此萨珊时期波斯贵族也非常喜欢这样的纹样，看来，这种纹样主要是为萨珊贵族们织造的。总之，6世纪内地生产了多种多样的外销丝织品，它形象地表明了丝绸之路上我国这种传统商品的外运，并未因为蚕丝技术的外传而有所减弱，反而由于织出了西方喜欢的纹饰而扩大了外销。这种联珠圈纹样的织锦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出现是7世纪初，大约是大业年间的420窟中绘出的花样最为复杂，武则天晚期的洞窟就成了尾声（～702年），8世纪初以后就只是偶然出现的题材了。

#### 4. 纸开始西传的问题

纸的发明是东方对世界文化做出的另一重大贡献。考古发现证明西安灊桥出土麻纸的时间是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期。东汉时造纸术已有很大提高，前面讲过斯坦因在敦煌西边盗掘去的用粟特文书写寄往撒马尔干的信，可能是在311～312年间用八张淡黄色的薄纸书写的。这八纸信件，当时虽然没有捎到撒马尔干，但可以估计这类事不可能是仅有一次，因为前面讲过3世纪粟特人东西往来已很频繁，居住在自敦煌以东的粟特人也有一定的数量，起码他们和中亚老家的书信往来不可能太少，而这时东方纸的使用已是比较平常的事了。这些，我们还只是推测。现在我们进一步统计一下敦煌以西新疆地区使用纸的时间和使用情况：1) 若羌东北罗布泊（罗布卓尔）西楼兰遗址，这里在3、4世纪时是西域长史治所所在地，曾出土了好几批古纸，都是作为书写公私文书用的，其中有纪年的是从曹魏嘉平四年（252年）到西晋永嘉六年（312年）。另有一批古纸，其中至少有三份是在346年左右西域长史写给焉耆王的信稿。若羌楼兰遗址的发现，清楚地告诉我们3世纪中期到4世纪中期，这里的公私文书已使用了纸。这里也出了不少木简和木牍，可知这里当时纸和木简是并用的。2) 吐鲁番高昌及其附近遗址，是汉以来戊己校尉的驻地。有人在这里找到有东晋隆安三年（399年）纪年的纸，附近石窟和佛塔中出了不少3～6世纪

书写的纸卷佛经，其中最早的纪年是西晋元康六年（296年），也出了不少这个时期的非佛经的纸卷书籍。大约从3世纪以来，吐鲁番地带就集居了不少汉族人，因此这里4世纪以来的墓葬中出了不少用纸写的汉文文书和它的残件，所以可以据此推测最晚4世纪吐鲁番地区已应用了纸。3) 库车曾发现西凉建初七年（411年）纸卷写经。这卷经尽管还证明不了是否是在库车书写的，但也没有证据可以否定。如果可以推测是书写在库车，那么最迟5世纪初纸已出现在库车了。库车已经到了新疆中部偏西。4) 从库车往西，在今喀什西南的莎车，过去有人在这里购得一些用婆罗迷直体字母书写的纸本残卷，据字体估计时间约在公元500年以后，大约是6世纪的遗物。这样6世纪纸已经传到葱岭的东麓了。上面我们列举的一系列发现，它的时间顺序，大体符合自东向西逐渐传播的路线。3、4世纪在若羌，4世纪在吐鲁番，5世纪到库车，6世纪到莎车。这就是说到南北朝晚期，新疆地区使用纸至少已有三百年的历史了。这三百年也是东西往还发展的三百年，至少从东向西托人带书信，用纸是要比木牍、羊皮都方便得多，所以我们认为4~6世纪东方发明的纸已传过了葱岭，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 5. 南方发现的有关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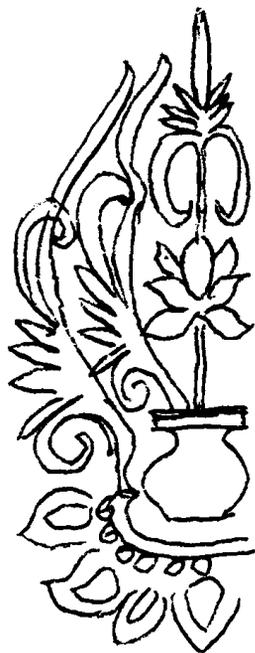
东晋南朝和西方的交通，陆路上由于北朝的中阻，是通过吐谷浑今青海地区进入四川，然后顺江东下，山川阻隔很不方便。所以在文化交流方面主要是通过海路。当时有不少佛教徒和商人泛海来到广州、建康（今南京），有的还溯江而上到达长江中游。南方发现的有关遗物，大约和这些佛教徒和商人都有关系，后者的关系可能更大些。

和商人有关的器物，货币是重要的一项。广东的英德、曲江的南朝墓中都发现了萨珊银币。这两个地点，都是在广州北上的大道上，那里发现的波斯银币，显然是从广州传来的。《隋书·食货志》：“梁初……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波斯银币在这里，应是作为金银使用的，所以曲江

墓发现的9枚银币，都被剪成了残片，说明当时使用时不是以枚为单位而是以重量计算的。这一点和西北地区使用的方式不同。

卫护佛法的狮子，捧持供养物品的飞天，还有化生、宝珠等与佛教有联系的图像，莲花、忍冬等西方的纹饰，在南方的考古发现里都是从南朝砖墓中开始流行的，这可能是由于南方佛教石窟很少，当时修建的佛教寺院都已不存在了的缘故。莲花、狮子的图像在南朝墓葬中出现，大约从刘宋时期的5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南京油坊村墓可作代表。上述的其他内容出现较迟，大约到了齐梁时期，即5、6世纪之间。河南邓县画像砖墓和江苏丹阳、常州发现的南朝墓可作为晚期的代表。常州南朝墓可能更晚到梁后期，画像砖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装饰组合，即忍冬、莲花插到较低矮的盘口瓶、罐里，这种“瓶花”（图四〇）在北朝，也是北朝晚期石窟中才开始出现的。东方因为室内席地而坐，无桌椅之设，所以没有瓶花摆设这种传统。但这种瓶花，公元前后就在地中海东岸和西亚流行了，在我国出现最早的是以前讲过在新疆民丰发现的大约是3世纪的木雕中。它向东发展，看来是作为供奉佛像而伴随佛教艺术传来的。南朝墓葬往往把供奉佛的题材和装饰，借用到供奉墓主人，所以这种“瓶花”也在墓砖中出现了。当然出现在墓砖中的时间，比它的开始使用要晚一段时间。

南朝都城今南京附近的梁朝陵墓前都布置一对或两对高大的神道石柱，这种神道石柱，是在我们华表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东汉时期中原的墓葬前面就出现了，但柱上饰以覆莲石盖，盖上蹲踞石狮的做法，则不是我们的传统。这种做法渊源于西方，它首先见于古波斯帝国，后来在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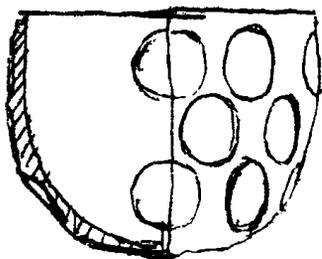
图四〇 常州南朝墓  
画像砖上的瓶花

的建筑群中很流行，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于前 250 年左右在各地建立的纪念石柱和梁神道石柱极为类似。阿育王纪念石柱很多是为提倡佛教而建立的，南朝出现这种石柱装饰又正是提倡佛教的梁朝，这不能是偶合，估计也是和佛教艺术的东传有联系的。前面说了，佛教徒认为狮子是护卫佛法的，神道石柱顶饰以狮子应是和把护卫佛的东西借用到护卫墓主人方面这一情况是相同的。

南朝和朝鲜南部、日本的关系密切，许多西方的因素随中朝、中日文化交流传播到朝鲜和日本。

1971 年韩国锦江口的公州，5 世纪时是百济的都城所在，发现了百济国王武宁王夫妇墓，1974 年出版了发掘报告。墓内出土的墓志上记：“宁东大将军百济斯麻王……乙巳年（525 年）……安厝。”武宁王的官职是梁封赠的，这件事见于《梁书》。该墓墓室是长方形的砖室，砖上印有莲花忍冬纹，这些渊源于西方的纹饰当然是从梁学去的。值得注意的是王妃金冠饰以镂雕出的“瓶花”，它的形象和上述常州墓砖上的大体相似。

1962 年日本奈良新泽千塚的 M126 出土了一批玻璃器。1977 年出版了报告。从报告中知道这批玻璃器和过去日本出的玻璃器不同。一件淡绿色的外壁磨出小圆形的圜底玻璃碗（图四一），一件深蓝色饰以金彩的小盘，还出了嵌金花的玻璃珠和黄黑两色的玻璃珠。这批玻璃器不仅器形、装饰与中国制品不同，经过化验证明了它是西方生产的属于罗马传统的钠玻璃。



图四一 日本奈良新泽千塚发现的玻璃碗

另外以前日本冲ノ岛、京都、大阪都发现了外壁磨出较大的圆形装饰的厚壁玻璃器（碗及其残片）。这种玻璃质量很好，与前面所讲封氏墓、瑞凤塚所出不同，但也和前面所讲千塚所出的罗马传统的玻璃器有别。过去不知道它是什么地方烧制的。二次大战后，伊朗考古发展了，在伊朗北部吉兰地方发现了大批这类玻璃器，因而知道日本发现的这种玻璃器是萨

珊的产品。日本这些玻璃器，罗马传统也好，萨珊制品也好，它们传到日本，当然是要经过我国，从当时日本和南朝关系密切的情况估计，很有可能是从南朝东去的。这一阶段的玻璃器，特别是典型的萨珊玻璃器，目前我国国内发现得很少（鄂城吴晋墓、新疆喀什都未发现）。日本的发现也可以补足这一方面的缺乏。同时西方的玻璃器这时期较多地出现在日本，如大阪传安闲天皇陵出土的玻璃盘、京都市北区上贺茂神社境内发现的玻璃盘片、福冈县宗像郡大岛村冲ノ岛祭祀遗址出土的玻璃盘等，也反映了这时东西文化交流不仅频繁了，而且领域也扩大了。

东晋南北朝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又比东汉魏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陆海两方面，中西直接接触更频繁了。在中亚，文化发展较高的粟特人大批东来，不仅把中亚、西亚的文明带到了东方，而且还传播了罗马和印度的文化。烧制玻璃的工艺和高度发展的佛教艺术，是东传来的两项重要的技艺。蚕丝技术的西传，这时也逐渐明确了。大约从4世纪起，内地的纸张，已在新疆地区较广泛地使用，新疆使用了纸，大约也意味着，这种既方便又经济的新的书写用具，有可能已成为一种新的输出品，出现在丝绸之路上了。海路和陆路同样，也在迅速发展，西亚、印度许多装饰纹样，在南朝墓葬中较普遍地被使用。文献记载在这个时期印度商船有的竟驶入长江，远抵江陵港口，这件事也可以作为一项中西海路交通的重要参考资料。正是由于陆海两路东西往还的日益频繁，因而才能出现下一时期隋唐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发展。

## 六、隋唐五代时期（7~10 世纪）

（1980 年稿）

隋唐时期葱岭以西的历史背景，我们从中亚、西亚部分叙述。这里先讲中亚，以后在第 3 和第 8 两个子目再讲西亚。

6 世纪中叶分布在我国西北阿尔泰山一带的游牧民族突厥兴盛起来，先向东于 552 年颠覆了柔然，拓地到河套以东与东西魏暨后来的北周、北齐为邻，567 年又在西边联合了萨珊波斯灭掉了哒哒。接着突厥人向南侵占到阿姆河以南，囊括了全部中亚。这时，突厥的势力比过去的匈奴、哒哒都要强大。583 年（隋开皇三年），主要由于突厥统治阶级的内讧分裂为东西。以阿尔泰山为界，以东为东突厥，以西为西突厥。从 6 世纪中期到 7 世纪中期有一个世纪之久，中亚为突厥统治。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又被突厥所重视。粟特人在突厥做大官，作为突厥的使臣往来于突厥和波斯、东罗马、隋唐之间。他们的文字被突厥所借用，西突厥货币中就使用了粟特文。粟特人在突厥的地位，甚至比在北齐还要高。657 年唐灭西突厥，西突厥的领地全部进入了唐的疆域，到了 661 年唐在于田以西，迄原萨珊波斯东北界，设置了二十多个都督府，先都属于安西大都护府管辖，后来又设北庭，分别进行管理。一直到 751 年（唐天宝十载）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为大食击败之怛逻斯之役之后，唐势力逐渐退缩到葱岭以东。从 7 世纪中叶到 8 世纪中叶，有一个世纪的时间，中亚直接划归中原的唐政权统治之下。这时粟特地区，唐人多叫它作昭武九姓。“昭武”，粟特语是“王”的意思，昭武九姓就是九个王国。九个王也就是说粟特地区主要有

九个政权。这九个政权分布在锡尔、阿姆两河的中下游。有七个地址大体明确，即康、安、曹、石、米、何、史，另两个穆、火寻，今地不详。昭武九姓的人到中原，一般都以政权的名称为姓，这个做法由上一阶段 5、6 世纪就如此了，甚至有的可以早到 2、3 世纪，不过到了隋唐就更加明确了。由于包括粟特地区在内属于突厥的领地，唐代盛时，都在唐的疆域内，所以和中原的关系非常密切，现在把这个地区（主要是中亚）属于这个时期的考古发现，简括为两个子目：第一是粟特以东的突厥地区的发现和碎叶城遗址；第二个是粟特地区即昭武九姓的遗迹。

### 1. 粟特以东的突厥地区的发现和碎叶城遗址

突厥人大约也和以前的匈奴人一样，对内地的铜镜非常感兴趣。从叶尼塞河上游米努辛斯克一带开始，经鄂毕河上游到额尔齐斯河的突厥遗址和墓葬中，多有出土。从早期的秦王镜（图四二）、大约武则天晚期流行的海兽葡萄镜到开元年间出现的八菱花鸟镜都有发现。其中海兽葡萄镜的数量最多。突厥墓葬的情况，可以突厥中部鄂毕河上游库迪尔格的积石墓葬为例，这是一批 6~7 世纪的小型石墓群，每座墓尸体近旁大多有一匹马具齐全的马匹随葬，随葬品还有铁箭头、箭筒、匕首和剑，有



图四二 西伯利亚突厥遗迹出土的秦王镜  
（附镜铭录文：“赏得秦王镜，判不惜千金，非关欲照胆，特是自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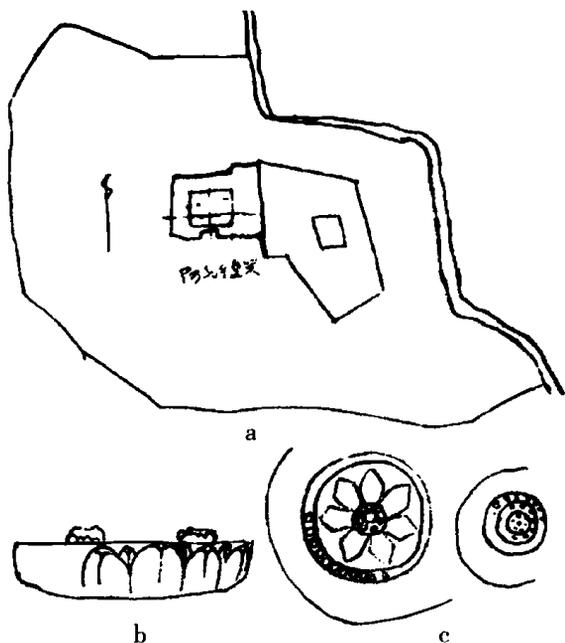
货币、铜镜和多种丝织品。货币有中原的货币，也有突厥人仿照中原方孔圆钱的样式铸造的货币，即所谓的突骑施钱。突骑施是西突厥东部的一个部落，唐灭西突厥后，归北庭都护府管辖，7世纪末该部落势力强大，虽受唐封号（唐封突骑施部长乌质勒为怀德郡王），但实际已恢复并继承了当年的西突厥的情况。突骑施钱即7世纪末以后这个地区自己所铸的货币——正面铸出“开元通宝”或粟特文，背面铸出一张弓。这群墓葬告诉我们这里的突厥人一方面一直保持着他们的游牧经济，同时也在发展着商业，贸易的对象从货币的情况可以估计重点是向中原的。游牧生活变化不大，那么发展交换就必然要依靠受他们所统治的粟特人了，所以它的货币上有的铸出粟特文。

西突厥——突骑施时代，以吹河和锡尔河之间为大牙（衙）地区，以伊犁河流域为小牙地区。大牙小牙是他们统治集团的两处重要的活动区。前者以千泉（今苏联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北）为中心，后者以弓月（今新疆伊宁附近）为中心。突厥相信粟特人，所以从伊犁河到吹河这片地区内，大约从6世纪起就建立起粟特人的居住点了。据70年代初的统计，仅吹河流域就发现了6~10世纪粟特建立的城镇遗址18处。这18处遗址有很多都发现了中原的遗物。这里重点介绍的是阿克彼兴（AK-Beshim）古城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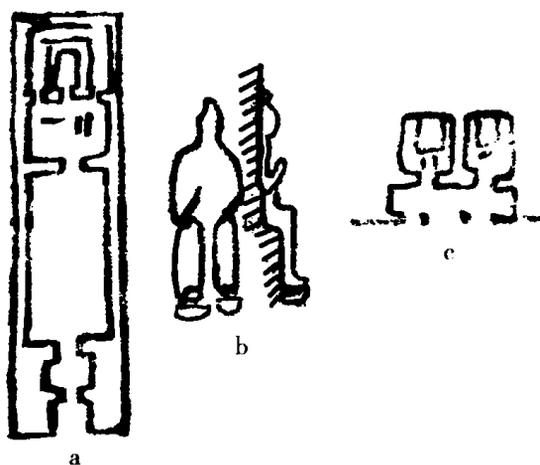
城址位于吉尔吉斯共和国首府伏龙芝与托克马克之间，在托克马克西南8公里，已大体确定它即是著名的碎叶城址。城系土坯垒砌，扁方形，东西约750米，南北约550米，城周约8~9公里。城内有十字街（图四三）。在十字街北侧的发掘知道这里文化层大致可分四层。最下是5~6世纪遗迹。最上层是9~10世纪遗迹。中间两层包含物最丰富，可以考虑绝对年代的器物有7世纪开元通宝和东罗马于611~641年和641~668年铸造的货币，7~8世纪的突骑施钱和8世纪的乾元重宝、大历通宝。生产生活用具发现了铁犁和各种陶器，有壶、有盘，还有玻璃器的残片。此外，土坯墙中出有大麦秸，灰坑中出有小麦粒，还出了杏核和手磨。看来，此

城在 7~8 世纪最为繁盛。碎叶这座城，最初是粟特人居住点，6 世纪中叶起成了突厥统治下的粟特城镇，7 世纪中唐灭西突厥，679 年（唐高宗调露元年）安息都护王方翼重筑碎叶城，《新唐书·王方翼传》：“方翼筑碎叶城，面三门，迂回多趣（曲），以诡出入，五旬毕，西域胡纵观，莫测其方略，悉献珍货。”大约过了二十年即 699 年左右为突骑施所占。739 年（开元二十七年）北庭都护盖嘉运进驻碎叶，在城内建了一个大云寺。748 年（天

宝七载）北庭节度使王正见又进驻碎叶。751 年（天宝十载）怛逻斯之役后，又为突骑施所据。碎叶的考古发掘证实了以上的文献记载。王方翼所建的城，即是在粟特人城镇的基础上修建的。城内设十字街，这是中亚以前所未见的，我们知道，隋唐中原州城的一般规划是这样。一面三门的情况不清楚。但这个新规划的城市在中亚出现，必然引起粟特人的注视，所以这个阶段在中亚修筑的城市中就流行了这样的布局，这大约是中原都市设计影响到了粟特人地区。城内发现的佛寺址二，其一即文献记载中的大云寺。大云寺在内地是武则天载初元年（689 年）下令开始兴建的，它的特点是主要佛像中安排了弥勒。弥勒在这时的特点是倚坐，即垂双脚坐式（图四四：b）。这座佛寺遗迹长约 80 米，宽约 22 米（图四四：a），有前后殿，后殿中间左右各置一高 4 米的佛像，左侧出了一个垂足佛座知



图四三 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彼兴古城址  
（碎叶城址）平面（a）和所出残石像  
足座（b）、瓦当（c）



图四四 阿克彼兴古城址内佛寺(大云寺)  
平面(a)、洛阳龙门石窟双窟平面(c)  
和唐代寺院中的弥勒佛倚坐像(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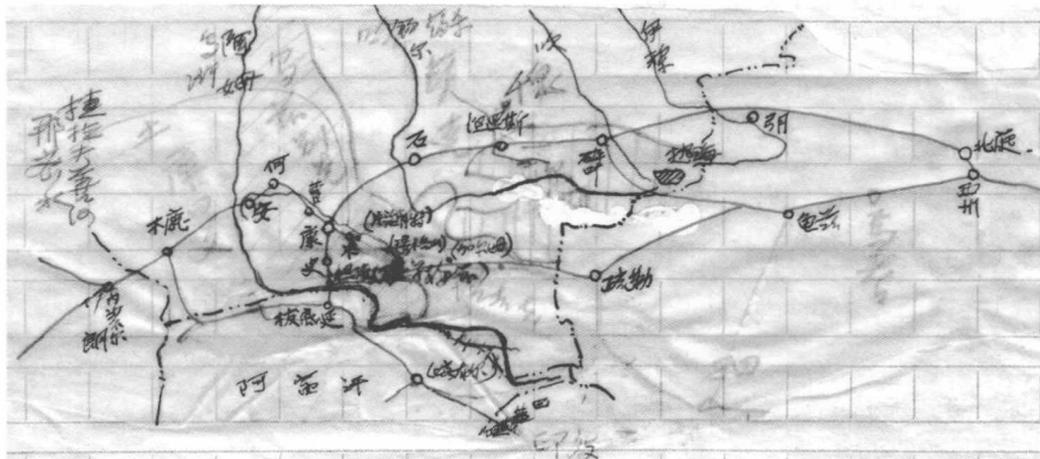
道是弥勒，右侧则当是释迦坐像。这样布局和洛阳龙门石窟武则天时期开凿的双洞很接近(图四四：c)。我国一垂足、一坐成组的佛像，只见于7、8世纪的中原地区，其他地点和其他时期都没有这种布局。因此，我们认为碎叶这个佛寺遗址即是大云寺。遗址出土了不少莲花瓦当(参见图四三：c)和7、8世纪各地的货币，前者莲花瓦当说明内地的建筑用材和使用铺瓦顶的建筑形式在

这里出现了；后者货币说明在7、8世纪碎叶城不仅是中亚的政治中心，也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城市。各种货币还告诉我们，碎叶正是和文献记载的情况相同，7、8世纪和内地的关系非常密切。唐代共铸了五种铜钱(另外两种乾封、建中钱)，这里出了三种。乾元、大历两种，更说明怛逻斯之役后，这里和内地还有较多的联系，起码是商业上的联系。货币中数量最多的是正面铸有粟特文、背面铸出一张弓的突骑施钱，另外还有一种正面铸“开元通宝”、背面铸一张弓，这种钱，也是突骑施钱，其时间比上一种为早。唐的力量逐渐缩小，稍后突骑施铸钱就废了后一种货币。尽管如此，还是沿用了唐钱内方外圆的形式。7世纪末突骑施强盛之后，以碎叶为大牙所在地，8世纪中期，碎叶城内虽然又驻扎唐兵，但突骑施仍然游牧在碎叶川，所以碎叶城出土货币以突骑施钱为最多。7、8世纪唐在碎叶的力量不是孤立的，碎叶西怛逻斯之役时高仙芝所驻的怛逻斯城7世纪时也是繁荣的城市。该城址略作方形，450×420米，十字街，北端有子城，这显然也是一座在隋唐州城布局影响之下兴建的。碎叶和怛逻斯两城之间

还有一个小城库兰约 200 米见方，也是一个十字街布局，这个库兰城大概就是《新唐书·突厥传》所记的 740 年（开元二十八年）西突厥最后一个可汗阿史那昕被突骑施杀害于碎叶西的俱兰城。另碎叶城内还发现了 12 世纪的遗址，其中也有寺院废墟。12 世纪辽灭亡时，辽皇室耶律大石带了一部分人马逃到中亚建西辽，它的都城也在这里，所以这 12 世纪的遗迹应是西辽的遗迹。西辽建都这里时的名字叫八拉沙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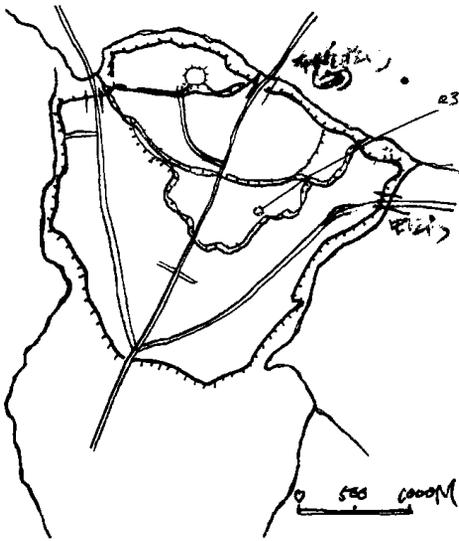
## 2. 昭武九姓的遗迹

从怛逻斯以西锡尔河（药杀水）、阿姆河（乌浒水）两河流域是粟特人集住之地。这个地区古城址非常多，两水中下游之间有一条那密水即今捷拉夫善河，昭武九姓几个重要的都城都在这条河的两侧（图四五）。



图四五 昭武九姓的位置和东进中国的主要路线

首先我们介绍粟特最重要的地点——康国的都城，即上面屡次提到的撒马尔干的发现。古代的撒马尔干城址在今城的北郊，古城址现名阿弗拉西阿勃（Afrasiab）。遗址保存较好。这座城一直使用到 13 世纪初，1220 年为成吉思汗军队所破坏。它开始的时间可能在前一千纪的中期，以后逐



图四六 乌兹别克撒马尔干阿弗拉西阿勃遗址（康国）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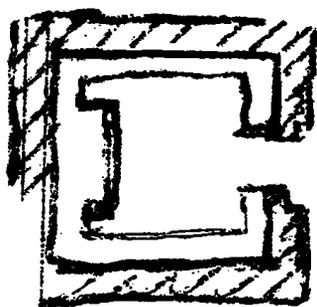
渐从北向南扩充，但在7世纪前期玄奘经过这里时，就是这个规模了。因为玄奘记载此城“周三十余里，极险固”，就和现存古城遗址的情况相符合。此城子城在北，共有三层外城。子城和三层外城都各有河流或城壕围绕。经过发掘知道：子城内布置了王宫和国家的行政机构，城东南有一块高地，这应是防御性的设施。第一层外城是贵族、上层人物的居住区和为他们服务的作坊。第二层外城是第一层外城的扩大，大约在7世纪后期，这个区域可能因为位在城中便于防

守，所以也在这里兴建了宫殿。第三层外城是手工业区和市场的所在。整个城内街道的布局，是中央大街为主干，左右设置放射式的斜街。中央大街的北端，古城的城门叫布哈拉门，是通向布哈拉即古代的安国的。东斜街通向的门叫中国门，康国和内地的往来，大约主要是走这个门（图四六）。这个城中世纪文化层中出土了大量的器物，有8世纪的大型水磨，各种陶器和釉陶器。8~10世纪的遗址中较普遍的发现玻璃器，有高足杯、带耳的杯、长颈瓶和各种小瓶、各色玻璃珠饰等。还发现了一座制造玻璃的作坊，看来，当时这里使用玻璃器已很普遍了。玄奘曾记此国“机巧之伎，特上诸国”，撒马尔干的手工艺至晚7世纪之前就具有较高的水平了。1965~1967年，苏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队在上述的第二层外城内偏东处发掘了一处7世纪后半的宫殿遗址，发现了很重要的壁画，1975年他们把壁画部分的报告发表了。从他们发表的情况看，知道在此宫殿遗址的北部有一座向东开门、11米见方的方形殿堂（图四七），殿堂上部已被8~12世纪的建筑物破坏了，残存高1.5~1.7米的四壁，四壁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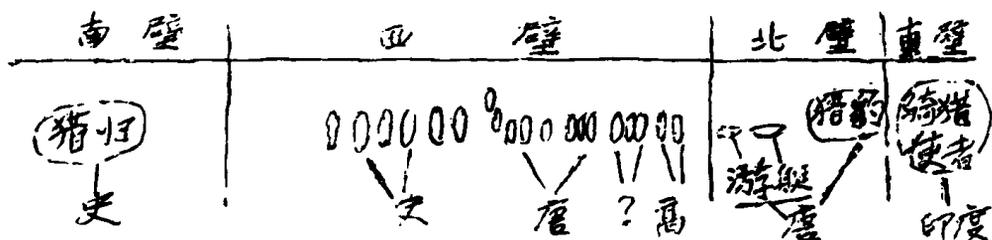
绕建低坛，西壁的低坛的正中部分向外凸出，这里大约是放置座位的所在，那里正对进口，因此知道迎门的西壁是此殿堂的主壁。主壁壁画内容是国王接见各国使臣的情景，据粟特文题记知国王的名字即是《新唐书》所记永徽时（650~655年）授以康居都督府都督的拂呼纒。国王画在正中，两侧立或坐着几排使臣。最下方南侧立着三个外国使臣都穿联珠纹锦袍，其中一人手持着联珠锦盒，大约是礼品，根据画中的题记知道这是怛密国的使臣。怛密

国在康、史之南，从史国南行过铁门即是吐火罗的范围，当时的吐火罗大体相当于今阿富汗的范围，吐火罗最北一个割据单位即是怛密国，该国都城沿阿姆河，今名捷尔梅兹（Termez）。661年（龙朔元年）在此设置姑墨州都督府。西壁最下方的北侧的使臣，有三组，最前面的六个人，都着幞头，穿圆领衫袍，这应是唐朝的使者，使者前四人捧礼物，最后一人持笏立，应是唐使中的正使。唐使者后边的一组三个人，有的身披兽皮，国籍不详。最后一组两个人，头饰双羽，大约是高句丽的使臣。南壁、北壁的壁画，是西壁壁画的延续。南壁与西壁南侧相接，画的是怛密使节骑猎归来和康国官员出迎的情况。北壁与西壁北侧相接，画的是唐使骑马猎豹，更值得注意的是北壁西端壁画水中的两个游艇，前艇画着幞头的唐朝男子，后艇画九个梳高髻的唐朝妇女和一个戴幞头男装的唐朝妇女，她们有的持乐器，正中一女形象较大，衣饰华丽，是一个很有身份的女子。众多的唐朝妇女应与使臣无关，发掘者推测可能是来自唐朝的康国王室中的女眷。文献记载没有唐女嫁康王的事迹。东壁门两侧画有裸体射箭的童子、对坐人物和骑马使臣，发掘者推测这画的是在途中行走的印度使臣（图四八）。

从此殿堂全部壁画的布局上看，壁画中强调了三个国家的使臣，即东方的唐，南邻的吐火罗和更东南的印度。在三个国家中，特别强调了唐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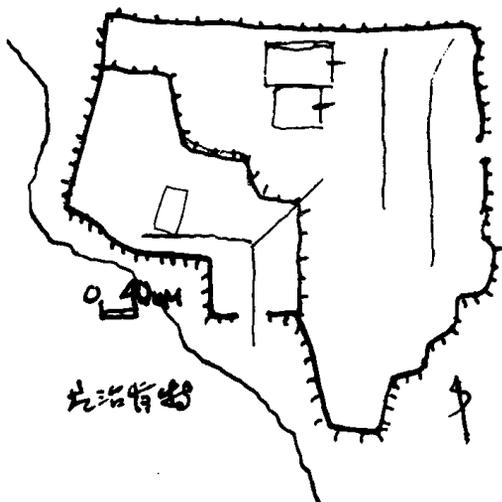
图四七 阿弗拉西阿勃  
第二层外城内宫殿遗址  
北方形殿堂址平面



图四八 阿弗拉西阿勃第二层外城内方形殿堂内壁画布局

和唐朝人物的活动，这大约是因为康当时是唐的一个都督府，其国王接受了唐朝的封爵和唐代关系密切的缘故。总之，此处壁画的发现，既提供了唐与中亚关系的形象资料，又进一步明确了撒马尔干地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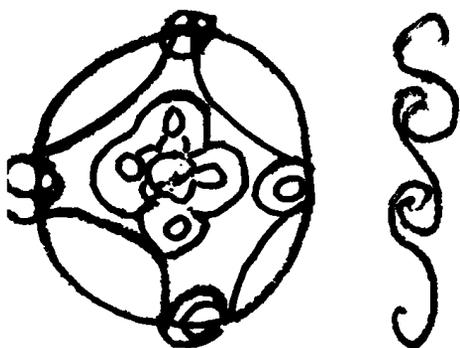
其次介绍撒马尔干东南 68 公里的片治肯特 (Pyanjikent) 古城。这座古城根据《隋书》、《新唐书》的记载，应是“西北去康百里”的米国。古城位于现在片城的东南郊，是 8 世纪大食入侵后废弃的。城分内外城 (图四九)。子城即内城在西南隅，应是王宫所在。外城围绕在子城的东部和北部。北部并列两所面东的拜火教寺院。都是中间建有四个柱子的大厅，



图四九 片治肯特古城(米国)平面

厅后有长方形密室，厅前有柱廊和宽敞的方形庭院，庭院四周的建筑物里都有壁画，壁画中主要题材是米国上层人物宗教活动的内容，还有一幅是劈面致哀的场面，这应是突厥人的风俗。外城东部是由许多的房屋群组成的贵族居住区，许多房屋是二层甚至三层的建筑。每一组房屋也都有一个具有四个柱子的正厅，正厅壁面都画出主人生活内容的壁画。壁画中有锤鏤纹饰的金

银器、有联珠纹和类似毼纹的地毯，有织出四瓣小花和勾云纹的织物(图五〇)。上层男女都着圆领窄袖衫，这是粟特人服装，还有一种弯形的套着鞘的刀和马扎式的胡床。还有一幅玩骰子的场面。这些都可以和唐代上层流行的用具相比较。在古城址的发掘工作中发现了一些中原器物，有北周的布泉，唐的开元钱和海兽葡萄镜的残片。还有萨珊和粟特的货币。



图五〇 片治肯特古城外城寺院  
遗址壁画中所绘织物上的  
四瓣小花与勾云纹饰

在片治肯特东约 120 公里的穆格山上，发现一座半圆形的城堡遗址。这座城堡出有陶器、木锄、大麦粒、桃杏核和苹果、葡萄皮。还出有箭头、短剑鞘、刀子、皮面木盾。还有棉织、毛织和丝织的残衣片、革制品。还出有金饰品和骰子。还出了 1 枚银币，2 枚铜币。铜币方孔是摹仿内地铜钱的式样。发现了内地来的竹器和漆器。最重要的发现是 81 件文书：有 71 件是写在皮革上、木棒上和纸上的粟特文书，有写在皮革上的阿刺伯文文书和突厥文文书各 1 件，还有 8 张纸的汉字文件。粟特文书多是这个城堡的统治者的书信、账目和历书，书信中有和康国国王来往的信件。阿刺伯文文书是米国王写给 717~719 年的大食统治者的信件。这个米国国王，据说就是因为反抗大食而逃到这个城堡里来的，结果，这个城堡还是被大食人攻破了，那个米国王被俘遇害，这个城堡也就被破坏，沦为废墟了。8 件汉文文件，拼合成 3 件残文书，一件是地籍，一件是借券。地籍和借券上的人名都是汉人。另一件记有明确年代、地点，是神龙二年(706 年)河西地方的公文残件。从后一文件推测，这 3 件汉文文书，与此地无关，是从河西地方带过来的。上述那件地籍背面写有粟特文。据粟特人利用汉文文书的旧纸和除汉文文书用纸外只有粟特文文书用纸这两点来推察，那 3 件汉文文书很可能是粟特人想利用其背面，因此它和一些没有

使用过的纸一起被粟特人从东方带过来的。纸是中国的特产，西方文献记载中国制纸术的西传大约始于怛逻斯之役之后，由被俘的唐朝士兵传到中亚，在撒马尔干开始生产纸。这里发现的包括3件汉文文书在内的纸的文书，其年代在751年怛逻斯之役之前，至少要早二三十年，是现知葱岭以西发现最早的内地纸张。从以前讲述过的4世纪初居住在敦煌的粟特人写给撒马尔干的信到这里发现的8世纪初的纸，都是粟特人经手，因此，在纸的西传问题上，无可怀疑地又是粟特人起了重要作用。

从穆格山向东约80公里的加尔姆地方曾发现方形的海兽葡萄镜和有东罗马皇帝像的金印章和金制的人像，发现的情况不清楚，但可以估计还是粟特人的遗留。方形葡萄镜时间较早，大约在7世纪中晚期，东罗马皇帝像的印章可以和新疆和田、吐鲁番多出东罗马货币联系起来，也可和咸阳独孤罗墓所出565~578年所铸东罗马金币、西安何家村窖藏、西郊土门村墓中出土的610~641年所铸的东罗马金币联系起来，共同反映隋至盛唐以前粟特人和东罗马的往来关系比以前密切了，这和6世纪后期西突厥派粟特人出使东罗马，此后中亚和东罗马从里海以北的草原上直接往来的新情况是有关系的。

沿捷拉夫善河向北到邻近阿姆河的布哈拉一带，布哈拉即是昭武九姓的安国国都所在地。《新唐书·西域传》：“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西濒乌浒河，治阿滥湫城。”布豁、捕喝和布哈拉都是译音，乌浒水即是



图五一 布哈拉川华拉赫沙古城（安国）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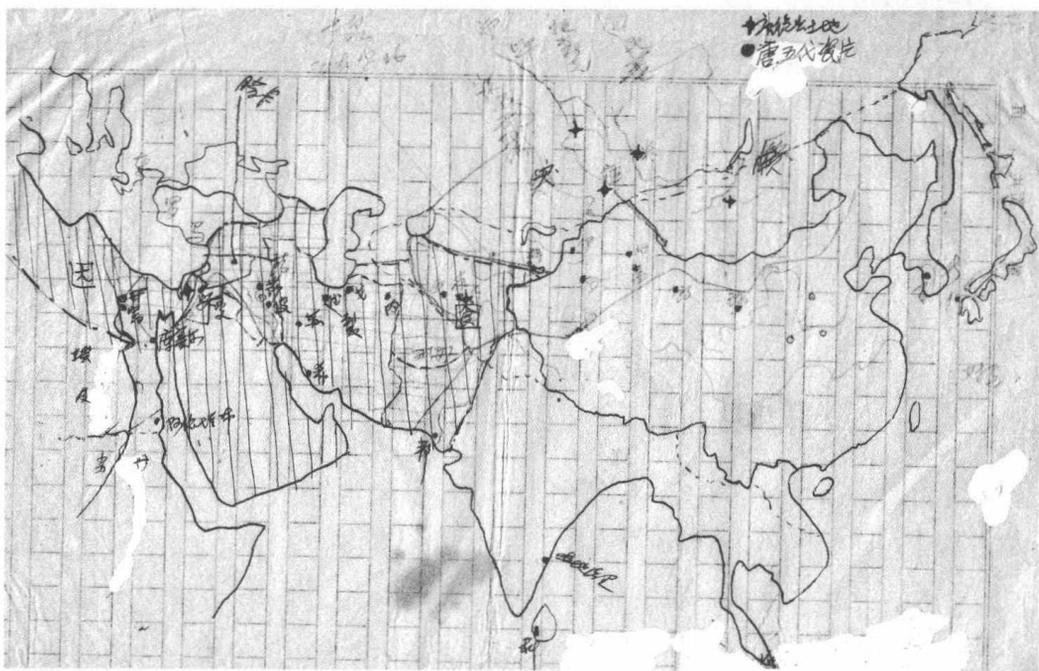
阿姆河。安在昭武九姓中的力量仅次于康。阿滥湫城遗址在今布哈拉西，现名川华拉赫沙。古城东南隅有子城（图五一）。子城内的7世纪的宫殿遗址，装饰华丽，有用白石膏雕塑的壁画装饰。这种有雕塑人物、禽兽、树木，还有联珠纹的装饰带。这种石膏雕塑壁饰，是萨珊波斯宫廷中流行的做法。宫殿中央大厅的壁面装饰着彩绘壁画。大厅

西壁绘出一幅狩猎的场面，一个猎者骑在象背上和两只豹子搏斗，很生动。豹是当时锡尔河、阿姆河流域常见的猛兽，前面讲撒马尔干壁画中就有唐使臣猎豹的场面。粟特人常捕豹仔驯练成猎豹。文献中记有不少昭武九姓向唐贡豹的记载。开元十四年（726 年）一年中安国就进贡了两次豹。中原狩猎唐时开始出现使用猎豹的情况，懿德太子墓第一天井的东壁绘有出猎时牵着驯豹的长须的西域胡人的形象，说不定就有安国人在内的粟特人的形象。

### 3. 大食的兴起与大批粟特人、波斯人东来的遗迹

（参见本讲稿最后表五《东西方分区年代简表》）

上面我们已经讲到了阿剌伯人（大食人）的东侵。阿剌伯人的兴起是中亚、西亚的一件大事，也和中西文化交流有密切关系。为了进一步讲述隋唐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有必要再简单追述一下当时的历史情况（图五二）。



图五二 大食范围示意（附著录唐镜、唐五代瓷片出土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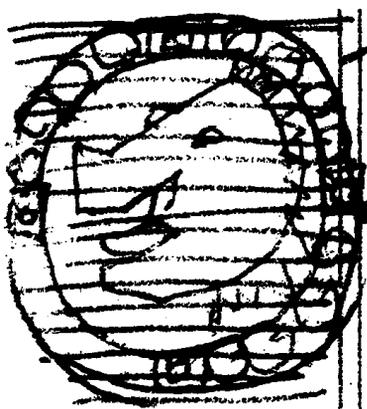
7世纪初，阿剌伯人穆罕默德（摩诃末）开创了伊斯兰教，在他的时代，他率领他的信徒征服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建立了阿剌伯伊斯兰神权国家。632年，穆罕默德死后，他的继承人自称哈里发（穆罕默德的继承者之意），首先攻占了地中海东岸东罗马的领地，接着向东进攻，637年攻占了萨珊都城泰西封（巴格达），萨珊伊斯提泽德三世（伊嗣侯）逃向伊朗高原然后逃到中亚粟特人地区。652年死在木鹿（今苏联土库曼斯共和国的马里），萨珊波斯亡。661年阿剌伯建立了倭马亚朝（白衣大食），750年阿拔斯推翻了倭马亚朝建立阿拔斯朝（黑衣大食）。阿拔斯朝最初的一百年间（8世纪中叶~9世纪中叶），是阿拉伯帝国繁荣强盛的时期。9世纪中期以后，阿拔斯朝的阿拉伯帝国日益衰弱走向分裂。阿剌伯（大食）这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对征服的异教徒，要么接受伊斯兰教的经典可兰经，信奉伊斯兰教；要么就丧失生命或者流亡。当7世纪中期萨珊波斯灭亡，阿拉伯向中亚扩充时，包括萨珊王室在内的大批波斯人和中亚的一部分粟特人被迫东逃。波斯人、粟特人和唐代的关系源远流长，最初他们都寄希望于唐代，希望唐朝出兵帮助他们抵御大食（阿剌伯），但751年怛逻斯一战希望破灭之后，他们有不少就越过葱岭流亡到中国。流亡的数字是很大的，在唐代文献里我们常常看到西域胡、波斯胡的记载。前者主要是粟特人，但粟特人和波斯人都是深目高鼻的雅利安种，粟特人的语言属东伊兰语族，又与波斯语很接近，因此唐代的内地人很不容易分辨，往往相混，所以西域胡这个名词也包含波斯人。因为粟特人东来的时间很早了，早已形成用国家的名称作姓的习惯，因此，在文献上往往还可以分辨出来，但在遗迹遗物方面就不大容易了。因为从8世纪中叶起，粟特人、波斯人大批东来，来了以后又不好回去，特别是波斯人，就在内地安家立业了。留下来的人有的携带了家眷，没有携家眷的有不少就和中国内地各民族结了婚，带了家眷的后代也不能不和中国各民族通婚。粟特人向以经商为主，波斯人东来也有不少经营商业，这样8~10世纪内地许多商业发达的城市都有他们的足迹。文化交流往往是和商业分不开的。加上，波斯

王族等等上层人物和粟特人上层人物的东来，又带来了许多高级的奢侈用品和各种豪华的游艺，这些对唐代上层也是有一定影响的。现在我们就国内的考古发现，初步考察一下隋唐时期国内出现的中亚、西亚的影响。

这些人留下不少遗迹，有实物，也有各种当时的记录，现以吐鲁番、敦煌为重点，介绍一下所了解的情况。

#### 4. 吐鲁番—敦煌的发现

葱岭以东我国的新疆地区毗邻中亚，唐初在新疆的中部吐鲁番地区设置了西州，这是和内地完全相同的州县地方行政机构。它是唐代管理西方广大地区的后方基地，也是从西方进入内地的第一站。这里，很早就集居了不少中亚各族人民，当然主要是粟特人。从吐鲁番历年发现的各种粟特文书和汉文文书所记的昭武九姓的姓氏，可以知道隋唐以前移居到这里的粟特人数量已很不少。一件与高昌重光元年（520年）衣物疏共出的名簿，残存人名45人，全非汉族，以曹姓为主，还有安、何、康等粟特人。唐时就更多了，据这里发现的籍账知道他们已和汉族居民完全相同成为编户的百姓，有的务农，有的立军功而授勋，也有的文书中明确记录他们是兴贩的胡商，如一件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买卖文书中记有“兴胡安忽娑”和开元十九年（781年）卖婢券中“兴贩米禄山”。吐鲁番过去还出了一些粟特文的佛经，从语法和用语上可知大部分都是7~8世纪从汉文佛经翻译过去的。吐鲁番还出土了不少4~6世纪的波斯银币，但最多的还是7世纪的，特别是萨珊最末一代国王伊斯提泽德三世（伊嗣侯）632~651年所铸的银币，曾一再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墓葬中被发现（M302二枚，M363一枚）。也是在7世纪中期的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了不少一种较粗松的联珠锦，这种锦是在纬线上织出花纹的，花纹的内容主要是禽鸟，也有野猪头（图五三）。这种锦织法与花纹都和内地产的不同。前几年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有“波斯锦”的记载，看来，它可能就是波斯所生产。萨珊末年的货币，和波斯锦出现在吐鲁番，应和萨珊亡国、波斯人东来是



图五三 新疆阿斯塔那  
发现的波斯纬锦上的  
联珠野猪头纹饰

有关系的。吐鲁番初唐墓葬中发现最早不超过7世纪初的内地生产的织锦，也出现了在纬线上起花的技法，在纬线上起花的织锦是波斯、中亚一带源于毛织品的技法，内地织锦出现这种新织法，应当是在波斯、中亚织锦的影响下发生的。这种新织法，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恰好在吐鲁番出有永徽四年（653年）墓志的墓中出土了两块同样花纹的织锦（联珠对马），而这两块织锦，一块是经线上起花，是内地的传统织法，一块是纬线上起花。这种情况，大约

可以说明内地开始织造纬线上起花的纬锦的时代。而这个时代，也正是粟特人、波斯人开始大批东来的时期（652年萨珊亡）。

在吐鲁番南边和东边，隋、初唐时期，出现了两个粟特人的居住点，这是在敦煌发现的一卷光启元年（885年）张大庆抄写的地志残卷（S. 367）上记录的：一处是在吐鲁番南的若羌附近，是“贞观中（627~649年）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石城镇），胡人随之，因成聚落”，残卷还记这个聚落包括四座城：除上面的石城镇外，还有石城镇西240里的新城，石城镇北四里的蒲桃城和石城镇东南480里的萨毗城。残卷上说此四城都是康艳典所筑。另一处是在吐鲁番东边的哈密附近“伊吾郡，隋乱复没于胡。贞观四年（630年）首领石万年率七城来降”，还记这里“袄庙中有素书（画）形象无数”。这个姓石的首领应是昭武九姓的石国人。石国即位于今塔什干。若羌、哈密位于吐鲁番通向内地的要冲，这两个要冲地都有相当多的粟特人的聚落，一个四座城，一个七座城。再向东就是有名的敦煌了。

本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卷子、文书中，有不少记录了敦煌附近居住的粟特人的情况，比前面讲的吐鲁番的情况更具体。我们现在回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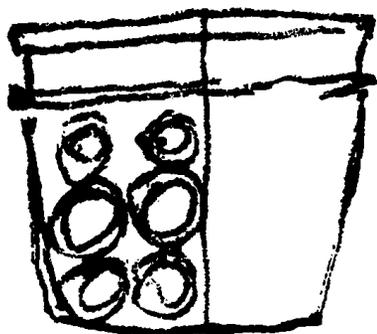
下：4 世纪初这里已有来自撒马尔干的居民。到了 6 世中期，从一件西魏大统十三年（547 年）效穀郡的残文书中知道粟特人曹匹智拔、曹乌地拔等已在敦煌东北的效穀正式建立了户口并且还有了土地。敦煌残卷中有一部《沙州都督府图经》（P. 2005），大约著于 7 世纪末（武则天时期），书中记了两件值得注意的事：一是“兴胡泊……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商胡从玉门关道，往还居止，因以为号”。从伊吾东南行先经敦煌西北一百一里的一个水泊地方“往还居止”，因此把这个无名的水泊起了一个“兴胡泊”的名称，可见在 7 世纪末以前这里出现了一个商胡的居住点，当时商胡主要是粟特人。另一条“袄神，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总有二十瓮”。袄教是粟特人信奉的宗教，袄庙附近集居着粟特人。敦煌还出了一卷 10 世纪的《归义军酒账》（P. 2629）中记“（七月）十日城东袄赛神，酒两瓮”。这个城东袄，大约即是上述的袄神。还出了一卷 10 世纪所写的《沙州敦煌二十咏》（P. 2748），其中有“安城袄咏”一题：“板筑安城日，神祠与此兴，一州祈景祚，万类仰休徵……更看雩祭处，朝夕酒如绳。”看来这个安城袄，大约即是上面所记的城东袄。这首杂咏告诉我们不少重要情况：第一，在敦煌城东一里处集居的粟特人修了一座夯土城，修城的时间是“神祠与此兴”，知与袄神同时出现的，那么这个粟特土城最迟在 7 世纪末就存在了；第二，这里的粟特人可能以安国人为主，所以城名叫“安城”；第三，至少在作《沙州敦煌二十咏》的年代，即 10 世纪时，这座袄庙的影响很大，“一州祈景祚，万类仰休征”，不仅粟特人供奉它，万类可能包括汉人也很崇拜它，所以天旱时到这里祈雨，赛神时敦煌的统治者归义军还送来酒两瓮。袄庙影响大，实际也反映了这里的粟特人的实力。粟特人在敦煌居住的情况，还可从藏经洞所出其他公私文书中看到，一件是天宝十三载（754 年）敦煌县差科（徭役）簿（S. 543）记录；康、安、曹、何、石、史、米等粟特人约三百户，一千四百人。这些粟特人当时和汉人在政治上并没差别，他们当府兵（曹大庆弟引吐迦宁，卫士），有的还当了品官（康伏帝香是五品子），还有很多被授过勋（康胡子轻车

〔都尉〕），甚至授到最高的勋（曹大庆，上柱国），这大约是由于军功而得到的酬劳。还有粟特人以白丁的身份负责管理市场（曹大宾，白丁，市监师），可见粟特人和商业的关系密切。一件 818 年文书（S. 542 背），记录了在吐蕃占领时期在敦煌各佛寺服役的人名单，不少史、曹、安、康、石、何等姓的粟特人和汉人同样为佛寺服劳役，他们服役的项目，除了常见的工役（修仓、看碓、营田、放羊）之外，还有煮酒、修佛、修函斗等需要技术的工艺。此外，还有注明他们职业的如车头、酒户、毡匠等。做什么工作的都有了。一件后唐同光三年（925 年）的沙州净土寺文书（P. 2049 背）单上，记录了向净土寺交借粮付利润的人名，其中属于昭武九姓的约占总人数的 1/3（13：47），可见在 10 世纪前半，这里不少粟特人还和汉人同样生活困苦，甚至有的要向寺院借贷，成为佛寺敲诈剥削的对象。以上情况，如果和上面所说的 10 世纪的《沙州敦煌二十咏》安城袄咏所提供的材料合起来考虑，当时敦煌粟特人的数量之多、实力之大确实是值得惊异的。因此，敦煌藏经洞还出了不少粟特文文书，出了不少从汉文佛经翻译的粟特文佛经，其数量比前面讲过吐鲁番所出同类佛经多得多。粟特人喜欢的联珠纹装饰，也在 7~8 世纪的石窟壁画中出现，壁画中那种纹样甚至一直延续到 9 世纪。近年又在新发现的一批 8 世纪的绢幡中，发现用墨捺印的联珠对禽纹样，敦煌出现简易捺印的印染技法，而印染的内容是联珠纹，说明这种纹饰在敦煌是如何的流行了！

## 5. 长安、洛阳等地发现的与中亚、西亚有关的遗迹

中亚、西亚影响最集中的地点是当时的都城长安和洛阳及其附近。萨珊亡后，萨珊末代皇帝的儿子卑路斯二世携带家眷逃到长安，673 年也死在长安。679 年唐朝派裴行俭送他的儿子泥涅斯回国，泥涅斯在波斯边境上待了二十多年，呆不下去了，景龙初（709 年）又回到长安，后来也死在长安。萨珊皇室和唐代的这种关系，可以想象萨珊皇室贵族和随之而来的波斯人有不少集中在长安。西安及其附近唐代遗迹里出土不少波斯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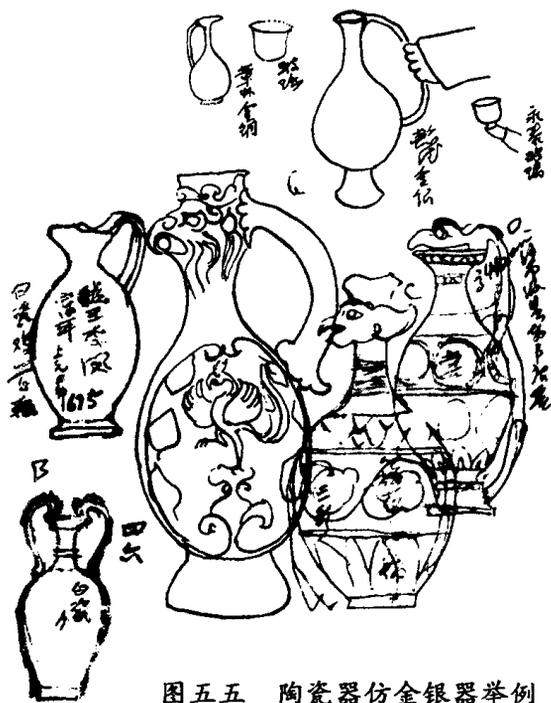
币,有的出自墓葬,有的出自窖藏,也有的出自塔基。值得注意的都是萨珊末期的,有 590~628 年所铸,有 630~631 年所铸(651 年萨珊亡)。出银币的那个窖藏位于西安城南何家村,相当于唐长安兴化坊的范围内,这个窖藏里还出了一件外壁饰以圆圈纹的白色透明玻璃碗(图五四)。这种圆圈纹玻璃器萨珊晚期吉兰地方出土较多,估计应是那里的产品。这些萨珊器物在西安出现,看来不是偶然的情况,应和波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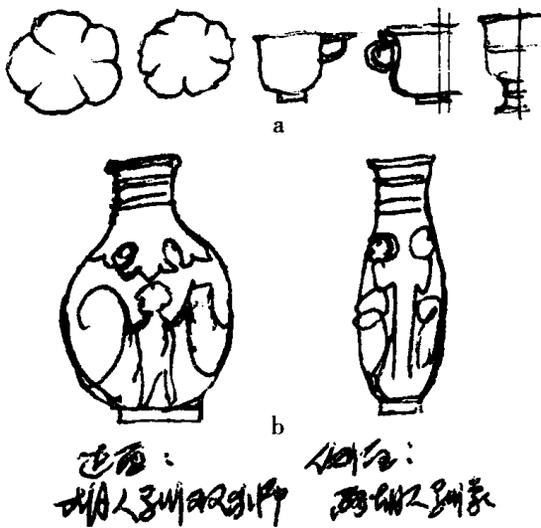
图五四 西安何家村唐窖藏中的玻璃碗

人的流亡有关系。8~9 世纪长安的统治阶层流行使用的金银器皿的制造,除了波斯、中亚一带习见的锤鍍、钹鍍技艺之外,还出现了金花技法的装饰和从埃及传到波斯的掐丝珐琅技艺。近年西安出现了好多批这类高级奢

华的器皿,上述西安何家村窖藏是一批很集中的发现。由于金银器皿在上层流行,我国陶瓷工艺仿制金银器的作风更盛了。不仅纹饰上摹仿,有名的三彩就是想摹仿金器而出现的,新兴的白瓷工艺也出现了不少仿银器的器形。陶瓷器仿金银器的器类,主要有碗、杯、盘、盒和胡瓶(图五五),这类仿制品常在西安咸阳一带的墓葬中发现。洛阳、太原和其他大城市附近的墓葬中也有发现。碗盘出现曲缘或菱花



图五五 陶瓷器仿金银器举例



图五六 陶瓷碗（杯）仿金银器造型的变化 (a)、仿西亚胡人驯狮、象的青瓷扁壶 (b)

缘，杯有的有把，有的高足；带柄的胡瓶，造型变化很快，最后把不适用的柄废去了。太原发现的一件青瓷扁壶仿西亚的形象题材和锤鏤技法更为清楚（图五六）。至于金银器在墓葬中发现很少，这是由于墓葬大都早年被盗过，金银器早就被盗走了，可是它的形象一直还保存在壁画中，如懿德、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金银胡瓶。壁画中还发现了不少玻璃器，有的有高足，有的是圜底，这都是西方玻璃器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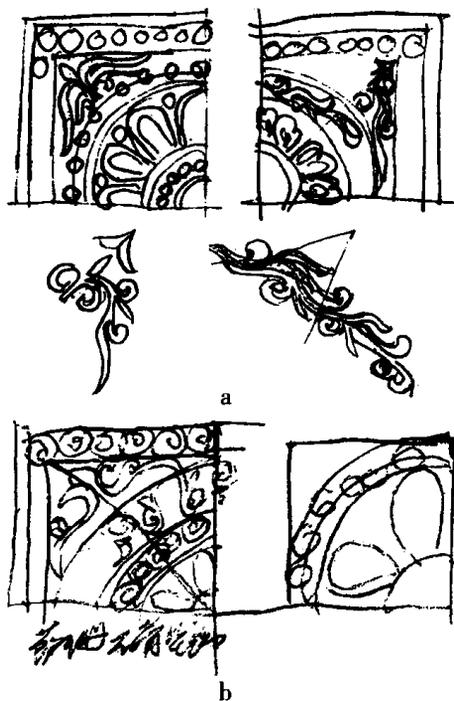
在工艺方面，我国石刻的浮雕艺术一直是以平雕、浅浮雕为主的，但7世纪出现了不少水平很高的高浮雕，如有名的昭陵六骏，有人推测它是受了萨珊雕刻的启示，对照萨珊6世纪的高浮雕，特别是马的形象，不能不承认这个推测是有些道理的。“昭陵六骏”是我国马鬃剪三花的最早的实例，此后8~9世纪，三花、五花成为贵族间流行的马饰。这样装饰马鬃和唐陵石兽多雕出云样双翼的意匠，也都是渊源于萨珊波斯的。

萨珊和波斯的装饰图案，除了前述的联珠圈纹饰，在隋唐时期还流行一种复合的联珠圈，除了出现在纺织品上，7~8世纪长安洛阳敷地砖上也使用了联珠、忍冬、莲花所组成的花纹组合（图五七：a），这种花纹组合是摹仿地毯效果的，而这种纹饰的地毯正是萨珊宫廷所流行的（图五七：b）。除了联珠纹以外，6~7世纪就兴起了一种缠枝卷叶的植物纹，这种植物纹的母题有两种：一是石榴，一是葡萄，这都是西亚、中亚惯见的植物。这种花纹从7世纪起在内地很快流行起来，比过去联珠纹流行得更

广泛、深入，几乎它们成了 7~8 世纪中原的主要花纹边饰，西安及其附近这时期雕饰的碑边、墓志边，好像毫无例外地都使用了这两种花纹（图五八）。中亚、波斯的游艺，这时也在长安上层中流行，有名的马上击毬（打毬），就是波斯的游戏，它的形象不仅出现在壁画里，不少墓中也出现了打毬俑，有男，有女，也有波斯人的形象。粟特人喜欢的胡旋舞，在内地更流行了，墓葬中出现了墓主人观赏胡旋的壁画。波斯、中亚的掷骰子（色子）的马棋（双陆）游戏也传来了，长安西市商店遗址里出现了不少骨制的



图五八 西安附近  
石刻中常见的缠  
枝海石榴纹饰



图五七 西安、洛阳发现数地砖(a)  
和波斯宫廷石膏装饰上  
的纹饰组合(b)

的骰子商品，骰子的样式是和波斯、中亚的骰子

完全相同。但中亚骰子六面皆黑点，波斯有皆红或皆黑。新疆库车所出皆黑。西市的发现已无颜色，不清楚原来如何。相传唐玄宗时始有只“∞”面着红点者。

西安和洛阳都发现了粟特人、波斯人的墓葬。西安曾发现昭武九姓中的安、曹、石、米、何诸姓的墓志和波斯人苏谅和他夫人马氏的墓志。洛阳曾发现康、安、何诸姓的墓志和波斯人阿罗憾的墓志。从这些粟特人、波斯人的墓志中，我们知道：1) 有不少粟特人、波斯人在唐代立了军功，洛阳发现的 682 年

康磨伽、康留买两墓志都记载他随裴行俭平西突厥立了功。功最大的是波斯人阿罗憾，志记载他是波斯国大酋长，656~660年间曾任唐朝的“拂菻国诸蕃招慰大使”，这时正是唐灭西突厥（657年），在中亚设置州府的时候（661年），就在这个时期，阿罗憾奉命到了东罗马（拂菻），“并在拂菻西界立碑”。由于他的功绩，唐朝除任他作禁军的三品将军外，还给他最高的勋绩（上柱国）和正二品开国郡公的爵位。710年故去，时已95岁。以此推算，萨珊亡国时，这个波斯人酋长已接近三十岁，这是一个典型的流亡到唐代并立了功勋的波斯贵族。2) 人居到唐朝的各国贵族，一般都授给卫戍京城的军职或是宗教职务，阿罗憾即任以卫戍的武职。上述西安发现的874年苏谅和他夫人马氏的墓志，是一方中古波斯使用的婆罗钵文和汉文合璧的墓志，记墓主人马氏是萨珊王族的妇女，她的丈夫苏谅任禁军的将军，也是萨珊王族。洛阳发现的740年康庭芝墓志记他的曾祖、祖父都任唐代卫戍京城的武官，大约也是康国的上层人物。西安还发现742年《米国大首领米公墓志》，志中说：“公讳萨宝，米国人也。”萨宝是拜火教（祆教）的教职。3) 许多粟特人墓志都没有记录官职，有可能都是以经商为业的。结合文献记载，粟特人、波斯人经商遍及中原各地，没有任何限制。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北的一座小龕中有造龕人铭记“北市香行社，社官安僧道，录事……史立策……康惠澄……永昌元年（689年）三月八日起手”。北市是当时洛阳三个市中最繁华的一个市，香行贩卖的香，正是从西亚输入的奢侈品。因此这个社的社官安僧道和录事中的史、康两姓，大约就都是昭武九姓的粟特人。一件被伯希和盗去的敦煌文书（P. 3813），其中也记录了一件7世纪末的事：“长安县人史婆陀家兴贩，资财巨富，身有勋官骁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侯王。其宗弟劫利……邻人康莫鼻……”这些人名说明他们都是粟特人。而史婆陀身官勋官，又经营商业并成为巨富。以上情况可以说明唐代内地人民和政府对人居的粟特人、波斯人是一视同仁的，对他们的上层人物还作了一定的安排和照顾。其实这一点，在文献记载上反映得更清楚。许多粟特人在唐代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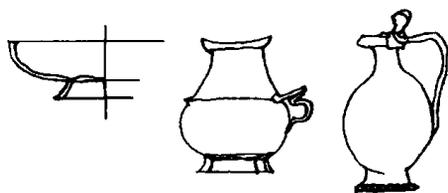
了大官，安禄山、史思明都是粟特血统，和他们同时的康国人康谦还出任了安南都护和鸿胪卿。唐代不仅对中亚、西亚如此，对其他少数民族和外国人也都如此。如对突厥人、突骑施人，东北的契丹人、靺鞨人，以至于朝鲜人、日本人都例外，前述的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就是朝鲜人，做过安南都护曾和李白唱和的晁衡就是日本人（日名安倍仲磨）。我国对少数民族和域外各民族的平等相处、友好往还是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的。

与粟特、波斯有关的遗物，在我国南方和北方的许多地点被发现。

辽宁朝阳、河北唐山、湖北武昌、湖南长沙等地唐墓都出土了深目高鼻的中亚、西亚人面型的陶或瓷的胡俑，江苏扬州不仅在遗址中发现带釉的这种胡人像，还发现了石雕像，在一处手工业作坊中还出土了深目高鼻的人头的陶范，看来，7~8世纪世纪以来内地人对这些远方之客是很感兴趣的。感兴趣大约也和他们善于经商致富有关系。所以有人起名就叫波斯。扬州出土的886年唐渤海吴公故夫人卫氏墓志，志中记“次（子）曰波斯”。以“波斯”为名并不只此。《北梦琐言》记晚唐一个造反的头头叫“陈波斯”。扬州的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件受西亚造型影响的三彩鱼壶，这应当是仿拟西方的金器。扬州晚唐层中发现三彩瓷片（枕）一块，上面的花纹颇有西亚风值得注意（图五九）。扬州，据文献记载，8世纪以后那里集居了不少波斯人，唐后期海上交通发展，扬州成为唐对外贸易的重要地点，西亚是当时主要的对外贸易对象之一，所以扬州较多地发现和西亚有关的遗物是可以理解的。朝阳北的敖汉旗曾发现一批金银器，有鎏金银胡瓶、银盘和带把小银壶等（图六〇）。鎏金银胡瓶瓶把和口缘相接处饰一鎏金胡人头部，圈底下面饰联珠一匝。鎏金银盘，盘内心锤鏤一猞猁，兽和盘口鎏



图五九 扬州发现三彩  
瓷片上的纹饰



图六〇 敖汉旗发现的金银器

金。带把小银壶足有棱，还有一件椭圆形带圈点的银杯。这批金银器从器形到装饰有很浓厚的中亚作风。金银器的出土地南距朝阳不远。朝阳是唐时营州所在地，营州多居杂胡即粟特人，当时长城东部内外，粟特人分布

点很多，这种情况从北朝就开始了，7、8世纪数量更多，这批中亚金银器在这里出土应和营州多杂胡是有关系的。

与粟特、波斯有关的遗物还在当时南北割据的少数民族地区发现了。营州东邻靺鞨族所建立的渤海，辽宁辽阳渤海时期的遗址中出土了双螭铜瓶（图六一：b），还发现了一块用东北出产的岫岩玉制造的带饰，上面刻有捧持胡瓶（图六一：a）的女人像，胡瓶的形象说明是件金属器。云南剑川南诏时期的石窟中出现了榜题清楚的“波斯人”的形象，这个波斯人可能信佛教，他可能经商到这里参加了出资兴建石窟的功德，所以也把自己的形象作为供养人刻到岩壁上了。

从中亚和西亚人及他们的器物在7、8世纪以后的唐代的情况看来，他们和唐代内地的接触面逐渐广泛起来了，这和8世纪以前有所不同。逐渐广泛，东来的人数多了，早期流亡到内地的一点一点地也分散开了；再迟一点海路商业盛行起来，贸易交往的对象也逐渐在统治阶层以外开展了。总之，8世纪以后在唐代的广大领域内都有了中亚、西亚人的足迹。他们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他们带来的西方文明对东方的影响，已不局限于一隅，而在一定的程



图六一 辽阳发现带饰  
上刻划的胡瓶（a）  
和双螭铜瓶（b）

度上也分散开了。器物、纹饰方面表现得比较清楚，某些游戏如打毬，投骰子也比较清楚。还有一件和一般生活有关的是室内桌椅的使用。东方的传统是席地坐床。桌椅之设，原是地中海东部的习惯。它们在前一千纪传到西亚和中亚。公元后不久传进了新疆。4~5世纪新疆、敦煌壁画中出现了椅子。7~8世纪的敦煌壁画中出现桌。西安756年高元珪墓壁画中第一次在世俗形象中出现了椅子。桌椅再进一步流行那就到了晚唐五代。传世的一幅五代《韩熙载夜宴图》表现得最为清楚。由于桌椅的流行，使我国的室内布局有了新的变化。当然这个变化是逐渐的，而且和西方不同，是东方式的。但它的来源，却是在西方；而它在东方的发展是和波斯、粟特人大批东来、长期居住是很有关系的。这个问题，后面还会专门讲。

## 6. 西亚传来的宗教遗迹

除了物质文化的交流，隋唐时期中亚和西亚流行的宗教也传到内地来了。除佛教外，传来的宗教还有祆教、摩尼教和景教。

祆教徒拜火坛，所以又叫拜火教。祆教起源于中亚的南部，萨珊波斯奉为国教。这种教很早就在中亚粟特人地区流行，后来随粟特人东逾葱岭，吐鲁番西部的一座废塔里曾发现4~5世纪的经卷，有的经卷尾题，记这卷经写在高昌城西的胡天祠中。胡天祠就是祆教的寺院。6世纪黄河流域的北魏、北齐、北周都在皇室的支持下出现了祆教，并设立了管理祆教的专官“萨宝”（萨甫）。《隋书·仪礼志》记：“后周欲招来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遂从夷俗。”可见当时内地出现祆教是和粟特人的东来关系密切。大食灭萨珊后，这种宗教即随波斯人的东来更盛行了，唐代波斯人、粟特人在内地活动面最广，所以这种宗教的寺院也到处兴建，文献记录不仅长安、洛阳有，敦煌、凉州（武威）、汴州（开封）、成都等地也都有。在长安的祆祠集中在唐长安城内的西北部，其中最大的大约是萨珊末代皇帝的儿子卑路斯三世要求唐政府在677年兴建的。它位置从地图上推测大约在今西安西关大街南侧朝阳村的西南。祆祠所在地一

般都是信祆教的波斯人、粟特人集居的地点，长安西市多“胡商”和“波斯邸”，长安西北部的三四所祆祠也就围绕在西市附近。前面提到的萨珊王族马氏，墓志中也记载了她是祆教徒，她的墓也正在长安的西北郊。祆祠内原不设偶像，主要是一座火坛，银币上有其形象，萨珊时代的祆祠多建在山上，《魏书》记519年北魏灵太后登嵩山祀胡天神，看来我们的祆祠也有的兴建在山上。有人认为晚唐小说《续玄怪录》中所记的《杜子春传》就是记一个祆教的故事：华山云台峰上建祠，正殿置一高九尺余的药炉，置杜子春于西壁面向东，象征崇敬日，不信者入祠有“火灾”等项，都与祆祠的情况相同。如果这个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华山云台峰就可能有拜火坛的遗址。

景教是5世纪在波斯形成的一个基督教的教派（Nestorians，聂斯脱里）。638年（贞观二年）在长安兴建了景教寺院，其遗址在今西安西站大街南侧十里铺村的东南。1625年这里发现了有名的781年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藏陕西碑林博物馆）。碑文的作者和当时景教的主持景净，是波斯人。此碑碑边还附刻了叙利亚和汉文合璧的七十二个景教僧人的名字，其中也有不少是波斯人。此外，以前还在西安南一百多里的周至楼观地方发现了一处建中间（780~783年）重建的景教大秦寺遗址。看来，一直到8世纪后期，这个宗教在长安地区还很活跃。8世纪以后景教还活跃在中国西部地区，吐鲁番、敦煌都分布有景教寺院。吐鲁番曾发现绘有景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壁画的寺院遗址。敦煌藏经洞曾发现景教幡画和汉译的景教经典，据统计这种经典有七种之多，其中《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赞》末有“开元八年（720年）法徒索元定写于沙州大秦寺”的跋语。沙州即是敦煌。

摩尼教是3世纪中期从祆教分出的改革派。它反对祆教上层日益腐化，主张弃富就贫，粗衣素食，才能协助善向恶作斗争。这个改革反映了一般人民对贫富不均的不满，所以得到下层的拥护，因而也就为萨珊统治阶级和祆教所不容，一部分教徒逃到中亚，在粟特人地区传播。吐鲁番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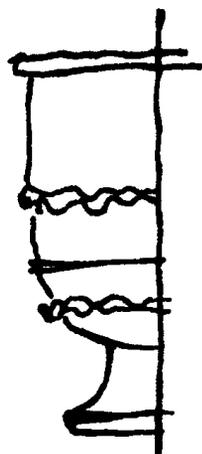
现了 8~10 世纪的摩尼教寺院遗址，出有幡画、纸画、壁画和突厥文译本的摩尼教经典。绘画中多回鹘人形象，说明当时它在回鹘人中流行。敦煌藏经洞发现了粟特人的摩尼教经卷，也发现了汉文译本的摩尼教经典。摩尼教在中国流行情况，比袄教、景教更为广泛，这当然和它比较接近下层的教义和宗教活动分不开。唐以后这个宗教深入内地，甚至流行到东南沿海，而且还为一部分农民起义者所利用，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 7. 从中国向东传的西方器物

隋唐和朝鲜、日本的关系密切。日本统治集团这个时期从长安、洛阳、扬州等地大量输入我国的高级器物。这些高级器物有很大数量比较好地保存到现在。因此研究隋唐的工艺品，日本的收藏是值得重视的。这些高级器物中所反映的中西文化交流的问题，往往可以补充我们自己的考古发现。朝鲜半个世纪以来的发现，也有助于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了解。

朝鲜的发现，主要在新罗统一时代（675~896 年）的都城庆州附近。7 世纪风行我国一时的联珠纹装饰，这时期也被新罗普遍使用在砖和瓦当上。使用联珠纹、忍冬、莲花组合纹饰的砖都是大型宫廷建筑物的敷地用砖，毫无疑问这是摹仿地毯的效果。前面讲过这种萨珊地毯纹饰，7 世纪初，唐代长安、洛阳宫廷已开始用砖仿效了，新罗的做法当然是从唐代学来的。新罗使用联珠纹不仅用在建筑材料上，还铸造到大钟上。看来新罗人对这种新的纹饰和唐代人同样是很感兴趣的。庆州的新罗墓葬中出现了掐丝珐琅工艺品，有金耳饰、有鍍金针筒，这大概是由唐朝传入的唐代人新学会的新工艺品。还出现了西方烧造的高足玻璃杯（图六二），这大约也是从唐朝传过来的。

日本的有关器物种类、数量都很多。他们保存了



图六二 韩国庆州  
新罗墓出土的  
高足玻璃杯

不少7世纪前半从中国输入的联珠纹锦，其中有名的狩猎纹锦，猎士的形象是萨珊贵族的装束，这块锦是在纬线上起花的，从织法和花纹都可以说明是唐代工匠在波斯工艺影响下的新产品。7世纪后半，联珠纹也盛行于日本，瓦当、铜器都有这种花纹。近年奈良发现的高松塚，壁画中的伞盖上也绘出了联珠纹的边饰，这是表示当时这种伞盖的实物外缘上缝缀了联珠纹锦。近年日本研究丝绸之路的人，主张丝绸之路的东方末端，应延长到奈良，联珠纹饰的东传是一种很有特征的纽带。

现存8世纪日本皇室从中国购求的工艺品中有锤鏤狮子纹样的金花银盘，有在琵琶面上绘出粟特人骑驼的形象，有涂漆的铜胡瓶，有背饰绿珧琅的铜镜，还有摹仿波斯器形的绿琉璃十二曲椭圆形杯，这些都是唐代工匠制造的。另外日本收藏有烧制彩色玻璃的配方，其中有“麒麟血”一项，据研究这是从西方传来的树脂原料，这个配方，无疑也是从唐代抄来的。当时日本皇室的高级工艺品，现在大部分收藏在奈良东大寺，其中还有两件白玻璃器，一是外壁磨出圆形装饰的碗，一件是素壁的胡瓶，经过化验不是中国的铅玻璃，是西方的钠玻璃。玻璃原料和器形、装饰都可说明它是萨珊产品，这，可能也是从中国转手运去的。东大寺收藏从中国去的器物中，还有几项值得注意的：1) 东大寺还收藏有嵌有青金石玉带的如意，还有一件平脱镜背鑲有闪闪发光的青金石粉末。青金石是阿富汗东北地方的特产，过去我们都是割磨成型的装饰品，使用它的粉末作涂料装饰是以前所不知道的，而这种装饰法在前一千纪的埃及即已使用了。2) 有好几件木画家具，有柜、箱和棋盘，还有大小盒子。这种木画，文献有记载，但国内没有发现实物，日本的收藏使我们明白了这种技法，它是用多种不同颜色的木料解裁成长条或方块，然后用来装饰家具，木料中有的还夹有象牙料。这种技法源于波斯，今天还是伊朗一带的特种手工艺。3) 法隆寺收藏一件木画箱上拼出了一幅童子戏狮的游戏场面。这种狮舞是经过龟兹(库车)传来的当时西亚的一种驯狮游戏。4) 东大寺一件弹弓上画出戴竿戏(汉名都卢寻橦，唐名长竿伎)，这种杂技，虽然在地中海东

岸早已出现，但这时却是中亚粟特地区流行的游戏，唐时长安有一个著名的女演员叫石火胡，也是昭武九姓的石国（今塔什干）人。5）东大寺还保存着不少假面具，有多种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杂胡王”的假面是一个长须高鼻的粟特人形象。文献记载安国（布哈拉）的安乐着假面。我国6世纪中期的北周北齐都有使用假面的记录，但没有实物，过去库车曾发现半个木制假面，但时代不明，日本这批唐代假面具，既增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也使我们具体地知道了唐代假面的复杂情况。假面的使用有人认为古希腊最早，前一千纪的希腊陶器上就画出了戴假面的舞人，希腊的游戏在亚历山大东征以后通过大批希腊人东来传到了中亚，然后经粟特人传到了内地。关于日本保存的经过中国运来的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遗物，实在不少，以上只是举了几项比较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大家了解，研究唐代中西文化交流，日本的收藏是不能忽视的。

### 8. 大食地区发现的唐代遗物

怛逻斯之役后三年（754年）唐代发生了安史之乱，唐中央的实力日益削弱。780年“河西陇西相继陷蕃”。9世纪中期内地的起义队伍愈来愈壮大，10世纪初唐亡，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在西亚一带，8世纪后半反抗大食统治的起义斗争也日益激烈，9世纪后期大食帝国分裂，许多地方只承认大食皇帝哈里发在宗教上的权力，实际这些地方都宣告了独立。在中亚建立了以粟特人为主的萨曼王朝（874~999年），在波斯东部建立了萨法尔王朝（861~900年），大食统治者统治的地区已缩小到波斯西部的今伊拉克一带。东西的政治局势，使大规模的中西往还无法进行了，但小规模民间往还却在发展。从考古遗迹上看，这个时期，唐后期兴起的民间瓷器手工业的产品逐渐上升为重要的文化交流的项目了。另一个时代特征是海路的来往逐渐超过了陆路。

怛逻斯之役（751年）以后大批唐代士兵被俘，其中一批工匠出身的士兵把不少唐代工艺传到了中亚和西亚，根据当时中国和阿剌伯人的记

载，被俘的士兵集中在中亚的撒马尔干和位于西亚的大食当时的都城库法（在幼发拉底河西岸）。集中在撒马尔干的战俘，把造纸术传到了那里。我们烧制三彩的技法也在这时出现在撒马尔干。大食人统治西亚中亚时期，因为伊斯兰教规定不许使用金银器，于是唐代仿金银器的三彩和白瓷，受到了大食上下的欢迎。因此，撒马尔干也开始生产三彩陶器。因为从陆路上唐代的三彩和邢窑系统的白瓷都经过撒马尔干运到大食内地，所以9~10世纪的大食人就把包括撒马尔干的仿制品和唐代的三彩、白瓷都叫“撒马尔干陶器”。这些陶瓷器近年在撒马尔干的发掘中都有发现。撒马尔干仿制的三彩，釉色没有唐代的漂亮，制作也比较粗糙，和唐三彩对比是容易分辨出来的。

撒马尔干位于大食东北边境上，从这里向西一直到大食都城，沿途较大的古城址都发现了中国器物。

第一个古城址是木鹿古城，在今马里附近的旧马里，苏联近年在这里长期发掘，正式报告没有看见，简报中说9~10世纪的底层中出了不少釉陶和瓷器片。

从木鹿向西南就进入了今天的伊朗东北隅，这里的内沙布尔是一个重要地点。古城在今城东南，古城建年不详，但是这是中亚最西的一座方形十字街的城址。这种形制的城址，在伊朗地区是唯一的一座。此城紧邻粟特人区域即昭武九姓的地方，657年唐灭西突厥后，661年在中亚建羁縻麴州府时，这里在唐安息都护府管辖的范围之内，所以内沙布尔城的类型与唐州县城相似，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城址坐落在丝绸之路上，所以一直是一个重要地点。大食人占领之后，置呼罗珊总督于此。1221年成吉思汗西侵，大肆掠夺，城遭破坏，接着又遭了二次大地震（1267、1280年）就沦为废墟了。1964、1967年美国人曾来这里发掘，并盗走了全部发掘品。他们在8~9世纪的地层中发掘出不少我国的陶瓷器，有三彩盘、三彩子母盏盘，邢窑白瓷罐，还有绿釉碗，这些都是属于我国北方系统的陶瓷，一般说时间较早些，大约是属于8世纪的。还出有9~10世纪的南方系统的

越窑青瓷碗，长沙窑黄釉褐绿彩并有贴花的带耳小罐。另外相传是这里出土的长沙窑黄釉口沿施铁釉连弧纹的小盘和越窑大碗，这两件瓷器完整精致，在国内也是很少见的。大食曾记载 8、9 世纪之际驻在这里的呼罗珊总督曾一次向大食皇帝进贡了二千件中国陶瓷，还有二十件精品。内沙布尔古城多我国陶瓷，甚至还有很精致的瓷器，可以作为这段大食文献的物证。这里不仅出土我国陶瓷，还曾出土好几面海兽葡萄镜的仿制品，这种仿制品的主要特征是把最外边一圈六叶纹改成这里流行的联珠，还有把内部的葡萄纹铸出，更为立体更突出了。

内沙布尔西边的戈尔丹地方还出了一件内地制造的海兽葡萄镜，另外伊朗西部古城苏萨也出土了海兽葡萄镜的仿制品。看来，唐代海兽葡萄镜得到了大食人的欣赏。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唐代 7~8 世纪突然发展的这种新式纹饰的铜镜的出现，原因之一是为了向西方输出。

从内沙布尔向西约 600 公里是累依古城，它是丝绸之路在伊朗北部的最大的一个站，位于今德黑兰南部，也即德黑兰的前身。这座古城建于高 20 米的高地上，北傍小山，很具形势，也是在 13 世纪初被成吉思汗的军队破坏的。美、法都在这里盗掘去不少唐代瓷器，有内壁划花的越窑大碗和菱花边的邢窑的瓷盘，一件凸印并涂上黑彩的蝶纹装饰的邢窑的瓷盘，是邢窑的上品。他们的正式报告一直没发表，究竟还有其他什么器物，我们还不清楚。

再向西进入今天伊拉克境内，就到了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了，这里是大食都城的地区。在巴格达北 120 公里的萨马拉，是 838~883 年的大食都城，战前 1911~1913 年德国人在这里发掘，战后伊拉克自己继续发掘。德国人的报告中记录了这处古城里有三个地区都出了唐代瓷器：一是在一座宫殿的库房中发现了邢白、越青和绿釉、黄釉陶罐，还出了仿制的三彩碗盘；另一是在一座宗教建筑内的废井中发现了越青；还在另一处宫殿的底层发现了邢白。战后发掘出的中国陶瓷多绿釉、褐釉和三彩，三彩中有类似辽三彩的残器。

巴格达东南约 60 公里的阿皮尔塔 (Abirta) 古城也发现了越青和不像邢窑的另一种有人推测是广东沿海所烧造的白瓷器。

溯幼发拉底河进入今叙利亚境内的腊卡，发现了三彩壶。

接近地中海东岸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发现是今安曼东南的哈腊纳堡 (Harnam) 发现的 8 世纪直径 67 厘米的双鸾花鸟镜。这件铜镜制作精致，尺寸很大，致使西亚人误认为一面盾牌。这样大尺寸的精致铜镜，我国国内还没有发现过。这个地点当时直属大食皇帝，看来，它应是当时皇室的收藏。

## 9. 晚唐五代海路上的遗迹

9 世纪末到 10 世纪中期的晚唐五代和西方的海路往还越来越频繁了。当时大食人航海旅行记中多记有中国特产的瓷器，伊本·赫尔塔施培更明确记录从龙编（即交州今河内）向西输出的中国器物中重要的是铁器、瓷器和稻米。铁器、稻米不好保存，晚唐五代的瓷器却在南海以西的许多地点被发现了。瓷器中最常见的是越窑青瓷。我们从印度半岛东岸开始，前述曾为罗马商人集居地、这时大约成为大食人聚居地的商港本地治里



图六三 伊朗希拉夫港口出土的白瓷碗

(Pondichary) 和斯里兰卡科伦坡东南得特卡姆 (Dadigam) 的古佛寺附近都发现了越窑瓷片。巴基斯坦印度河口的邦保尔 (Banbhore)，不仅发现越青，还发现了黄褐釉绿彩小花的长沙窑瓷器。再西就到了波斯湾内伊朗有名的古港口希拉夫 (Siraq)，1965 年英国人开始在这里发掘，出土了大批中国瓷片，最早的是越青。近年伊朗自己的发掘工作中，又发现了内壁起楞的唐五代的白瓷大碗 (图六三)。这个港口，我们南宋人有记录，《程史》叫它作尸罗围，《诸蕃志》作施那帗，说那里的大食商人来到我国。和希拉夫的往还，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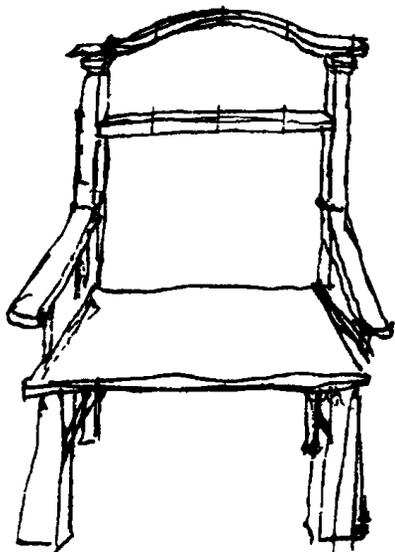
去认为是从 12、13 世纪的南宋开始，但从近年的考古发现看，知道早在 9、10 世纪就已有往还了。唐代海路往还向西还有沿阿剌伯半岛南岸，西进红海去大食控制下的北非地区的一条海路。从考古发现看，唐代器物到达这个地区的时间，是在大食埃及总督突厥人图伦建立的图伦朝（868~905 年）前后这个时期。红海西岸的两个古港口阿依塔布（Aidhab）、库赛尔，都发现了 9 世纪的越窑瓷片。从库赛尔向西约 150 公里就到了尼罗河东岸，顺河而下可到达当时的开罗城。这时开罗城在今城南郊，这个古城的今名叫富斯塔特。这座古城是 642 年大食人征服埃及后所扩建，不久就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1168 年第二次十字军侵略时烧了五十四天，沦为废墟迄于今。这座废墟里很多砖结构的遗迹保存较好。1912 年开始发掘，清理出不少大小庭院、商店、库房、面粉作坊、玻璃器作坊等遗址和数不清的各种遗物。在遗址方面，见到有的庭院砌出方形或八角形的水池，和从水池砌出陶管通到砖壁内，顺着砖壁又发现了由砖壁通向屋顶的水槽遗迹。这样的建筑遗址，说明它是引水上房然后从屋顶上倾流而下的建筑。这种建筑物在 8 世纪的长安的宫殿和大官僚住宅里出现过。《唐语林》记：“天宝中，御史大夫王鉷……宅内有自水亭子，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凜若高秋。”这种自雨亭子的做法来自西方，《旧唐书》记拂菻国：“至于盛暑之节，人厌器热，乃引水潜流，上徧于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观者唯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浮风，其巧如此。”拂菻即东罗马。开罗地区在 642 年前是东罗马属地，这里出现东罗马的高级建筑物并不奇怪。这个遗址帮助我们弄明白了唐“自雨亭子”，更证实了唐代通过中亚传来了东罗马的建筑技术。在遗物方面，截止到 1966 年，这个遗址出土了 60~70 万片陶瓷片，其中有埃及的、希腊罗马、两河流域、伊朗、印度、印度支那、中国、日本等多地的产品，可以说集聚了当时世界陶瓷的大成。埃及请了日本研究中国瓷器的专家小山富士夫等人帮助鉴别，经小山的分析，其中我国从唐到明的陶瓷片约 12000 片，其中唐越窑青瓷片就在 900 片以上。此外属于唐代的有三彩、邢白和长沙窑片，也有少量唐

三彩系统的黄褐釉陶片。在一处外国遗址中，这样大量的中国陶瓷的出土，在国外恐怕只有日本镰仓海岸可以相比，但富斯塔特的距离至少远了日本二十倍，在一千多年前的古代中西有这样频繁的交往，确实出人意料，这个重要发现给我国和埃及的悠久的友好历史增加了新的篇章。

## 10. 晚唐五代我国室内设备的逐渐复杂化

中原地区室内设备的变化是逐渐出现的。黄河流域地势高亢，汉族传统是席地坐卧——坐前暂置几案，褥垫之下铺以薦（荐）席，有矮床但不普遍，房间内部的分隔，使用帐幔（幄帐），东汉开始出现屏风和床——榻，这些情况东汉画像石和壁画都给我们提供了形象材料。东汉时上层人物喜欢西方的毛制品——毡、毯，就是上述的室内设备情况下出现的，毛制品藉地铺榻，当然比传统的薦（荐）席和丝麻褥垫好多了。文献记载东汉“灵帝好胡床”（《太平御览》706引《风俗通》，今本《风俗通》佚此条），这是西方家具引进之始。胡床，胡人之床，可以折叠悬挂，有似今天的大马扎。这种坐具见于后来7世纪中亚粟特人壁画（片治肯特），知道是从粟特地区传来的。魏晋南北朝有关胡床的记载很多。其实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西方室内设备传入的第一个盛行时期。室内设备主要是凳、椅和桌，这一套家具渊源于地中海东部，凳椅在前二千纪的前期埃及壁画和巴比伦石刻中都出现了，前一千纪希腊瓶画更描画了成套的桌椅，他们从西亚传到中亚，然后分两路向东传播，一路是越葱岭先到新疆地区，新疆尼雅3世纪荒废的遗址中多出有镂雕纹饰的残椅，4~5世纪龟兹石窟和新疆的同时石窟中都出现了后设有“▽”形靠背的方凳、藤编的束腰凳和绳心的椅子（285窟），藤编的椅子我国文献叫“筌蹄”，《梁书·侯景传》记“自景立后……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绳心的椅子，大约就是《晋书·佛图澄传》所记“坐绳床，烧安息香”的绳床。另一路大约是从天山以北东来，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M5所出毡毯上织出的女神即坐在椅上。我国东北集安高句丽墓壁画中绘出的高足凳，可能是从这一路东传的。西方室内设备东传

的第二个盛期是7~8世纪的唐代，敦煌盛唐弥勒变壁画正中佛座前出现了供桌（445窟），下部剃度场面中出现了长桌长凳（33窟），西安天宝十五载（756年）明威将军检校左威卫将军高元珪（高力士之兄）墓，墓室正壁画墓主人坐于大椅（倚）上的形象，这是中原地区最早的一把椅子的形象（图六四）。唐代和西方关系密切，不少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阿剌伯人入居中国，他们在与汉族融合进程中，他们的某些生活习惯，也要给汉族以影响，桌椅的逐渐流行就是和这些入居中国的西方人有关系。晚



图六四 高元珪墓  
壁画中的坐椅

唐南方经济发展起来，沿海许多城市集居了不少西方人，因此这时中西文化交流在南方的反映较中原北方为突出。室内设备第一期的变化是出现了胡床、筌蹄和凳之类的零星设备，第二期出现成套的凳、桌和单独的椅子，但还没有对室内起居有较大的改变，可是到了9、10世纪的晚唐五代的第三期就更加复杂而影响到室内起居的变化了，这个变化我们在10世纪中期一幅以南唐首都金陵的一个大官僚的家庭的游宴为内容的著名绘画《韩熙载夜宴图》中看到了。画是一个长长的手卷，分五段连续布局，第一段在一个卧床前面，放了倒凹形“坐床”，床前放了三张桌，里头的一桌设置椅，外头一桌侧置椅；对面是一屏风，屏风前置一桌一椅和一弹琵琶女乐坐在墩上（它的前身应是藤编的筌蹄），桌上部放置饮食用具。第二段在大鼓前单置一椅，椅的形状与第一段诸椅相同。第四段画韩熙载悬足坐于大椅上，椅前还设有榻凳。另两段没有什么新情况可以略去。

从上面三段我们可以看到：1）第四段韩熙载所坐大椅应是上述墓主人所坐椅子的延续；2）出现了小椅和小桌，这种小椅和小桌可以配套使

用；3) 还出现床前置小桌的做法；4) 从夜宴图的各段，我们可以得出“当时像韩这样的官僚家庭，人们在室内的活动，已完全和传统的席地和床上的生活不同了，由于桌椅等家具的使用，他们室内活动主要已移向地面了”。当然桌椅之类的室内家具还和宋以后有别，宋以后室内家具设置一般是固定的，而这时还是可以根据需要随时移动。尽管如此，晚唐五代仍是我国室内设备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是长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城市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人们室内外的活动社交的往还都愈来愈频繁而逐渐发展出来，但汉唐以来和西方的接触愈来愈增多，特别是西方民族大量移居东方，他们使用桌椅的生活习惯这一外来因素对我们的影响，应该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由于室内设备的变化引起了居室建筑的改变，引起了长期在室内工作的工作方式的改变，从知识分子这个角度看，书籍样式改变了，书写方式改变了，甚至书写的工具也改变了，这些我们从唐到宋的实物和图像的对比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外来因素是要通过本地的逐步改造才能较大幅度地流行起来，早期的实例可以佛教和佛教艺术做例证，流行在中国的佛教和中国的佛教艺术，谁都承认和印度不同，而且愈来愈不同；晚期的实例以桌椅为主的室内设备也充分反映了这一规律，我们看《韩熙载夜宴图》是看不出西方味道的，但桌椅之类的家具确是渊源于西方，晚唐五代的室内设备经过宋~明（10~16世纪）的改造发展，成为最具东方文化特色的一个方面。

文化交流总是相互促进的，17~18世纪由于葡萄牙、西班牙和后来的荷兰商船以及传教士的介绍，欧洲大陆的上层流行了中国趣味，他们不仅收集中国瓷器等小件工艺品，而且大量输入中国的桌、椅、箱、柜，甚至床。法国、德国和丹麦的宫廷和贵族的室内设备都布置了一些中国制造的用具和家具。他们甚至让他们工匠摹仿中国的装饰纹样和建造中国式的庭园，这些中国特色，当然欧洲人也在吸取它的精华，和西方所喜爱的我们传统的文化交流的各种项目如以前所喜爱的丝绸、纸张、瓷器等同样丰富了他们的物质文明。

## 七、宋元时期（10～14 世纪）

（1985 年稿）

这时期主要是我国历史的宋元两代，现讲一下当时中亚、西亚的情况。9 世纪中期我国北部的回鹘族由于黠戛斯的南下，被迫西迁，其中一支西奔到中亚巴勒喀什湖南，10 世纪中期在中亚建黑韩王朝（喀拉汗国），1008 年南灭萨曼王朝。其时，居住在中亚的塞尔柱突厥也强盛起来，11 世纪中期向南侵据了伊朗的大部分，11 世纪晚期，又西据到小亚细亚地中海东岸，哈里发只保留了宗教首领的地位，向东控制了黑韩王朝，势力到了我国新疆西部。12 世纪初，塞尔柱逐渐瓦解，这时阿姆河下游的突厥人建立的花刺子模兴起；东方一部分契丹人西迁，1132 年在吹河流域立衙建西辽。中亚的黑韩王朝就在这两个新兴势力下覆亡了。接着花刺子模南下，灭亡了塞尔柱突厥，统治了中亚和伊朗的大部分。13 世纪初，蒙古族兴起，它疾风骤雨式地席卷西方，1211 年成吉思汗大军灭了西辽，1229 年又灭了花刺子模，1258 年蒙古大将旭烈兀攻占巴格达，阿拔斯的哈里发到此结束。我们这个专题所讲的主要地区——中亚和西亚到 13 世纪中期已全部为蒙古所据有。在 13 世纪初，即成吉思汗时分封的四个汗国，这时都扩大了范围，西亚整个是伊利汗的领域，中亚地区有伊利汗和察合台汗以阿姆河为界分治，西亚以西的东罗马领域虽然屡有变化，日益缩小，但在这个阶段一直存在。

这个时期大体上可划分前后两期，前期相当于宋朝和黑韩、西辽、塞尔柱、花刺子模时期；后期即蒙古·元和察合台汗、伊利汗时期。现将上

述比较复杂的有关地区的历史背景列表四如下：

表四 宋元时期亚洲主要政治范围的兴衰示意

地区	时代	前 期	后 期
东方	唐	五代 → 北宋 → 南宋	蒙古
中 亚		辽 → 金	察合台汗
西 亚	萨曼	黑 韩 → 塞尔柱 → 花刺子模	元 伊 利 汗
地中海东岸	阿 拔 斯	东 罗 马	

### 1. 前期的遗迹（两宋时期的遗迹）

前期中亚、西亚地区由于突厥回鹘的迁移活动，政治变动频繁，但在文化上都出现了一致的情况，即这些突厥回鹘系的政权都信奉伊斯兰教，所以可以说中亚、西亚的文化面貌都属伊斯兰文化了。从考古遗迹上看，伊斯兰禁用贵重的金属器，流行植物花纹，在色彩上喜欢用蓝白对照和盛行较大跨度的圆顶的砖石建筑等情况比较突出。这些都和以前粟特人、萨珊波斯文化有所不同。

10~11世纪萨曼—塞尔柱突厥统治下撒马尔干的釉陶生产很有发展，早期产品有浓厚的唐三彩作风。这种唐三彩风格的釉陶也在内沙布尔大量烧造，过去这里曾发现近乎烧釉陶的窑室遗址，圆形平面和圆顶的都和我国北方系统的瓷窑相类似。12世纪累依西边盛产陶土的萨韦也开始烧造。萨韦还烧造了仿我国北方白瓷的白釉陶器。巴格达西北的萨马腊出土了不少中亚、西亚仿制的三彩器，其中有辽三彩的残片。另外还在富斯塔特发现辽代的白瓷片，辽代瓷器的西来大约都是从塞尔柱时期经过和辽有关系的黑韩王朝运进来的。在中亚、西亚地区很少发现可以肯定是从陆路运来的北宋器物，这是和当时的政治形势相应的。北宋北阻于辽，西阻于西夏、回鹘。黑韩王朝和塞尔柱突厥虽和北宋曾多次发生联系，但较大

规模的陆路上的往来，特别是贸易往来是不大可能的。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亚、西亚摹仿我国陶瓷的釉陶工艺发展较快，伊朗北部的发展更为突出，12 世纪在花刺子模治下的累依制陶工艺超过了内沙布尔和萨韦，累依和它附近所烧制釉陶的装饰技法日益丰富多彩，器壁内装饰植物花纹和内心装饰鱼、禽；在技法上的剔花、捺印以及釉下绘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宋瓷的特征，因此，近年对在 12 世纪左右伊朗陶艺出现了一个大发展时期，是受到宋代给予的影响的推论，已得到一般的承认。两宋



图六五 无为宋塔发现  
盛舍利的玻璃瓶

时期西亚著名的工艺除釉陶外，里海南岸的玻璃制造也有了新发展，除了日用的杯、碗、皿、盘之外，制造了不少盛食品的大小容器，这种容器随西亚一些珍贵食品运往各地。地中海一带时常出现的蓝色磨花的蔷薇水玻璃瓶，1971 年在我国安徽无为的一座北宋景祐三年（1036 年）砖塔发现了一件（图六五），那是被用作盛舍利而装藏在佛塔中的，从埋葬的时间和地点，可以估计它是从海路运来的。

11 世纪以来，我国发明的罗盘较普遍地用于航海，这给东西海路交通提供了更为安全方便的条件。两宋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私人手工业的繁荣，特别是制瓷手工业在各地较普遍发展起来，我国和西方的贸易往还、文化交流，从此海路就逐渐超过了陆路。

北宋越窑系统的青瓷和南宋龙泉、广州地区的白瓷较普遍地在印度半岛南部东西两岸和斯里兰卡被发现，不少地点同出有北宋、南宋的铜钱。斯里兰卡中部的亚帕发（Yapahuva）古城遗址就发现了 1332 枚中国铜钱，其中除一个开元钱和一个元初的至元通宝外都是宋钱，这个迹象说明当时和斯里兰卡的往还已是意想不到的频繁了。从巴基斯坦、伊朗、阿拉伯半岛沿岸向各自的内地转运两宋时代的青瓷、白瓷的情况，也很出人意料。

阿富汗出土的南宋龙泉，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发现的南宋景德镇影青，都是上溯印度河运去的。伊朗西北部发现的南宋龙泉和土耳其地区出土的南宋福建、广东烧造的青瓷，大约是从伊朗波斯湾港口或是从两河上溯运去的。两宋瓷器在非洲发现的情况也比唐五代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富斯塔特之外龙泉向北到了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港。顺尼罗河而下在现阿斯旺水坝地区和苏丹的努比亚地区都发现南宋的福建、广州青瓷。从非洲东岸沿海向南，一直到坦桑尼亚基尔瓦岛西北部的古城址，那里发现了北宋的越窑青瓷，肯尼亚米达的 12 世纪遗址中，不仅发现了许多器种的宋代瓷器，有越、龙泉、影青、广东青瓷，之外还发现了南宋庆元（1195~1200 年）通宝、绍定（1228~1233 年）通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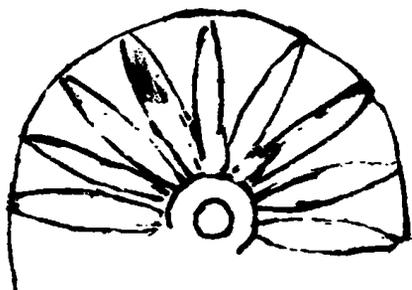
两宋瓷器、铜钱在西亚的不断发现，说明双方人民来往的频繁。伊斯兰教徒东来，集中在广州和泉州，广州市的南宋光塔，实际上是当时伊斯兰礼拜寺的附属建筑。这样中空直筒式的砖或坯砌起的高塔在伊斯兰教流行的中亚、西亚到处都可以见到。近来泉州发现了不少南宋时期伊斯兰教徒的墓群，东来泉州的伊斯兰教徒，据 14 世纪阿剌伯人记载知道，多是伊朗人。13 世纪我国文献也记载施罗帏、尸罗围人即希拉夫人侨居泉州为富商，1131 年兴建的 14 世纪中叶重修的泉州伊斯兰教清净寺，其平面部分应还保存着兴建时的样式，它和 12 世纪增建的伊斯兰最大的清真寺的南部相类似。前两年伊朗调查 11 世纪前后的停泊海船的怯失岛，在岛上发现福建、广东沿海烧造的褐青瓷片，其中有两件碗外底上捺印有文字，一件是“能”字，一件是“□新”。另外红海的港口埃札布遗址也发现这类我国东南沿海烧制的褐釉瓷罐上印有“□清□”三字。这样的记有姓名的瓷器，有可能是自用品，而且又都出在港口遗址，推测应是南宋航船上的使用瓷器，说不定也许是曾在西亚、北非的港口居住过一段的南宋人的遗留。

这个时期的后期即元和伊利汗国时期。13 世纪蒙古军队西侵，摧残了中亚、西亚的许多城市，俘虏了大批中亚、西亚的手工业工匠东来。伊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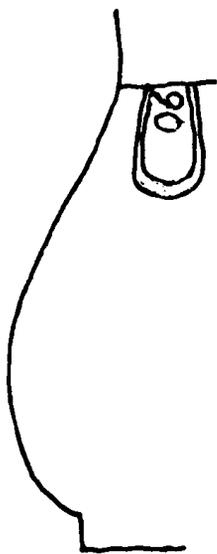
汗国建立之后，西亚和内地由于种种原因（政治的、宗教的、商业的），工匠间技艺的交流曾盛极一时，过去古老的“丝路”一度被恢复，海路的频繁更达到空前的程度，东西方都保留了不少相关的文物，近年的考古发现更不断补充、丰富。因此，就不能像以上那样一项一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罗列了。我们选择陶瓷、建筑两项作重点，附带再介绍一点工艺和泉州的遗迹。

## 2. 后期的遗迹（元代中西文化交流）

13~14 世纪我国的瓷器、伊利汗的釉陶都又向前发展了一步。我国瓷器向西输出先是大量的龙泉在西亚、北非当时重要的城市和港口普遍发现，后来是景德镇的青花发现的地点和数量，甚至比龙泉还要多。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两种瓷器都出现了订制品的迹象。一种较高级的龙泉碗，内底心部有放射纹类似菊花的贴饰，贴饰的背面还有一个凹入的小孔（图六六），这种仿金属器底部有凸起花纹的特殊装饰的龙泉既不见于我国，也不见于东方（日本龙泉比西亚还多，菲律宾、印尼也很多，但都无此装饰），而它在西亚的一些重要遗址如波斯湾内的巴林岛、伊拉克巴格达南的瓦吉特（Wasit）、叙利亚的哈马、伊朗阿尔德比勒、土耳其伊斯兰堡、埃及富斯塔特都有发现，看来这是应这个地区伊斯兰教徒的要求所特制的。青花的情况更为显著，一种折沿大盘，口径在 40 厘米左右，遍体繁缛的花纹，花纹是摹仿西亚流行的大铜盘的效果，这种大盘国内很少发现，近年景德镇找到了烧制的地点发现了不少残器和碎片，而它在西亚非常集中，伊朗、土耳其都保存了好几十件完整器，埃及富斯塔特遗址中发现了不少碎片。这大约也是为了这个地区所特制的。在伊朗



图六六 龙泉碗底类似菊花纹的贴饰



图六七 伊朗发现青花  
玉壶春瓶颈部莲瓣饰  
带内书有“90”数字

设拉地区发现了一件青花玉壶春瓶，颈部的一匝莲瓣纹，每个莲瓣纹中都有一个阿拉伯数字“90”（图六七），这当然更是专为阿拉伯人烧造的了。我国为外国订烧瓷器过去最早的例子只知开始于16~17世纪，现在可以上推到14世纪了。这是从我国瓷器手工业发展史上反映的问题。这里我们是要说明14世纪我国瓷器在西亚的使用面的扩大和受西亚人民重视欢迎的情况。另外我们前面谈过伊斯兰教当时重视白蓝对比的颜色，花纹忌用人物，这两点也正符合元代青花的特征。我们知道元代重视色目人（即中亚、西亚人），蒙古上层也很重视伊斯兰文化，因此青花瓷在元中期以后迅速地发展起来，是不是和这些有关系呢，值得我们注意。

西亚釉陶在13~14世纪时受到中国瓷器的影响更加显著了，伊拉克发现的13~14世纪的釉陶罐和盘底器形与花纹都具很明显的我国北方瓷系的影响，14世纪伊朗烧造了一种淡青釉的“泰甫”陶器，流行面很广，这也是公认的摹仿我国青瓷的。

中西的相互影响也反映在某些建筑方面。西亚是有烧造彩色釉的悠久的传统的，公元前一千纪中期，两河流域和伊朗的浮雕的彩釉砖就很有名，现在还有不少优美雄伟的遗物保留下来。13~14世纪西亚的这种工艺发展出内容和色彩都很丰富的用于建筑的琉璃装饰，我国琉璃这时出现的较鲜艳的颜色，如内蒙古多伦元上都遗址和北京大都遗址所出的元代琉璃瓦，瓦饰有浅蓝、深蓝、紫、赭、淡黄等色，就是西亚匠人带来的新工艺。而我国为皇室所独占的龙凤纹饰，这时也传到西亚，伊朗大不里士的一座伊利汗宫殿的彩砖中就出现了龙纹砖和凤纹砖，这种龙凤琉璃砖和我们北京大都遗址所出的浮雕陛石和栏板比较，就可发现不仅题材一致，布

局也很一致，龙凤穿花的题材是渊源于中国宋代木雕，大不里士的龙凤彩砖很有可能是根据大都宫殿的雕饰的。这种雕饰不仅出现在大不里士宫殿的琉璃砖上，还出现在那里的覆盆柱础的覆盆上。大都宫殿与大不里士宫殿有共同的因素，除了西亚采用了某些中国工艺外，大都宫廷的设计就有大食的工程师也黑迭儿参加，大都遗址中出现真实形象的石狮角石，可能就是出自西亚工匠之手。西亚工匠当时是受到元朝人的称赞的。上述也黑迭儿死后的墓碑上记“西域有国，大食故址，地产异巧，户绕良匠，匠给将作，以实内帑，人用才谔，邦同攸爽”之种种称赞，显然不是仅指也黑迭儿一个人，也黑迭儿不过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就是了。土砖起券，砌圆顶是西亚建筑结构上的特点，这大概是来源于游牧民族的毡帐。后来伊斯兰建筑就沿袭了这一做法。用砖起券我们也有悠久的传统，但修建工程较大的城门和建较复杂的半圆顶，则是从 13 世纪以后而且还有可能是从南方开始的。前者最早的例子见于距广州不远的桂林南宋石刻上，到元代逐渐普遍，后者最早的例子是元初兴建的杭州凤凰寺大殿。而后者本身就是西亚伊斯兰教徒阿老丁在至元十八年（1281 年）修建的伊斯兰礼拜寺。这个大殿平面三间，各间平面近方形，中间一间是原建，该间四壁上部转角处做出菱角牙子叠涩，由下而上逐层加宽，形成圆形上口，其上覆以半球形的券顶。这种做法完全和当时西亚单间的小型礼拜寺相同。这种西亚的起券的做法，大约在元代有一个发展阶段，所以到 14 世纪晚期明初修建的南京灵谷寺大殿就变成了三券连跨的大型殿堂，到 15 世纪就逐渐完成了中国式的砖建的无梁殿，大家看到的定陵地宫就是已成熟的中国式无梁殿的 16~17 世纪的典型建筑。我国在建筑方面在 13~14 世纪受到中亚、西亚的影响，还有城垣建筑中的圆形角楼，元代许多城垣建筑都是这种做法，和以前我们方角的传统做法不同，著名的如西安元安西王府城垣四角都是圆形的角楼址。圆形角楼的做法一直流行到明初，西安城的西南角楼还保存着这种元代从中亚、西亚传来的式样。

在遗址方面还保存一些当时遗迹的，在我国可以泉州为例。泉州到了

元代大概是留住西亚人最多的地点，他们集居在城南，近年泉州外城和南郊发现了不少西亚宗教的遗迹，上述 12 世纪兴建的伊斯兰教清净寺，现存的大门和礼拜堂石壁，还是 1310 年重建时的遗物。寺门石砌，门楣作尖拱三重，门内顶作葱头形，完全是西亚建筑的样式。也发现了元代摩尼教的寺院遗址和造像，还有景教徒的墓石。一块墓石上有“大元……大德三年（1297 年）内悬带金字海青牌面，奉使火鲁没思（Hormoz）……蒙哈赞大王（Ghazan）特赐七宝货物，呈献朝廷……自后回归泉州本家居住，不幸于大德八年十（以下缺）”。这是一个元朝出使伊利汗国的使臣的墓石，可惜志文下缺，不知道他的姓名。泉州从宋代起就有不少西亚人就地落户，这个墓石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泉州出生的西亚人。哈赞汗的时期（1295~1304 年）是伊利汗国最盛的时期。火鲁没思一般译文是“忽鲁谟思”，是波斯湾东端的一个港口，现名阿巴斯港，这是纪念萨珊王朝（1502~1722 年）的一位抗击外来侵略而获得胜利的有名的国王阿巴斯而改名的。忽鲁谟思从元代起代替了怯失岛成为伊利汗的通商大港，港外有大岛，岛上和港口附近散布有大量的元代青花瓷片和明初青花瓷片，明初郑和七次下西洋，其中三次都是以此地作为终点站的，所以明史说它“居西海之极”。明初记载此地的文献不少，有的记载很详尽，城市建筑、婚丧制度、各种物产、对外贸易等等，是今天这个地区考古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例如《星槎胜览》卷四记载这里“傍海居……垒石为城”，古城石基尚存，又如“货用金银钱、青花瓷器、五色缎绢……”，拿我国青花瓷器等作为交换的媒介，既说明对它们的珍贵喜爱，又说明当时输入量的巨大。青花瓷片这里有的地区俯拾皆是，看来记载并不是出自偶然。

当时元和伊利汗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还有两项值得补充一下：一是我国自宋以来的工笔画传入伊朗，毛笔作画在西方只有伊朗，讲究线条，讲究平涂颜色和充满构图都是自古以来中国画的传统，这个传统到宋元虽然受到所谓文人画的冲击，但在民间画师中一直保存。伊利汗时在西亚突然出现的这种画派，应是出自当时我国民间画师的传播，这也正和相传蒙古统

治者从大都请去画师的故事相符合。经过伊利汗时代的提倡，这个画派逐渐成了伊朗的传统画派了。这种情况正和我国特种工艺中的掐丝珐琅相近似。掐丝珐琅一般叫景泰蓝，以铜作胎上涂矿物质颜料烧成多彩的器物。一般说创于明景泰时期（1450~1456年）。其实这种工艺始于埃及，萨珊时期在伊朗得到发展。唐时曾传入我国，不久又失传了。伊利汗时伊朗的珐琅器重新传来，当时叫大食窑，常见的器形有盒、瓶、炉，烧制的技法传来的确切时间不见记录，但现存的我国最早实物是宣德时期的（1426~1435年），制作已很精致，估计初传的时间应在元代晚期。珐琅工艺我们经过明清不断改进逐渐成了我国的传统工艺品。工笔画和珐琅工艺在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是有代表性的两项事物，它从一个角度清楚地说明了各国文化交流如何丰富了各自人民的生活，进而促使了各自的文化发展。



# 附录 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 汉文古文献（汉～唐）

（1980年稿）

从考古发现看中西文化交流，国内和国外的考古发现是资料，如何把这些零散的材料联系、贯穿起来，进一步研讨在文化交流的长河中是如何发展、深化的，那就需要古代文献的印证，甚至说明。在这情况下，古代文献就起了重要作用。在国内国外的古代文献中，以我国古代文献保存下来的最多，内容也最丰富，也比较有系统，因此也就是最为重要。同时也由于个人条件的限制，外国的文献知道很少，绝大部分也不能阅读，所以这一讲只能介绍一点有关的汉文古文献。

汉文古文献，我们着重第一手资料，也还要考证一下所谓第一手资料的有关的史料来源，因为古代人一般对边远地区的记录往往是辗转抄袭，并且追求奇闻异说。可以相信、可以供我们说明考古发现的并不太多，所以我们引用时要慎重选择，不要企图什么都可以相互印证。关于有关的汉文古文献，我们拟分两部分：1) 讲记录汉以前和汉迄晋的有关文献；2) 讲有关南北朝到唐的古文献。前部分我们详细说说，后部分大略讲讲。选什么书，在书中如何取材，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以前部分作为标尺，如何运用以后的古文献就可以举一反三了。

## 1. 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汉文古文献（一）（5世纪之前）

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我国古代文献，汉以前的记载除零散不集中的记

录之外，《山海经》（《西山经》、《北山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和《穆天子传》是值得重视的两部书。

《山海经》太史公说：“《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禹本纪》早已失传，东汉班固时已看不到了，所以《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著录。《山海经》虽然司马迁不敢相信，但其中的记载，现在看来并不都是荒诞。其中所记的西方、北方的传闻，可供我们考虑汉以前西方情况时参考。此书题郭氏传，即晋郭璞注，为经作注可叫传。《山海经》的经文原是图中的说明，所以《汉书·艺文志》著录于形法家，是以图为主的。但汉以后图文分家，郭璞为经文作注时，所看到的图已不是原图了，而是与经文分开的单个的图。这种早期的单个的图，有可能还是摘录以前文图未分开时的图。这种早期的图辗转临摹，到唐以后改变越来越多，宋元以后即所谓《山海经图》几乎就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了。经文单传由来已久，错、讹极多，直到清乾隆、嘉庆之间（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有人认真整理，毕沅的新校正，重点在考校山川，毕著书时正巡抚陕西，他亲自考查并详细地询问了黄河中上游以及甘肃以西的广大区域，还翻检了不少地理和类书，特别对《山海经》所记“西方”的山川、地理多有重要校释，因此很有参考价值。另一本是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著在毕书之后，他吸收毕书的精华，但他的重点在订正文字、考释名词。他下的工夫很深，当时在官场和学术界地位都很高的阮元，很赏识此书并把它刻了出来。这两部书是阅读《山海经》的必读书。毕、郝两书后来都有坊间单刻本，毕有浙江书局本，郝有上海石印本，很容易找。《山海经》在毕沅以前只能看到一些嘉靖以后（16世纪以后）的刻本，毕在（15世纪的）正统道藏中发现了另一个系统的《山海经》，这个新本子的利用，使毕书的水平大大提高了。抗战前商务影印《四部丛刊》时，《山海经》是用的明成化国子监本，这个本子比道藏本晚，但不是一个来源，商务影印成化本时，还附了一个宋本校勘记。解放后《山海经》现存最古的南宋

池州刻本公开了（原是私人收藏，现藏北图），因此，今天又有了重新校勘《山海经》的条件，即有了毕、郝所未见到的成化本和池州本，使用以前书，首先要校勘，对讹错较多的《山海经》更应注意这项整理工作。

《穆天子传》是晋太康二年（281年）汲县人发掘古塚所得的“汲塚周书”。此书按月日记周穆王西游的事迹，也是晋郭璞作的注。此书记周穆王西行路线是从今河北、山西北部出发，折向西去，与汉通西域开河西一路的路线不同，而与现知的汉以前的考古发现很接近。书中记了葱岭东西的事情，看来不能全是虚构。汉以前，中西关系，这本书很值得认真研究。《穆天子传》最早的刻本是元至正金陵学官刻本（14世纪），此元刻本到16世纪就不容易看到了。现存最早的本子是正统道藏本。16世纪明嘉靖以来刻过不少次，这些明刻本都未参考道藏，清嘉庆洪颐煊收集了一些明刻本和道藏本对校了一次，并且还收集了古书中的引文作了不少补充，因此，洪校本是目前最好的本子，收在《平津馆丛书》，中华《四部备要》即按此本排印。此书除明刻本外，现存明抄本不少，这些明抄本应调查一下，很可能有更早的来源，因此《穆天子传》和《山海经》一样，今天读此书，最重要的还是先校勘。清末民初有些人急于考释此书的地理，没有一个精校本，就搞地理考证，往往会事倍功半。

两汉魏晋时期的文献，主要是所谓正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和《后汉纪》。正史一般说，都有了定本，即宋监本。古书在雕版以前没有定本，一经雕板印刷，立即一字不错地化身千百，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成了定本，特别是国子监刻本，实际即是国家的标准本，因此正史在宋监本刻印之后，就差不多定型了。现存的本子除敦煌、吐鲁番出现的残卷和日本传世的残卷以外，都是从宋监本系统下来的。文字差别不大。解放后的铅印本作了一些校勘，是这个系统的最好的本子。《后汉纪》没有很好的本子，较好而易见的是《四部丛刊》所收的明刻本。

下面讲讲上述那几部正史应当着重看其中的哪些篇目。

《史记》：①《匈奴传》，②《韩长孺（安国）传》、《李将军（广）传》，③《卫将军（青）传》、《骠骑（霍去病）传》，④《建元以来侯者年表》，⑤《大宛传》。

注意西汉时的中西文化交流，首先要弄清匈奴，所以要先看①，②、③是与匈奴有关的主要人物传，其中的③是一篇合传，随大将军卫青、骠骑霍去病从征的重要将领们都附在这合传之后，附传中有《张骞传》。④，凡是从武帝建元以来封侯的，都以人为单位按年排列他的事迹，可以作为②、③的补充。⑤，上述的《张骞传》很简单，连他的籍贯都未记，这不是司马迁的疏忽，而是另有安排，即还有一篇《大宛传》。《大宛传》一开头“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以下就讲武帝如何遣张骞西去联合月氏共击匈奴，骞的行踪，骞所到的地点和该地点的情况，还有骞归来后向汉武帝的报告的摘录，一直记到张骞死。显然这部分是直接参考了张骞出使的国家档案。骞死之后，汉武帝时期与西方的关系，重点在李广利伐大宛事迹。因此《大宛传》实际是张骞、李广利事迹和西域情况的合编。当时西域情况离不开张骞，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的主要目的虽没有达到，但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产马的地点大宛，引起了汉武帝的重视，因为骑兵在当时的军事上是很重要的，骑兵的质量，马好与坏具有一定的关键性，因此，大宛的地位在当时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以大宛来代表西域，因而把这篇内涵复杂不好纪名的传记，就以大宛为名了。《史记》无《西域传》，即是《大宛传》。西汉中西文化交流，汉武帝时期是主要时期，司马迁就是当时人，他不仅搜集到许多档案材料，并且和当时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的重要人物直接接触，如李广、苏建，所以上述《史记》诸传、表的内容是可靠的。又因为这些传相互关联，我们要弄清西汉和西方的关系，必须把这几个传合起来，融会贯通，才能了解较多的情况。读书要得间，得间就是说看到一般所忽视的地方，因此就需要细心、使劲读。粗粗翻检，大概读读，“观其大略”，那只能看点皮毛。而我们今天要想在常见的书中，找出有用的材料，就非得在细上下工夫不可。

《汉书》：《武帝纪》、《李广苏建传》、《卫青霍去病传》、《张骞李广利传》、《赵充国辛庆忌传》、《傅（介子）常（惠）郑（吉）甘（延寿）陈（汤）段（会宗）传》、《异姓诸亲王表》、《匈奴传》、《西域传》和《地理志》。

《史记·孝武本纪》是褚少孙所补，只记封禅事，无参考价值，因此武帝事迹要看《汉书·武帝纪》。本纪重要不仅在于事件的系年，《汉书》本纪内容有的是本传中所未记的，所以看《汉书》诸传，都要随时以本纪为纲。《汉书》的传分两类，一类基本是抄《史记》原文，一类是记司马迁以后的西汉事迹。前一类抄《史记》有增多无减少，增的部分要注意，有些应是司马迁著《史记》时得不到的史料。《史记》、《汉书》记录有不同，南宋人就注意到了，倪思《班马异同》可参看。我们注意西汉事迹，也要把两书对照起来看，因为两书写法不同，《汉书》也有把《史记》内容拆开来重新编排的，如把《史记·大宛传》中张骞、李广利事迹拿出来稍加以增补，另写了较详细的《张骞李广利传》。后一类是《史记》未及写的西汉事迹。司马迁《史记》截止于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公元前85年迁死。从天汉四年到王莽建新期间有103年，如包括王莽的十五六年，共近120年，这120年的史料是《汉书》所补充的，后两个合传和《匈奴传》与《西域传》的后半就属这类。异姓诸亲王表，补充以上列传。《汉书》记匈奴与西域事和《史记》有很大不同：叙述的系统清楚、地理概念明确、出现了不少较深入的概括性的言论。这些不同，反映了《汉书》比《史记》深入。《汉书》的著者班固在窦宪幕府，掌文书，随宪出征匈奴，到达了今天蒙古西部的燕然山（今名杭爱山）和私渠海（今邦察干湖），可以推知班固对匈奴的历史和地理的知识都比张骞丰富。公元92年固死时，其弟超在西域驻节今新疆西端已十多年，这十多年中，班固除了可以看到超向东汉王朝的报告外，还常有家信往来，他们往来的家书，文献中还保存了片段。班超在西域和西汉时张骞凿空不同，他既长期驻扎在都护驻所，又时而领兵在塔里木盆地南北征讨，因此，了解西域诸地情

况并进行各方面的军事、政治上的联系，是他的经常性工作，所以班超对西域的了解比张骞深入、广泛得多。因此，《汉书》匈奴、西域的资料，虽然写的时间晚些，但远比《史记》更为有用。读《史》、《汉》西方史事时，清代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西域水道记》、《新疆赋》和陶葆廉的《辛卯传行记》都可参考。西域古今地名不同，可查阅冯承钧《西域地名》。《汉书·地理志》是《汉书》开创的志书之一，《史记》书中没有全国性的地理记录，《汉书》这个新内容，从中西文化交流这一点注目，它记北、西、南边远地区郡县的情况是很重要的，例如在安定郡下记有月氏道（约在今六盘山地区），上郡下记有龟兹县（约在今陕北榆林北），这是怎么一回事？龟兹县唐颜师古注说：“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这句话如果可靠，西汉时就有位今新疆中部的龟兹人迁到了内地的北边。月氏道又如何解释呢？更值得注意的是《地理志》最后还附记了一段从合浦郡（雷州半岛、海南岛一带）和日南郡（越南中部沿海地区）到印度半岛的海路，甚至还记录了商贾、使者到那里喜欢搜求的各种物品。这些，当然都是我们这个专题所应注意的事项。

《后汉书》刘宋范曄撰。范曄《后汉书》时在5世纪20年代（元嘉元年〔424年〕冬左迁宣城太守时的数年间），其时距东汉之亡（220年）已二百多年了。这时世间已有七八种后汉书，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宋书》本传），但主要的根据是东汉一再续修的官书——《东观汉记》。《后汉书》是仿照《三国志》的体例，纪传不重复，具体事迹多著列传，所以本纪只有系年的作用了，此点是与《史记》、《汉书》不同处。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事迹，可看《窦融传》所附的子固、曾孙宪传，《班超传》附子勇传和《梁懂传》，还有《西域传》、《西羌传》、《南匈奴传》。《西域传》有两部分新资料，一是“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先者指《汉书》所记而言）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最后一年是124年）班勇所记”。范曄如何能看到班勇所记？当然是根据东汉官修的《东观汉记》了。班勇是超的小儿子，是班超在疏勒时期娶的胡妇所生，所以公元

100年班超在龟兹地区上疏中说：“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这一年，超69岁，后二年即102年超回洛阳不久死去。107年勇为军司马，和他哥哥雄出敦煌迎回西域的汉官兵，此后“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后汉书·班勇传》），就在这十余年中，勇整理了他在西域的见闻，写出了文字材料，以勇的出身、经历他的记录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后汉书》这部分是值得珍视的。《西域传》的另一部分新资料是关于天竺佛教和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这部分据范自己说是“采闻之后说也”。这部分和前部分不同，前一部分因为班勇所记的文字资料早已不存，可能最早抄录班勇记录的《东观汉记》也不存在了，所以范书可贵。后部分就不如此，晋袁宏的《后汉纪》所记就比范为早，袁书尚存。魏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中记得更详细，时间也更早，《魏略·西戎传》这部分也还存在。还有汉末人牟子的《治惑篇》更早些，所记的内容也比范书多。后两种书下面还讲。因此《后汉书·西戎传》后一部分的史料价值就远远不能和前部分相比了。

《三国志》和《三国志注》，晋陈寿《三国志》本文，没有较重要的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纪事。东汉桓帝以后放弃了新疆大约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一直到魏曹丕时才又经营河西、注意西方，所以魏对河西的经营的记录也有一定重要性，可看《张阮传》、《苏则传》和《仓慈传》。《三国志》记事简略，所以刘宋裴松之给它做了大量的注，裴注主要是从各书中直接抄录文字，置于有关的纪传文句之下，有时与文句无关的，而他认为应当补充的，也抄进去了，后一种抄录，往往大段置于有关的纪传全文之后。前面引用的《诸葛亮集》记蜀与月氏康居合兵是属于前一种。前面引用的《魏略》记胡绌和记月氏马多事都是属于后一种的，裴在《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末，大约是把《魏略·西戎传》的全文都抄进去了。幸亏裴的引用，给后人保留了一篇很重要的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献。《西戎传》的西戎是指曹魏以西的民族和国家，从甘肃、四川的氐羌向西一直记到地中海，还记了从海路向西的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半岛的事迹，因此它是继

《后汉书》中班勇所记之后的重要史料，现简略的从我们专题的角度，说说《三国志》裴注所引的《魏略·西戎传》的内容：①南迁的匈奴部落。②月氏余种。③从玉门关向西有三条道：南道到印度，中道到地中海的罗马（大秦），北新道从天山以北向西向北到今乌拉山东西麓。④在南道内讲到了大月氏（贵霜）盛时情况，还讲到印度半岛和我国云南、四川的交通情况。⑤在中道着重讲罗马（大秦），《魏略》是现存记大秦最早的书籍（比《后汉书》早一百多年），讲到了那里的特产玻璃有十种颜色、讲到了十种颜色的毛织品（氍毹和毼毼）、十二种香，这些都是大秦传统的向中国输出的物品。⑥北新道主要记录这个区域的各种骑马游牧民族。

《晋书》关于西晋部分有用的资料不多。它的《四夷传》中的西戎部分，新疆地区只记了焉耆、龟兹，葱岭以西只记了大宛、康居、大秦，记得很简略，大部抄自以前的书籍，只是在摘录前人记录之后增加了几句和西晋的关系。这里不想多讲了。

关于汉魏西晋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献资料，还有新疆、甘肃地区出土的汉晋木简和纸质文书，可参看《流沙坠简》和它后面所附的《补遗》部分。另外，还有一些佛教的书籍，这部分内容比较复杂，只想介绍两部书，以后有用时，大家先看这两部书，从中找线索：一是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记录翻译佛经的人和事，从汉记到他那时代；二是《弘明集》，也是僧祐撰，集录了从汉到他那时代的有关佛教的重要文章。这两书是相互为用的，所辑都是佛教传入我国初期的重要史料。《弘明集》卷一收汉末交州地区牟子《治（理）惑篇》，是古书中讲到佛的最早一种。僧祐两书，都收到历代大藏中，前者无单行本。后者商务《四部丛刊》所收是明《径山藏》本，此本是根据明人改动了卷数的单刻本，不好。看这种书最好取南宋《碛砂藏》和《高丽藏》两本对照看，《碛砂藏》有影印本，日本铅印的《大正藏》的底本是《高丽藏》，所以这两个本子都易找。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希望大家先看看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上册，然后再进一步看佛教的书籍。

## 2. 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汉文古文献（二）（5～9世纪）

5～9世纪即南北朝至唐末这一阶段。这一阶段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牵涉到的主要的少数民族和有关国家，有柔然、吐哒、突厥和粟特、波斯和东罗马。为了有重点，着重讲和西方有关的史料，即后三项。为了讲述方便，我们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讲有关南北朝、隋的汉文古文献，后部分讲有关唐的汉文古文献。

前部分南北朝有关的汉文古文献，先讲讲“七史”。

南四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和北三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合起来称为七史。七史因为唐李延寿《南史》、《北史》流行之后，逐渐不被重视，到了11世纪北宋国子监想刻印七史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完整的本子了，特别是北朝三书，残缺得最厉害。于是北宋人就反过来又据《北史》把残缺的部分补了进去。北宋国子监校补的时候，本来可以作得更好一些，因为当时内府的收藏还比较完整，前它不久所编辑的《太平御览》（《御览》引书多从宋以前的类书中抄录）、《册府元龟》从七史里抄录的资料就完整得多，另外唐朝人抄录七史的资料如《通典》也可以参考，这些书北宋国子监刊七史时都没去搜集和参看，因此，我们今天看七史，特别是遇到北宋补的部分，不仅需要翻阅南北史，而且需要看《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和《通典》。

前部分南北朝隋的汉文古文献，在北朝主要是魏收的《魏书》。因前有曹魏所以又叫“后魏书”。魏收《北齐书》有传。但大部分是北宋根据《北史》补足的。《魏书》中牵涉中西文化交流的部分，主要是《西域传》、《蠕蠕（柔然）、匈奴、徒河、高车等国合传》。我们前面说过，魏收的《魏书》这部书和后面将要介绍的《北齐书》、《周书》到了北宋初都有了残缺，《魏书》就佚失了三分之一。即是在卷子本时，就不完全了。第一次雕版，北宋仁宗时国子监刻本，这个最早的刻本就是根据《北史》等书把它补齐的。上述和我们关系重要的两个传，偏偏就是北宋时后补入的。

经过核对，知道《魏书》这两个传补自《北史》，因此我们就要对《北史》的这两个传作番史料的考证工作。现以《西域传》为例，经过考证大致可以证明《北史·西域传》原来就是抄自《魏书》、《周书》和《隋书》，现在我们把《北史》记录北魏以后的事迹删去，大体上就恢复了《魏书·西域传》的面目。我们只能大体上说，因为《北史》抄《魏书》时简略很多，如《北史》（《魏书》同）《西域传》记疏勒国条，在叙述佛衣一段之后，比《太平御览》993所引的《后魏书》就缺“后每使朝贡”句，甚至还有整条漏去的，如《御览》797引《后魏书》记“乌则国”条就不见于《北史》（《魏书》同）。但是毕竟还可以恢复其大概。在大体上了解《魏书·西域传》内容之后，再考虑一下当初魏收的史料来源问题，看看它的可靠程度如何。魏收修《魏书》是以北魏当时所修的各种国史为根据并参考当时政府的档案，因此知道它的这部分史料来源有三个主要方面：①太武帝时（424~451年）派董琬、高明出鄯善路西行招抚西域，西到乌孙（伊力河流域）、破洛那（费尔干纳），即以前的大宛；浩罕，《大唐西域记》作忸、者舌（石国，塔什干），即锡尔河流域。439年凉州平后，“琬等使还京师（平城），具言凡所经见及传闻……琬所不传而更有朝贡者，记其名不能具国俗也”（《北史·西域传·序》抄自《魏书·西域传》），可见《魏书·西域传》主要部分是根据太武帝平凉州后董琬、高明的报告。这部分有一个特征，即从鄯善起过葱岭西到大秦，南到印度的里程，都记“去代××里”，即是从平城算起的，这当然是根据北魏都平城时的档案记录。在平城时关于这方面的档案，应当主要是来源于董琬、高明。②太武帝时还有一项记录，也是很重要的。5世纪中叶，北魏曾向萨珊波斯派遣使臣韩羊皮，北魏波斯之间开始了直接交往，因此，《魏书》中出现了关于波斯较详细的记录。③北魏迁洛以后，约在516~518年间曾派宋云、慧生二人去葱岭西迄印度河中上游健驮逻一带求经，当时这个地区在吠哒范围之内，二人归来（522年）都有行记。《魏书》对吠哒及其附近的记载从朱居（朱俱波，今叶城）到乾陀罗共七国事，是根据《慧生行记》写成

的。今本《魏书·西域传》“呶咤”和最后一段“康国”条，也是抄自《北史》，但这二段，《北史》不是抄自《魏书》，而是抄自《周书》和《隋书》。我们分析了今本《魏书·西域传》的史料来源知道，《魏书·西域传》的资料大都是根据当时见闻，可靠，是这时期最重要的文献记录。魏收《魏书》之外，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也是很重要的记录。北魏迁洛以后，北魏和西方的关系，特别是和呶咤统治下的粟特、健驮逻地区的关系很密切，洛阳多胡人，风俗多胡风，《伽蓝记》反映较多。末卷（卷五）抄录了《宋云行记》的重要部分。宋云 518 年从洛阳出发，经今西宁穿今青海省抵鄯善，走南路过于田，从今莎车南经阿富汗东北到达健驮逻地区，南下一直到健驮逻的中心印度河中上游今巴基斯坦北部。522 年回到洛阳。它是 6 世纪初期中西关系最详细的记录，所以一直为中外学者所注目。法人沙畹曾译注，冯承钧有译文刊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六编内。

《魏书》以后的《北齐书》、《北周书》虽没有《魏书》重要，我们也不应忽略。

《北齐书》，唐初李百药根据他父亲李德林的旧稿编成的。李德林在北齐时预修国史，入隋后续增成书。李百药有这个完整的底本，自然容易成书。也正是因为《北齐书》修纂及时，所以内容比较丰富。可惜的是，北宋初仅存了不到一半，另一多半是北宋国子监刊印时，用《北史》等书补入的。《北齐书》没有西域传之类的边境地区的国别列传。但书中有关文化交流的内容不少，只是散在各传中。其中《武成十二王传》、《祖珽传》、《恩倖传》重要，这三传偏偏又都是宋人补入的。因此今天看《北齐书》应与《北史》和《太平御览》的引文合读。中华书局排印本的校注可参看。

《周书》唐初令狐德棻等撰，《周书》的根据不多，史料贫乏。《元纬传》记：“天厌移德，鼎命已迁，枝叶荣茂，足以逾于前代矣，然简牒散亡，事多湮没”，即使是北魏皇室在北周居大官的也事多湮没。可见唐初

搜集北周史料之困难。因此《周书》一般地说不如《北齐书》丰富。另一方面，宋校补此书的人，水平远不如校《魏书》、《北齐书》两书的人，所以这又是今本《周书》无法弥补的后天缺欠。但北周一代只靠此书，另外《魏书》在北魏分裂东西以后，以东魏为正统，不记西魏，西魏二十多年事迹附在《周书》中，这就又增加了“北周书”的重要性。《周书》记西域事在《异域传》。《异域传》记西方情况一段抄自《魏书》，然后补几句西魏北周事。但其中有几个传很重要。稽胡、突厥都是《周书》最先为之立传的。突厥情况不必多讲了，这里介绍一下稽胡。“稽胡一曰步落稽，概匈奴别种……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这个稽胡是匈奴盛时从西方掠来的雅利安系统的西域胡人，他们在这个区域活动，大约从公元前开始一直到以后的唐代，差不多延续了一千年。他们这个地区，我们应当考虑：其前和大月氏，其后和辽金以来是汪古部集居的地点，都相距不远，这个传统的雅利安人活动区的历史，一直到现在并不甚清楚，但可以推想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应是很重要的。《周书》注意了稽胡是很有见地的。高昌、吐谷浑两传也很重要，这两传虽都沿自以前的史书，但增加了不少新史料。高昌的官制、服饰、文字、语言等，都比以前所记的内容详细，特别是文字语言的记录，可以反映当时这里汉胡杂居的情况，“文字亦同华夏，并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这个胡语，从吐鲁番发现的文书看，很可能是吐火罗 A（焉耆语），可见使用吐火罗 A 的民族，在北朝晚期～唐初（6 世纪～7 世纪前半）即唐在这里设西州（640 年）以前，在这里的实力是很大的。《吐谷浑传》记吐谷浑统治者曾组织大批商胡多至二百四十人赶着骆驼队和北齐进行交易的事迹。这一纪事很重要，因为北齐粟特人很多，北齐文化中反映的西方因素很多，怎么传来的？如果说都是继承东魏、北魏，好像比北魏又出现了不少新内容，那么通过什么渠道从西方到了东方呢？北周是敌国，当然不会给予很多的方便，北方突厥地区当然可以通过，这里又很具体地提供了吐谷浑一途。而

这条路是从伏俟城（吐谷浑王庭所在地）向东北翻祁连山，从北周凉州以西偷越今宁夏北部的沙漠地区，绕沙区而进入北齐领域的。

以上是北朝重要文献。

南朝宋齐梁陈四部史，宋、南齐、梁三书有蛮夷、诸夷传。《宋书》涉及范围窄，《南齐书》太略，《梁书》的《诸夷传》最详细。这是由于梁注意海外关系和统治集团重视佛教的缘故。因此，我们着重讲《梁书》。《梁书》撰于唐初姚思廉，思廉是继续其父察的旧稿，察梁臣入陈修梁史，陈亡又入隋，奉诏修梁、陈二史，未成卒。唐初贞观三年（629年）诏思廉继父业与魏征共同完成。因为有这样的渊源，《梁书》虽成于唐，但是是根据梁朝的资料完成的，所以资料比较丰富。姚察世奉佛教（父名僧垣），由于熟习佛教情况，所以对于佛教起源的西方比较注意，因此有关《诸夷传》中的“南海诸国”记录南海交通和斯里兰卡（师子国）、中天竺等地内容较为丰富。齐梁时期为了对付北魏，与魏北方、西方的民族、国家，经过四川、青海相往来，《梁书·诸夷传》的“西域诸戎”的资料也很丰富。因为史料来源不同，所以它的记录往往和同时期北朝的史书记录不一样。其中有芮芮（即柔然）、有滑国（即哒），还有波斯。在滑国和波斯的记事中，都提到了波斯锦和波斯锦有狮子纹样以及波斯锦织金线等工艺，这是有关波斯锦见于我国文献的最早的记录。

关于南朝的史料，有两部和尚传记值得注意：梁释慧皎的《高僧传》、唐释道宣的《续高僧传》。前书从后汉著录到梁初，后书从梁初到唐麟德二年（665年）。前书成于梁时，故记南北朝的僧人，主要是南朝的。后书虽著于唐初，因为道宣是吴兴人，所以所记还是以南方僧人为多。僧人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不仅限于传教翻经，不少东来的西方和尚他们在当时和上层人物往来很多，生活习俗的交流也不少，更重要的是从他们的姓名、乡里和往来路线的记录中，可以了解当时和中亚、西亚各地关系的情况。这两部僧传本子很多，以金陵刻经处本最常见，但该本改名作《高僧传初集》、《续高僧传二集》，不恰当。如有条件最好找《大正藏》看，收

在该藏卷 50。

隋统一南北，炀帝时中西文化交流逐渐繁盛。我们文献的依据主要是《隋书》。《隋书》是唐初和《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一起编修的。唐初与隋衔接，各种资料不缺乏。关于中西文化交流方面，《隋书·西域传》内容丰富，大体上可以和《魏书》衔接。这是由于炀帝时派韦节、杜行满、李昱等人出使昭武九姓区域和波斯是直接经历。另外还派裴炬到武威、张掖一带，掌管与胡商交市的事，《裴炬传》记：“诸商胡至者，炬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国记》三卷，入朝奏之”的结果。其序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北道从伊吾……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这段记录：第一可以说明《西域国记》是隋书根据的史料之一；第二，更明确记录了从中原通向西海（地中海到波斯湾）的路程，其北、南两道和《汉书》、《魏略》的记录相比，都有了伸延和变化，这个伸延变化，反映了在南北朝一段中西交通的发展情况。西亚、中亚的民族，自古以来就能歌善舞，在南北朝一段，特别是北朝，非常喜爱西亚、中亚的乐舞百戏，北魏、北齐、北周，特别是北齐最为显著，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南北朝的史书虽有记载，但不系统。《隋书》的志是《五代史志》（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所以《隋书·音乐志》记录得非常完备，是从音乐杂伎方面考察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隋书》不仅“志”，总结五代事，其实全书涉及中西关系的事，都可以看做是总结南北朝晚期的结果。

后部分是唐代的古文献。唐代东西文化交流的史料首先我们讲三部去西方的行记：①玄奘《大唐西域记》。玄奘西行时间是 629~645 年，645 年（贞观十九年）正月回到长安，不久奉太宗命写了一部行程记，646 年春写成。该书由玄奘口述，辩机笔录，然后由玄奘修改定稿的。玄奘从长安经瓜州、伊州到高昌，然后再经龟兹西行由碎叶进入锡尔、阿姆河流域

即昭武九姓地区，然后折而南行到健驮逻地区，再从印度河上游东抵恒河流域，然后在印度半岛绕了一圈，又从健驮逻地区逾葱岭经疏勒（喀什）、于田（和田）、鄯善（若羌）到沙州（敦煌）东返。玄奘行记记了沿途中亚—印度 138 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和佛教的情况等。内容极其丰富，近百年来国际上一直给予很高评价，他不仅记录了大量有关中西关系的事迹，而且是 7 世纪以前中亚和印度历史的重要文献。这部书一直没有好的本子，1957 年南京金陵刻经处刊刻的吕澂定本是较好的，后来韦巽又以吕定本作底本又作了一次校勘，并标点分段，1977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现在最好的也是最易找的本子。②是法伯希和从敦煌弄走的一个游行印度的行记的残卷（P. 3532），因为首尾俱缺，所以既不知书名，更不知作者。但这个残卷存有 200 多行，残卷的开始是记印度北部，由北而中而南、西部，然后好像越过喜马拉雅山脉经过吐蕃西部取道健驮逻地区，再从今阿富汗西到大食（旧波斯地区）弯了一下北上到突厥控制下的昭武九姓地区，之后东越葱岭，“葱岭镇，此即属汉，兵马见今镇押……至疏勒……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从此以东，并是大唐境界，诸人共知，不言可悉。开元十五年上旬至安西……”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游行者到安西大都护府时是 727 年（开元十五年），因此可知这个行记的时间是在 8 世纪前期，他的时间上距玄奘的时间大约迟了半个世纪。内容比《大唐西域记》少些，但也记录了不少重要事迹，特别是着重记录了当时唐代在中亚的实力、佛教派别以及商业往还情况。这残卷发现不久，1909 年罗振玉收入《敦煌石室遗书》中，公布了录文，讹误较多，但附有札记，罗根据元和五年（810 年）撰成的慧琳《一切经音义》的记载，考订为慧超《往五天竺传》，但《音义》记该书为三卷，此残卷不分卷，当是“略出”本。慧超是新罗僧，不空弟子，其入天竺系取海道，归则由陆路，记“海道”的部分，很可惜已不存在了。1926 年羽田亨和伯希和合编《敦煌遗书》公布了影印本，1927 年收入《大正藏》，现最好的录文本应是 1941 年《京都大学史学科纪元二千

七百年纪念史学论文集》中所收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译录》，这是羽田写的录文，此录文后又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集（1957年）。1910年藤田丰八用汉文作了笺释，解放前有铅印本，可参看。③杜环《经行记》。杜环天宝末任职在高仙芝军队中，751年怛罗斯之役被俘到大食都城（在今巴格达西南），宝应初（762年），即十一年后，才随商船到广州然后回到长安，写了一部《经行记》。此书，《新旧唐书·艺文志》未著录，很早就佚失了，原书有多少卷不知道。他同族的叔伯辈的杜佑，公元801年撰成《通典》，边防、西戎传里抄录了十二段，1500多字。保存下来的就是这些。从这十二段中，知道杜环到过拔延那（费尔干纳）、碎叶、昭武九姓区域、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地中海东岸一带。回来时走的是海路，经过师子国（斯里兰卡）。这部书记录得很踏实可靠，记录了当时唐势力在中亚的情况，中原人流落到西亚的情况，记录了唐朝许多工艺技术的西传，也记录了西亚的工艺和特产，当时伊斯兰教在西亚发展很快，他也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是我国书中叙述伊斯兰教最早的一种。杜环《经行记》现有张一纯的《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出版，可参看。这三部行记年代相连续：646年、727年、762年，都是出自亲历其地的人的手，是毫无问题有关中西关系的第一手资料。

其次是当时编辑的资料，重要的有释道宣的《释迦方志》和道世的《法苑珠林》，还有敦煌发现的几部地志。后者以前已经择要讲过了。现在着重讲讲前两种。《释迦方志》书只两卷，是道宣搜集唐初以前记录从海陆两途西去的书籍中有关天竺的部分编排成书的。成书的时间是永徽三年（650年），这时玄奘书已写成六年了，所以道宣搜集的资料最后一部即是《大唐西域记》。道宣自己未西行，都是抄自人家，但他所根据的书绝大部分已经散佚了，所以这个二手资料就有其珍贵的价值了。这里只想介绍卷上《遗迹篇》所记的西去路线这一件事，以说明这书的重要性。他记唐时西去印度有三道：东道：河州（甘肃临夏）—鄯州（青海东部），经今青海，南下到吐蕃，翻喜马拉雅山到北印度的尼波罗，即今尼泊尔。中

道：鄯州—凉州—瓜州（在今安西境内）—沙州，走南路经鄯善—于田—疏勒，逾葱岭，到今阿富汗，东南下经健驮逻地区抵西印度，再西北与北道合。北道：瓜州—伊州（今哈密）—西州，走中路经焉耆—龟兹，西经热海（今伊塞克湖）到素叶水城（碎叶）—怛罗斯城—昭武九姓区域—今阿富汗地区与中道合。中道、北道是旧路，东道，这是最早的记录。此外，还可以看出唐初青海东北部在向西去的路线的重要，这是上沿南北朝晚期的路线，鄯州即今西宁，西宁曾出一陶罐，内盛 100 多枚萨珊银币，正反映了它从南北朝晚期到初唐这一时期的要冲地位。《释迦方志》这书比较少见，最方便的是看《大正藏》卷 51。《法苑珠林》100 卷，撰成于总章元年（664 年）。道世与玄奘、道宣同时，往来都很密切，也是唐初一个名僧。唐初，书籍难得，所以多编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佛书也是如此，《法苑珠林》就是佛书中的类书。把佛家故事分类编排了一百篇，每篇末有感应缘，是记信佛或不信佛的俗间故事的，这里边引了唐以前和唐初 140 多种佛经以外的书籍。内容虽然主要是佛教感应的宣传文字，但其中记的时间、地点和人，都有不少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料。这里举一例，玄奘去印度后，摩伽陀国王遣使来唐，643 年唐太宗派王玄策为答使，这次大约是 646 年，647 年太宗又派他去了一次。657 年高宗又派他去印度送佛袈裟。王玄策去了印度三次，他写了一部《中天竺行记》（撰年约在 661～666 年间）。王的路线都是走吐蕃和尼泊尔，即《释迦方志》所记东道。《中天竺行记》宋以后佚亡了，《法苑珠林》引了十多条。道世与王玄策熟悉，书中还有记玄策亲自向他说的的事迹。王玄策使印事迹别的书虽也有些记载，但最详细的是《法苑珠林》。关于《法苑珠林》一书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性，当然不止记录了王玄策一事，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了。《法苑珠林》传本较少，最好看《大正藏》。《四部丛刊》所收的 120 卷本不好。

直接的行记和当时人间接编辑的书籍之外，就是唐以后五代和北宋人对唐代事迹的记录了。和这些关系有关的书籍，在五代北宋时，有三个较

重要的编写时期：

第一个是从五代后期到宋初即 10 世纪中后期。具体的书有后晋开运二年（945 年）修成的《旧唐书》和宋初公元 961 年续修成的《唐会要》。这个时期的官修书籍，大体继承了以前的官书，因为去唐亡未远，除保存下来的官家的记录外，其他史料尚未集中。

第二个时期北宋真宗时代即 10~11 世纪之际。这时宋政府注意了过去的典籍收集工作，唐代史料也开始集中，和我们有关的书籍有两部官修的大书：《太平广记》（977~978 年）和《册府元龟》（1005~1013 年）。《太平广记》五百卷，分类编辑杂记小说，其中收了不少唐人著作，唐人对西方的异闻和西方民族入居中原后的事迹，写过不少杂记小说，这些绝大部分南宋以后就逐渐佚失了，但有不少，分散地保存在《广记》里。明人曾从其中辑出不少专书，但遗漏很多，我们今天引用要直接从《广记》中收集。这部书，过去不易找到，解放后中华书局有铅印本，就方便了。《册府元龟》一千卷，把过去所谓的正史中的记事，分类编辑而成的类书，其中唐代事迹很多，他除了根据《旧唐书》，还根据了不少已佚的其他唐史。

第三个时期是 11 世纪中晚期即宋仁宗到神宗时代。具体的重要书有《新唐书》（1043~1060 年）和司马光的《通鉴》、《通鉴考异》（1065~1084 年）。第三个时期唐史料大都集中了，因此，这时期的著作比较成熟完整，因为多方面的史料都出来了，对一些相同的事迹出现了不同记录和看法，所以需要考订了，《通鉴考异》这部书就是交代这个问题的。

以上三个时期虽然愈后愈完整，但这只是一般地说，遇到具体事实，三个时期的记录还需要互相参考。不能有所偏废，因为它们所根据的史料，都是唐代的和距唐很近的人的记录，所以以上举的具体的书，都应同等地重视。在这些书中最重要的是两唐书。因为两唐书毕竟还是有系统的唐代史书：两《唐书·地理志》中都记录了唐盛时在西方的建置，《旧唐书·西戎传》、《新唐书·西域传》记录了大量和西方有关的国家、民族

的资料。此外，两书的突厥、回纥、吐蕃传也记了不少与中亚、西亚有关的事迹。还有许多有关人的列传如侯君集、郭孝恪、苏定方、裴行俭、王方翼、王孝杰、唐休璟、郭元振、杜暹、高仙芝、封常清、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传也都应参看。关于和西方的关系，《新唐书·地理志》七下曾记录了一些行程，这是《旧唐书》所没有的，因修《旧唐书》时，没有看到贾耽贞元十七年（801年）所上的《海内华裔国》、《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这两部著作《新唐书·艺文志》才开始著录，因此知道《新唐书》是根据贾耽的记载增出了这部分。《新唐书》所记的行程有陆路，有海路。陆路比较简单，属于葱岭以西的，只有从安西、碎叶去昭武九姓区域一路比较重要。海路的记载很重要、很详细，有许多地点现在还搞不清楚，但大致可以估定：从广州入海，经印度支那半岛，穿麻六甲海峡至师子国，到印度半岛东部，绕而西，北上到大食区域（伊朗），进波斯湾，溯河抵大食都城缚达（巴格达），然后登陆，经今伊朗西部、北部到昭武九姓区域与陆路相接。从大食还记有向西的航线，绕阿剌伯半岛南端到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地区。贾耽详于海路，正是唐后期海运发展的反映，这一点正和考古发现的实物相符合。唐后期向外输出的工艺品中，瓷器数量激增，瓷器易碎，陆运不便，这只能是海运发展了才能出现的新情况。

宿白 辽宁沈阳人。1922年生。1948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肄业。并任职于该所考古学研究室。1953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8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83年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兼该校学术委员。同年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1993年起当选中国考古学会荣誉理事长至今。

宿白的主要学术论著有《白沙宋墓》、《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和《魏晋南北朝唐宋文稿辑丛》等。

ISBN 978-7-5010-3398-0



9 787501 033980 >

定价：36.00元